

重塑家庭教育,开创家校共育新模式

□ 陈伟志

苏霍姆林斯基有句名言:“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和没有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能完成培养人这样一个极其细微的任务”。当下,家庭教育已成为一门“显学”而备受社会关注,而国人对子女教育投入力度之大更是史无前例。然而,过度的重视和关注,不但没让教育越办越好,相反教育乱象丛生,教育生态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破坏。笔者认为,在这其中,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不同步、不合拍,乃是问题滋生的重要根源。

现实中,各方面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理解存在偏差,造成家长与教师间责任边界模糊,导致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职责不清、目标不明,“家校共育”更多的只是口号,难以落地生根。其表现有:

一是家校教育存在主体错位、缺位现象。不少教师把分内工作转嫁给家长,让其代批学生作业,家长由此成为“编外教师”。不少中小学原本为了家校沟通方便而成立的家长群,也成了老师布置任务的地方,家庭作业变成了家长作业。在幼小阶段常见的手抄报、手工作业,原本是为提高孩子综合能力而创设的,但最终却给家长和孩子带来了困扰,变成了家长之间的“才艺比拼”。此外,一些家长还承担了不少自身责任外的事,比如参与打扫校园、帮孩子做作业等。当然,也有部分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后,就当起了“甩手掌柜”,误认为教育孩子理所当然应该是学校和老师的事情。

二是家庭教育不当反误孩子健康成长。据一份全国妇联的调查显示,多数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养育焦虑和“重智轻德、重知轻能、重养轻教”的现象,半数的家长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正确教育孩子,部分家长对孩子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无方。现实中,相当一部分家长将“家庭教育”延伸为知识教育,把主要精力放到检查作业和监督学业上,而忽视了孩子生活经验及社会学习的积累以及好奇心、求知欲等的培育。总体看,家庭教育多数是围着学校教育转,许多本应由学校主导的知识教育,成为了家庭教育的“主打内容”。

针对家校教育存在的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笔者以为,只有学校和家庭共同发力,老师和家长携手同行,才能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让教育回归本位。为此建议:

第一,明确教育边界,家校各司其职。在主体责任上务必明确,学校教育应以共性教育为主,而家庭教育则应以素养和个性化培养为重;学校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最重要场所,家庭教育则是对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为此,全体老师应恪尽职守,自觉担负起教书育人的天职;同时家长应牢记,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系好孩子人生第一粒扣子。学校教育不应由家庭代劳,同样家庭教育也不能一股脑推给学校及老师。在孩子教育上,只有坚持家校合作协同育人,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才能达到“1+1>2”的效果。

第二,规范教育机制,重塑家庭教育。子不教,父之过。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前端。父母该如何做好家庭教育?社会各方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随着未成年人保护需求的提升和家庭教育问题的凸显,家庭教育已不只是“家事”,而是需要全社会关注和参与的“大事”。为此,应尽快将家庭教育立法提上重要日程,明确家庭教育范畴,规范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行为,为家庭教育提供系统专业科学的指导和全面充分多元的保障,从制度层面推进家庭教育健康发展。

第三,整合多方优势,实施家校共育。真正的家校合作,需要调动学生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热情,获得家长对学校管理和发展的认同,让家长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目标,使家庭教育更好配合学校教育。无疑,学校是推进和提升家庭教育最有效的场所和媒介。为此,学校应把家庭教育指导作为学校常规工作并纳入考核体系,成立专门的家长学校或家长课堂,根据家长需求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的内容,定期组织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无偿帮助家长学习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作者系上海市政协委员、国家督学,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长)

民办教育新观察

目录

2021/4

编委会

顾问	主任	王佐书	李连宁
主	任	刘林	黄小华
副	任	高德毅	胡卫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果	于松岭
		王玉芬	王志泽
		朱绍中	任芳
		江彦桥	李永新
		李光宇	李孝轩
		李学春	李廉水
		杨文	杨雪梅
		何彬生	邹平
		张杰庭	陆丹
		陈伟志	陈登斌
		周星增	周海涛
		胡卫	胡建波
		俞敏洪	贺春兰
		秦和	贾伟
		徐绪卿	黄藤
		曹永安	曹成杰
		董圣足	谢可涛
		翟志海	

编辑部

总编	高德毅	胡卫
执行总编	陈伟志	董圣足
执行副总编	马开年	刘耀明
	刘荣飞	
编辑部主任	刘荣飞(兼)	
特约编辑	金兵	王琦
	张歆	潘虹
美术编辑	陈蓉	王珂

教育时评

- 01 重塑家庭教育,开创家校共育新模式 陈伟志

教育要闻

- 04 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 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
05 国务院同意调整完善民办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共同关注 | 全国两会提案

- 06 九三学社中央提议:优质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建立对口帮扶与协作机制
08 李孝轩建议:尽快明确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税收优惠政策
09 李湘平建议:打破政策“玻璃门”,促进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
10 牛三平建议:立足教育强国开展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试点
11 朱虹建议:加快民办本科职业教育发展

方家建言

- 13 我国家校共育的问题及对策 朱永新
17 家校社协同育人实施策略 储朝晖
21 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构建策略 高书国

学界观察

- 25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抓牢类型特征 马陆亭
32 职业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完善国家基本制度 徐国庆

校长访谈 |

- 45 民办学校校长如何走向职业化
——上海新纪元双语学校校长李海林访谈录
本刊记者 刘耀明

特色案例 |

- 55 本科立校 特色发展 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南昌工学院
- 59 打造特色课程群 让童心精彩绽放 北京中科启元学校

域外视野 |

- 6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增强教育投资
- 66 经合组织呼吁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建设
- 67 日本职业教育多层次多类型注重产学结合
- 68 印度建立“高等教育委员会”凝聚发展合力
- 69 俄罗斯加强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
- 70 印尼职业教育受公众欢迎

行业动态 |

- 71 教育部:免试就近入学等规定同样适用于民办学校
- 71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领导调研校外培训机构
- 72 上海打造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学前教育基本格局
- 73 陕西四部门规范幼儿园收费
- 74 重庆市集中整治校外培训机构
- 74 浙江金华课后托管成“最受欢迎的教育民生实事”
- 76 广东珠海网警对“校讯通”泄露数据行为开展调查

文件选编 |

- 77 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

主办单位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承办单位 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
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

地 址 上海市徐汇区茶陵北路 21 号

邮政编码 200032

电 话 021-64222730

电子信箱 mbeduxgc@163.com

协会网址 <http://canedu.org.cn>

准印证号 上海市内部资料准印证
(K)0567 号

开卷微语

本期主要呈现了职业教育、家校共育、校长职业化等主题的相关内容。近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以及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的召开,职业教育成为大家热议话题。家校共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策略也成为不少论者近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本期还新增了“校长访谈”栏目,旨在通过与民办学校校长的系列对话,梳理若干思考,呈现闪光观点,展示校长思想。以上内容供读者参详。

欢迎投稿和提供信息。

本刊邮箱:mbjyxc@163.com

宣传政策,服务行业,关注学校,促进发展

编 者

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 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

本刊讯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推动职普融通,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投入力度,弘扬工匠精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上水平的重要基础。近些年来,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取得显著成绩。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眼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推进改革创新,借鉴先进经

验,努力建设高水平、高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要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方向,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吸引更多青年接受职业技能教育,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加强职业学校师资队伍和办学条件建设,优化完善教材和教学方式,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注重学生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习惯的养成,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支撑。

全国职业教育大会4月12日至13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她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坚持立德树人,优化类型定位,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一体化设计中职、高职、本科职业教育培养体系,深化“三教”改革,“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提升教育质量。要健全多元办学格局,细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政策,探索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评价办法。各地各部门要加大保障力度,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待遇,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增强职业教育认可度和吸引力。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主持会议。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山东、江苏、江西、甘肃、中华职教社、中车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有关负责同志作大会发言。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管教育工作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

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以及部分行业协会、企业、高校、职业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原标题为:“习近平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李克强作出批示”)

国务院同意调整完善 民办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本刊综合消息 4月4日,国务院复函教育部,同意调整完善民办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会议制度调整的目的,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民办教育改革发展 and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管理的决策部署,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1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80号,以下简称《意见》),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共同破解民办教育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大力度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管理。

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能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统筹协调推进民办教育改革发展相关工作,健全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政策制度。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工作思路,落实国家鼓励扶持民办教育

发展的政策措施,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强化对民办教育的监督指导,协调相关部门共同纠正违法违规行,规范办学秩序,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推动形成健康有序的发展环境。加强各地区、各部门信息沟通和相互协作,及时总结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成效,推广先进做法和经验。完成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联席会议由教育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等20个部门组成,教育部为牵头单位。

函件还对联系会议工作规则和工作要求等作了规定。

【编者按】在上一期呈现若干全国两会提案的基础上,本期继续刊登五篇全国两会相关提案。主要内容涵盖公办高校对口帮扶、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税收优惠、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民办高校试点、民办本科职业教育发展等。

九三学社中央提议： 优质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 建立对口帮扶与协作机制

民办高校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特别是与公办高校相比,民办高校整体办学质量有待提高,高水平学校建设任重道远。今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将向大会提交《关于加快推进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的提案》,建议“十四五”时期启动“国家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工程”,推动类型相近的优质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建立对口帮扶与协作机制。

九三学社中央分析指出,当前民办高等学校主要存在四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办学层次有待提升,民办高校中高职(专科)院校较多,本科办学水平相对不高,研究生教育更为薄弱。二是师资队伍存在短板,民办高校尤为缺乏高水平专家、中青年骨干、“双师型”教师等人才,制约了学校向高水平迈进。三是教育评价体系有待完善,缺乏适用于民办高校的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体系。四是教育管理力量较为薄弱,一些地方尚未建立专门管理机构或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缺乏有效

的统筹协调。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办好一批高水平民办学校,有关部门也在积极推动,但一直进展缓慢。九三学社中央认为,“十四五”时期应顺势加快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进程,补齐国家高等教育短板。

为此,九三学社中央提出六个层面的建议。首先,“十四五”时期启动“国家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工程”。借鉴“双一流”“双万计划”建设经验,采取“学校申报,省市推荐,国家认定”的实施方式,分批集中扶持优质民办高校以及重点学科和特色专业群,争取建成一批国家级高水平民办高校示范校。或在“双万计划”“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等现有项目中为民办职业院校另辟“赛道”,单设比例,单独评估,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民办应用型本科和高职院校。

其次,参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2020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学位〔2020〕22号)

给予西部地区、民族高校在申请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授权点时申请条件可降低 20% 的倾斜政策,加大对优质民办高校学位授权的支持力度。或各省新增研究生学位授权单位时,单列民办高校计划。

第三,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科学合理、导向明确、符合民办高等教育特质的教学评估指标体系,加强分类评估、分类考核。

第四,建立公办和民办高校联动发展机制。借鉴“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经验,推动类型相近的优质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建立对口帮扶与协作机制,形成公办与民办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高等教育格局。

第五,提高民办高校教师待遇,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落实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将分担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教职工社会保障的资金纳入预算,出台政府合理分担补充保险、企业年金等制度的详细规定。进一步放宽聘用的企业导师在民办高校参加职称评定的条件和标准。研究制订民办高校人才培养专项计划,加强教师培养培训力度。

第六,健全民办教育管理机构 and 协调机制。教育部设立民办教育司,省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健全民办教育管理内设机构和协调机制,加强对民办教育的统筹管理。进一步细化部门职责分工,完善各级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洛阳:突出党建引领 推动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

“扎实学党史,永远跟党走”——洛阳市民办教育党建工作现场推进会近日在洛阳华洋国际学校举行。河南省委高校工委、教育厅组干处二级调研员李志刚,洛阳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副部长赵胜利,洛阳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刘茂钦,洛阳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战杰,洛阳市教育局民办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任晓雨出席会议。来自洛阳各县区的教育局长、主管党建工作的副局长,民办学校党组织书记、校长,以及洛阳市教育局相关科室负责人 90 多人参加会议。

李志刚肯定了洛阳教育系统近年来党建工作取得的成果,希望以现场推进会为契机,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在学校党建工作中打开新局面,迈上新台阶。赵胜利结合中央就民办机构党组织建设的相关规定,围绕规范标准、建强队伍、融合发展、方式创新、责任落实,以及党史学习教育队抓好党的建设提出工作要求。

刘茂钦对洛阳全市民办教育如何进一步深化党建工作、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提出明确要求,部署具体任务。他强调,要提升站位,切实增强民办教育党建工作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要校标对表,全面落实新时代民办教育党的建设任务;要压实责任,进一步营造民办教育党建工作良好氛围。张战杰在总结时要求,各级各类民办学校要认真落实会议精神,落实省市领导的讲话精神,在提高政治站位、聚焦目标任务、紧密结合实际中加速党建工作任务的落实,以党建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学校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发展。

洛阳华洋国际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裴素青在会上做了题为《学党史,增信念,强力量,铸品牌》的经验交流发言。她重点介绍了华洋学校坚持党旗领航、团旗奋进、红领中心向党,党团队一体化推进、打造红色基因传承全链条的党建工作,介绍了党史学习教育“进课堂、进班级、进活动、进家庭”的经验做法,以及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学校教育教学创新、德育育人体系建设取得的成果。

会议期间,洛阳华洋国际学校在“致敬建党一百年,牡丹花开映初心”第六届校园牡丹文化节节目中,精选出《启航—中共一大》《烈火中永生》等反映党的奋斗历程的节目进行展演。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情景剧、诗朗诵、歌舞等,深深感染了与会人员。

(洛阳教育)

李孝轩建议： 尽快明确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税收优惠政策

“民办教育可以弥补财政性公共教育资源不足,满足人民群众对多样性、个性化教育需求,但财政扶持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有必要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扩大社会力量投入教育。”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工商学院执行校长李孝轩表达了对民办教育的关切。

民办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9.15万所,占全国比重36.13%;各类民办教育在校生5616.61万人,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19.92%。

在李孝轩看来,目前民办教育扶持政策等方面还存在与民办教育分类管理不相适应的地方,如中央财政对

民办高校的扶持偏少,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企业所得税优惠设计有待完善等。

李孝轩建议,要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民办教育治理体系,为民办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要设立国家层面的“民办高校质量提升”专项资金,体现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国家扶持,发挥中央财政的引领和撬动作用。同时,省级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按照相应比例给予配套。

“要尽快明确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税收优惠政策,确立免税资格认定条件,激发社会力量进一步办好民办教育的积极性。”李孝轩说。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云南省委副主委,云南工商学院执行校长)

呼和浩特所有民办初中学费及住宿费继续执行2020年收费标准

近日,呼和浩特市部分民办初中学校上调学费、住宿费的问题,引发社会热议。为切实保障学生家长利益,4月22日市教育局责成属地教育部门对所有上调学费的民办初中学校予以约谈,进行价格干预。4月23日经市四区教育局、金川开发区管委会社会事业发展局与各民办学校约谈确定,全市所有民办初中学校学费及住宿费不再上调,继续执行2020年各校收费标准。同时,市教育局对履行相关程序不到位的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及相关学校进行追责问责。下一步,市区两级教育部门将继续加大我市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力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搜狐网消息)

李湘平建议： 打破政策“玻璃门”， 促进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有效落实显得尤为重要。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这一话题受到代表和委员们的广泛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东明石化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湘平建议，应进一步打破政策“玻璃门”，全面落实中央支持民营企业办学政策。

民办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任。近年来，民办教育取得长足发展。

国家层面也在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办学，相继出台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做好2020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性文件，明确提出：校企合作中，学校可从中获得智力、专利、教育、劳务等报酬，具体分配由学校按规定自行处理；在开展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基础上，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对进入目录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试点企业兴办职业教育的投资符

合条件的，可按投资额一定比例抵免该企业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李湘平表示，这些政策对于推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各地在执行过程中仍存在偏差、滞后和削弱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办教育的发展。例如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规定，“试点企业兴办职业教育的投资符合条件的，可按投资额一定比例抵免该企业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因对政策理解不同、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等因素限制，部分政策落实力度不到位、效果不明显，出现“最后一公里”问题和“梗阻”现象。

《十九大报告》指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为新时代民办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基于此，李湘平建议，中央从完善和强化政策落实制度保障的角度出发，着力在顶层设计、政策落地和内涵建设上下功夫，并督导地方加强政策落实力度，促进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东明石化集团董事局主席）

牛三平建议： 立足教育强国 开展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试点

教育是国之大计,大学是国之重器。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也提出,“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努力让广大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民办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应有之义。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山西省委副主委,山西工商学院董事长、院长牛三平建议,实施国家级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计划,通过遴选一批综合实力强、办学质量高、社会口碑好的民办大学,开展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试点,加快我国教育现代化和建设教育强国步伐。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战线正在努力提升自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我国部分民办高校已经获得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资格,一些民办高校拥有了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另有一些民办高校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省级教学成果奖。同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及其他国际资助项目的数量也在逐年上升。

“但由于目前国家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尚无国家层面的重点建设计划,这批质量高、声誉好的民办高校,只能

利用有限的办学经费做好学校日常的运营,无法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学校的发展也很难上到一个更大的平台。”针对目前民办高校的发展现状,牛三平如是分析道。

在牛三平看来,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不仅有利于弥补国家教育财政经费不足的窘境,培育和补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还有利于树立榜样标杆,增强民办高校的发展活力和竞争力;同时,有助于形成一流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之间的良性竞争格局,激发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快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征程,进一步增加国家核心竞争力。

牛三平建议,“按照‘扶优扶强、示范引领、以点带面、全面发展’的原则,国家可遴选一批综合实力强、办学质量高、社会口碑好的民办大学开展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试点,进而推进高水平民办高校整体建设。在全国民办高校自愿申报的基础上,遴选一批师资力量强、管理水平高、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好的民办高校,纳入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试点,从政策倾斜、经费保障、师资待遇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带动和引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得到整体提升,为推进教育现代化、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牢基础工程。”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山西省委副主委、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理事、山西工商学院董事长、院长)

朱虹建议： 加快民办本科职业教育发展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从2019年起,我国开始分批启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改革,目前已建设了22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学校,其中21所是“民办”,打破了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改革,不仅完善了职业教育办学层次,而且对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完整现代职教体系起到了积极作用,是实现职业教育“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重大举措。但在试点改革中,还存在对高等职业教育尤其是民办高等职业教育思想认识不高、扶持力度不大、师资队伍不稳、实训基地不强等诸多问题,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尽快探索和逐步解决。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转变观念,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从教育本质属性看,民办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肩负着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人才的重任。国家相关部门需树立教育只分质量不分身份的观念,坚持积极鼓励、大力支持、依法管理、打造特色等方针,加快推进民办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教育的美好需要。

二是加大扶持,深化职业教育改革。2019年的“职教20条”、《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等意见规定为试点学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许多具体改革举措,但试点学校的配置、经费资源等没有得到相应保障,大部分均需民办高校通过收取学费等方式自筹解决,这部分教育成本又必将转移到广大职业大学生身上。而国家对公办普通本科类院校,给予了生均经费等财政拨款支持。国家相关部门需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对地位同等的职业本科院校酌情给予一定财政补助,支持民办学校内涵发展,打造重点学科、特色专业。同时,对民办在校困难学生给予更多助学补助金,为其成长成才提供平台和保障。

三是改革创新,保障民办师资建设。经过多年发展,民办高职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整体结构已较为完善,但与本科层次职业高校对师资队伍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如高技术技能知识不完备、专业性能力与师范性能力相分离、教师队伍流动性大等问题仍较为突出。国家相关部门需在民办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社会保险、工作交流等方面出台更多改革政策,逐步落实职业本科试点民办高校教师与其他公办教师享受同等待遇,积极帮助解决民办职业本科试点学校引进高层次人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鼓励支持行业、企业的高级管理及技

术人才和能工巧匠到试点高校兼职任教,并给予相应的薪酬补贴;鼓励支持试点高校教师与行业、企业高级人才互相兼职,实现学校与行业、企业互融,教师与工程师互通等。

四是完善配套,提升能力培养水平。本科职业院校与其它普通院校的主要区别,就是以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以职业岗位为本位,突出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可以说,抓住了技术应用能力培养这个关键,就抓住了

职业教育质量。当前,各试点院校的实验实训基地等配套建设相对还是较为薄弱,无法很好地满足职业教学实践需求。国家相关部门需采取相应措施,支持 22 所本科职业试点院校加强实验实训基地等配套建设,树立“教育质量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生命线”的教学理念,探寻出一条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具有先进性、可操作性的实训基地建设模式,并逐步在其他高职院校推广开来。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中考新政下民校招生更强化“卖点”

上海市的民办初中昨天开始网上报名。“将来优质高中实行名额分配了,还要去读民办初中吗?”事实上,近三年来,全市民办初中整体报名人数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但民校热的余温尚在。

满足教育市场需求

家住长宁区的张女士,儿子今年小升初,对口摇号的三所公办初中里只有一所心仪的学校。按往年的统计,孩子所在的小学能够摇进这所公办名牌初中的人数不超过 20 个,大概率是进两所不太想去的初中。张女士是律师,丈夫自营公司的生意又主要在外地,夫妻俩早就想把孩子“全托”掉。于是,他们为孩子报了一所寄宿制的初中,这样,平日里家长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不用接送孩子、不用辅导作业,连早饭和晚饭也不用操心,到了周末一家人再团聚。

“现在公办初中几乎没有寄宿的,对于一部分家庭来说,又特别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民办寄宿制初中正好可以满足这个市场需求。”民办新纪元双语学校校长李海林说,除了可以帮到一些无力照顾孩子生活起居的家长,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不同的质量观、成才观乃至管理方式,或许也是吸引家长的重要选项。“很多民办学校是小班化,对学生的管理更精细、更精致。比如,我们学校提出的理念是‘陪伴孩子度过青少年时代’。既然是陪伴,就必然包括陪伴孩子从犯错误到改正错误的全过程。孩子在家会犯错误,家长一般比较包容,如果学校也多一些包容,孩子就很可能成长得更顺利些。”

提供多种升学路径

今年留给民办初中报名的时间是三天,明天截止。很多家长对要不要为孩子选择民校举棋不定。在上海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王健看来,这样的犹豫实属正常。因为,中考新政的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方案从明年起就要实施了,每一所公办初中原则上都能拿到市优质高中分配下来的名额,包括不挑生源的民办初中。以前民办学校最让人“不服”的是挑生源,现在摇号录取了,还会不会保持“高质量”,需要几年后中考的实证检验。家长不像过去那么冲动地“追民校”了,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民办学校能不能在不掐尖的情况下“低进高出”或“显著增值”还看不清、吃不准。当然,一些顶尖民校的光环仍很耀眼,长期积累的声誉和“印象分”,也是学校招生时的一块金字招牌。

王健还表示,公办初中的办学模式比较单一,学校只提供参加体制内中考这一条路径,但民办初中为孩子设计的成长路径则要宽阔一些。比如,很多民校有融合课程,有的还设有融合部,在保证开足国家课程的同时,还开设了国际课程,到了初二下学期,会让学生选择是升普通高中,还是升国际高中。这就很讨巧,也是民校的重要“卖点”。

(新民晚报;有删减)

我国家校共育的问题及对策

□ 朱永新

所谓家校共育,通常是说,使家庭、学校、社区充分联系起来,构建全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使教学资源得到更大的拓展,并且可以让家风朝良性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让参与各方能够做好协调工作,让孩子、家长、教师都可以一起发展,拥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家校共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家校共育有助于家庭发挥其教育功能。把学校的孤军奋战变为家校携手共育,使得家庭的教育力量得以充分发挥。其次,家校共育有助于建立现代的学校制度。家校共育强调重视学校与家庭、社会的互动过程,通过制度的安排协调校内和校外的关系,充分发挥家校社利益相关者在现代学校制度构建和发展中的作用。再次,家校共育有助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学校教育满意度的提高。家校共育能够让师生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家庭关系也能够更加稳定温馨,更有助于父母孩子的成长以及和谐社区的建立,能够增强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从许多家校共育的案例中,我们都能够了解到父母的参与给学校管理带来的巨大力量,以及对学校生态的改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停课不停学”使得孩子们的学习场景和学习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学生在家

学习的时间大幅增加,亲子关系与家校共育显得尤为重要。在未来社会,随着家庭教育重要性的日益凸显,家校共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家校共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这些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家校共育问题非常关注,并且多次提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问题,有关部门和地区陆续出台了不少家校共育的政策,各教育主体也越来越认识到家校共育的重要性,一些地方和学校已经进行了很多家校共育的实践探索,涌现出许多创新之举,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对家校共育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国家对家校共育问题非常重视,相关部门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其中都提出了学校要切实承担起对于家庭教育的指导责任。不过,通过调查可以清楚地了解到,92.1%的人表示,该义务应该是由教师承担的;55.1%的人表示,对家庭教育进行一定的指导,应该体现在道德上,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学校和教师认为自己的职责主要是传授各学科科学文化知识,思想道德教育以及指导家庭教育并不是必需的,甚至认为是增加了工作量,对家校共育活动采取消极态度。学校只有在

学生遇到某些问题、需要和父母讨论学习成绩或者需要父母给予配合的时候才会和父母进行沟通。

父母对于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也存在缺失的现象。《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指出,一些班主任表示,在他们教授学生的家长中,50%以上的家长并不清楚自身在教育孩子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这是教师和学校的一种义务和责任。

父母和教师对于家校共育的意义和价值认识不够,导致双方经常出现互相推脱责任或者相互裹挟的现象。比如,教师让父母监督、辅导和检查孩子作业,参与手工制作等,父母成了教师的助教,家庭教育变成了学校教育的附庸。有的父母也会对学校、教师进行责任的推诿,认为孩子上学了,有关的教育无论是文化知识的传授还是思想品德的培养都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自己只需要保障孩子的身体健康、满足其基本的物质需求就可以了,缺少参与学校管理的意识。

(二)缺少长效运行管理机制,很多家校共育方式流于形式

尽管教育部有相关文件规定,家长委员会有三种职能:在学校管理中发挥作用、在教育工作中积极参与、沟通学校与家庭。但是,有关研究数据表明,只有27.1%的小学校长、18.7%的初中校长认为,家长委员会的作用比较突出,推进了学校的相关决策的制定;只有29.2%的小学校长、20.8%的初中校长认为,家长委员会的作用比较突出,为教学工作带来了大量资源、帮助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缺少长效运行的管理机制,国家虽然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要求各中小学校建立家长委员会,但并没有说明具体的操作规则,很多家长委员会没有规定明确的权责、义务,没有建立长效的运行机制,在实施过程中容易流于形式。

在家校互动的方式上,很多家校共育的活动是以学校为主导,往往是学校单方面向父母传递信息,忽略了父母的需求和资源,父母只是配合学校,真正的参与度并不高。还有些父母虽然有很强烈的参与意识,但参与行动却不高。

(三)家校共育的沟通机制不畅

虽然家校之间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意识越来越强,但学校和教师仍然占据家校沟通的强势地位,父母缺少说话的机会,出现了沟通中一方的“沉默”现象,这是低效沟通或假沟通的一种典型表现。也就是说,即使是父母在有能力促进家校共育的情况下,出于某些原因,也选择沉默。

从家校共育的沟通内容看,应该是以儿童的发展为中心,目的是服务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过,通过对当前家校合作的情况进行调查可以看到,当前的一些交流一般集中在学习、成绩等内容上。虽然家长与教师保持了良好的沟通,但沟通最多的还是“学习”、“成绩”等内容,不是很有兴趣了解家庭教育、孩子爱好、交往等相关的内容。

(四)教师和父母家校共育的胜任力不足

相关调查表明,差不多全部的班主任都有共识:要想做好家校合作,需要教师具备更出色的能力。但许多教师缺乏应有的家校共育能力,胜任力明显不足。首先,教师在该领域没有足够的相关知识。在相关的培训活动中,对于家校共育部分没有涉及。其次,没有太多的互动手段,很多年轻教师在遇到和学生父母沟通问题时经常面露难色,不知道如何处理,甚至还会造成家校冲突、矛盾。再次,不少教师没有真正了解家校共育的价值所在,也不清楚自己在其中的定位,所以家校共育的相关行为就会出现偏差。据统计,有不少教师表示,不需要帮助家长提高他们的家庭教育知识与技能用以处理相关的家庭教育问题,这一数据达到了13.9%。

家庭是非常重要的,父母在孩子的一生中更是占据重要的地位,家庭教育应该从自发走向自觉。但是目前,在家校共育方面,父母对学校 and 教师的依赖性很大,他们的家庭教育观念、方法和能力都有待提高,而学校对家庭教育的支持力度还不足以满足父母们的需要,家校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合力。

二、加强家校共育的对策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这段话对新时代家庭教育建设和家校共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进一步完善家校共育的法律法规,加强制度建设

要将相关的事务做好,就要有完善的制度作为重要的前提。一直以来,党和政府对制度是非常重视的,持续推进制度建设,并且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法规,有效促进了家校共育的发展。早在2010年2月,相关部委就已经积极开展行动,推出《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在后续的日子里,为了适应发展需要,又相继推出一系列文件,其中就包括《关于进一步加强家长学校工作的指导意见》,有效推进了相关工作的开展,为家校共育带来了重要的政策支持。2015年,教育部通过对当时的教育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有针对性地推出《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2016年,经过协调磋商,全国妇联联合教育部等部门一起推出《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正是有了这些文件,进一步促进了家校共育工作的落实,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相关部门也在积极行动,协同引导家庭教育工作的开展。

但是,《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并没有明确规定不同部门的职能,这就导致各部门存在职能交叉的问题。在具体实践中形成了比较灵活的格局,其中,最为典型的模式有三种。一是淮安模式。该模式的牵头部门是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江苏淮安教育部门和政府部门加强合作,建立了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加入的家庭教育领导小组。在具体执行上,主要由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执行。同时,积极鼓励已经退休的老干部和教师等建立代理家长的制度责任,成立专门的志愿者服务队,为学生建立成长档案,记录、关爱孩子的成长。二是中山模式。该模式的牵头部门是妇联。广东中山妇联开设了中山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具有事业性质的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该中心设置了专门的人员编制,主要职能就是进行家庭教育方面的工作。之后,还成立了指导师协会,邀请家长进入课堂学习,加强不同家庭、家长之间的互动。中山市之所以能在家庭教育方

面表现优越,主要还是当地妇联加大了对项目、人员等方面的投入。三是潍坊模式。该模式的牵头部门是教育局。潍坊市教育局高度重视家庭教育问题,成立了专门的指导中心、中小生长成长导航站、中小学健康成长研究中心等专业机构,成立中小学家长联合会,形成了政府主导、教育主管部门全力搭台,社会全面支持,加强对不同部门的整合,建立健全了家庭教育运行机制,开展了“亲子共成长”工程、“父母大讲堂”公益讲座、“家庭教育乡村行”等活动。通过这些实践可以发现,虽然各地牵头部门不同,但只要政府足够重视,就会做好此项工作。然而,从家校共育的长远发展来看,这项工作还是需要教育部门的重视和协调。

另外,学校和家庭要各司其职。家庭教育的本质是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去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子女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等。学校教育具有较强的制度性,各项要求比较明确,在具体目标和制度管理方面都有明确要求,要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来培养人才。但当前家庭教育学校化的情况比较严重,在家校共育实施过程中如何避免家庭教育缺位和学校教育的越位,也是即将出台的《家庭教育法》应该进一步明确解决的问题。

(二)学校要为家庭教育提供专业的指导,为教师赋能,加强父母教育培训

为了提高教育质量,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于2019年6月颁布,其中强调了学校需要承担的职能。在家庭教育中,学校要充分发挥其指导和服务的功能,为家长提供指导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联系,建立更加和谐的家校关系。教师是家校共育实施的具体执行者,这就要求教师能够有家校共育的胜任力去指导家庭教育。为教师赋能,提升教师家校共育的专业素养必不可少。一方面,教师要通过自主学习,提升对家校共育的认识;另一方面,学校要为教师搭建家校共育的学习、实践平台,重点要增强教师特别是班主任的家庭教育指导意识,提升其指导能力。但是,如何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不断提升教师

在指导家庭教育方面的能力?人才、资源、资金从哪里来?这些也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家长作为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家校共育的另一方,要从思想上让他们正确认识到家校共育的重要性,首先就是要进行家长教育和培训。打造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队伍,根据父母的需要开设父母教育课程,目前也迫在眉睫。

(三)支持家校共育的平台和载体建设

一是家校合作委员会。家校合作委员会和现在许多学校的家长委员会有着不同之处,家校合作委员会必须有家庭、学校、社区的三方代表参与,分为班级、年级、学校三个层面,是学校治理中的一个法定机构。为了能够使家校合作委员会的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可制定《家校合作委员会章程》,规定家校合作委员会的权利、责任、义务以及运行机制、管理机制等具体内容。

二是父母学校。父母学校也就是现在大家普遍说的、学校普遍设立的家长学校。但是,考虑到“父母”比

“家长”更加平等、民主,更倾向于用“父母学校”的提法。父母学校是家校共育的重要平台,如何保证父母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父母学校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从父母学校的课程纲要、标准、教材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落实。

(四)整合资源,发挥社会资源的作用

从根本上说,家校共育是一种协调学校、家庭、政府以及社区关系的培育方式。虽然学校和家庭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但社区融合也必不可少。社区要积极配合家庭和学校的各项活动,利用自身优势,建立更好的资源开放机制,确保家校合作能有效发挥,这对于教育质量的提升和美好生活的创建大有裨益。与此同时,还要积极鼓励民间机构的发展,通过家校合作的方式,建立共育机构,同学校形成联盟,加强合作,共享各种教育资源,确保家校合作共育实现更好的发展。

(作者系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来源:《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

甘肃省民办教育协会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甘肃省民办教育协会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近日在兰州召开。甘肃省教育厅民办教育管理处处长王守斌出席大会并做党史学习教育动员讲话。甘肃省民办教育协会会长房忠,党组织(筹)负责人、副会长李佳宁,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孙喜模,副会长魏玺宇、管兴、陈孚等协会领导参会。协会各专委会主任、副主任,以及各会员单位党政负责同志、优秀教师代表,共约80余人参加了大会。

甘肃省教育厅民办教育管理处处长王守斌作了动员讲话,部署了甘肃省民办教育协会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协会党组织(筹)负责人、副会长李佳宁宣读了《甘肃省民办教育协会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该方案是协会领导及各专业委会根据民办教育学校的实际情况,反复酝酿修改后通过的。

会上,兰州信息科技学院、兰州外语职业学院、甘肃远大继续教育专修学院、兰州市城关区小燕子幼儿园、兰州新亚中学等院校(园)还进行了经验交流发言。通过他们的经验介绍,从不同角度解析了党史“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深刻理解了在全党全社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各单位总结的共同经验是高度重视、精心部署、组织有力、形式创新、灵活多样、贴近实际、求真务实。大家纷纷表示,各单位党史学习教育和党建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协会党组织(筹)负责人、副会长李佳宁代表协会党组织,就本次会议精神的学习贯彻作出部署。要求各会员单位将学党史、抓整改、正行风作为自选动作,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提高学习教育质量。

(兰州晨报)

家校社协同育人实施策略

□ 储朝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此前，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草案）》进行审议，草案强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协调一致”的原则。家校社协同育人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并纳入教育部 2021 年工作要点。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价值定位确定后，采用什么样的实施策略就成为决定其成效的关键因素。

一、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践状况

事实上，全国各地在实施《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的过程中，已开始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但工作效果离预期仍有距离，表现为：

1. 家长和社会在总体参与上不够充分。笔者曾到基层家庭教育指导站实地考察，发现家长参与的记录数量少、内容简单，妇联、教育部门、学校和指导站的材料和工作产品较多，家校社之间沟通不畅，显得剃头挑子一头热。

2. 已有社会教育资源的针对性不强。在社区，现有

儿童活动设施、场所和材料的使用率不高。一些儿童活动场所陈设的书籍资料没有阅读过的痕迹，内容与家庭教育和儿童需求不符，活动材料多数未有使用痕迹，显示育人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不高，协同得不够。

3. 家庭教育工作和社会教育工作的专业性有待提高。当下，家校社协同育人三方人员的专业水平存在差距，社会教育缺位较多，家庭教育存在定位模糊、方法不当等情况也比较普遍，家长和相关当事人对家庭教育资源的判别能力。在开展活动的主题选择上针对性不足，对家长或孩子急需解决的问题感知敏锐程度不高，开展活动的方式看重热烈对实效重视不够。更好发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育人作用，就必须对它们的专业性提出更高要求。

4. 各地工作不均衡。在重视程度、组织、机构设置、工作效果等方面都显现不够均衡，甚至差距较大。

基于上述实际，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积极推进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形态升级转换。现有的家校社协同教育形态主要为讲座、亲子活动，以组织方为主，具有较强的组织方意图表达特征，目的性不够明确，存在泛化现象。家长在其中明显处于被动受

教地位,主办方为主的痕迹过强就难以与家庭真正协同、平等、互动,需要进一步向以学生成长为本的方向转向,体现家长参与共同做主,社区、学校都需要提高对家庭教育的点对点的服务,提高活动效率,增强各方参与家庭教育的专业性、协同性。

二是进一步明确协同育人不同主体的责任与权力边界以及合作的有效方式。多主体协同,不仅需要提高服务体系内的各方到点率,还包括认知、信息、利益、问题聚焦等各方的沟通交流。在协同中,要避免相互错位、越位、重叠、推诿,才能有效实现协同育人。这个机制本身需要对相对处于被动的家庭有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家庭参与到协同程序中来,才能扩大家庭教育服务活动的影响面。

三是政府在家校社协同育人需要自我优化升级。家校社协同育人,落脚点在为党育人、为国育人,要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重视工作效果而不仅仅显现到场了。政府相关部门作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一方,对所开展的工作做好自我评价、分析、总结;或通过第三方专业评价,优化下一步开展的工作。现在各地开展的工作既有简单复制的部分,又有显得庞杂、泛化、对象与主题不够明确的内容,效果呈现不充足,程序有待规范,绩效有待提升。

二、找到共同关心的问题并在解决问题上协同

在中国,家庭和社会对教育高度关注。但为什么在家校社协同活动中,家庭和社会的参与度又不高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家庭和社会认为相关部门开展的协同活动隔靴搔痒,针对性、有效性不强,选题不在他们的关注点上。

要想实现家校社协同育人,首先需要在“协同主题”上达成共识,即解决各方都想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单方面确定主题。那么,家校社三方都能达成共识的问题从哪儿来?它的范围可能包括教育法律法规、政府政策关注的问题、未成年人成长中存在的问题、学校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家长关注的问题,等等。但并不是所有这些问题都能被三方认可为协同育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些

是家长认为学校就能解决的问题,或是学校认为家长就能解决的问题,或是政府部门想解决的问题而家长未必想参与。

从协同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角度,协同要解决的问题当具备如下条件:该问题单靠某一方面无法得到彻底解决;该问题的严重程度确实引起至少两个方面的注意,如当下学生的学业负担问题、身心健康问题、焦虑过度问题、手机管理问题等;各方感到自己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有责任与义务;相关各方确认自己在解决问题上有能力,能够在某个环节发挥作用,发生效果。

符合上述条件的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会随客观条件变化,还会与各方当事人的认知直接相关。因此,共同关心的问题确定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才能形成共识,包括沟通、协商,甚至实地调查,对所要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加深认识,确定各方责任与权力边界。

由于不同主体对问题认识的深浅、先后、快慢各不相同,协同推进也很难同步。而一些政府部门或学校习惯整齐划一,往往欲速不达。从策略上看,不妨采取分层协同与分类协同的方式,尽可能将对某一问题认识程度接近的人放在同一个协同圈,或将关注同一问题的人放进同一个协同圈。

三、在平等尊重相协商基础上建立协同育人机制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没有标准的固定模式,它是能够将三方联系起来服务于育人的常态合作体系,从而将立德树人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在内容、方法、效果上各有特点,功能上各有优劣,三者应各扬所长、功能互补、协调统一,延伸学校教育的有效性,创造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和谐统一,实现家校社共育,获得学生快乐健康的成长,推动教育品质提升。

世界各教育发达国家几乎都开始重视三方协同机制的建立,由于学校是比较早建立且相对成熟的教育体系,所以多数国家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是以学校为基础,增加家长、社会参与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一开始可能

是共同开展活动、建议,逐渐形成方案、协议,继续发展成组织形态,再上升为政策、法案,逐渐制度化、法规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草案)》立法进程的加快和《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在2021年工作中将“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列入日程,并明确其目标任务:发挥学校指导作用,明确家长主体责任,研究建立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体系。具体的工作措施有:制订家校社协同育人有关文件;发挥家长学校、家长委员会、家长会等作用;有序推进《家庭教育指导手册》的宣传推广和应用工作;落实《家长家庭教育基本行为规范》;强化综合实践育人,积极开展研学实践、志愿服务等综合实践教育。

可以看出,目前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已经形成自上而下的强大动力。建立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政策、法律基础正在逐渐成熟,但离有序、有效、完备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真正建立还有一段较长距离,在工作策略上需要注意:

首先是以恰当的方式利用政策与法律资源。政策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性,但是对它的使用又必须明了其适用范围、情境,使用的方式、对象、力度也需要合情合法合理。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中,法律主要起合法性基础作用,特别是明确政府部门和公立学校在其中担负的责任,很多时候不能直接用于处理家校社协同建设的具体问题。在政策的导向、规范之下,依然需要当事人灵活应对、处理各种问题,体现教育智慧与艺术性。

其次是要以平等尊重相互协商为基础。在协同育人机制建设过程中,代表学校或政府的相关当事人必须与家长、社区工作人员、专业工作者平等相处,相互尊重,遇事协商。在当下,多数人平等协商的技巧与技能较低、意识也较薄弱。因此,三方协同育人机制中,最大难点之一是各方既要明确自己的身份职责,又要淡化各自的身份等级,平等尊重,相互协商,这也是能否真正建好三方协同育人机制的关键。政府部门和学校的相关当事人尤其需要慎重对待,精心筹划,精密施工,让家庭和社会积极参与是机制正常运行的前提。

再次是立足于形成相对稳定的业态。家校社协同育人真正有效的可持续的机制应该是一种业态。比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能不能成为一种业态?家长是否愿意适当分担成本,自己掏钱像送孩子进各种校外补习机构那样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购买服务?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家校社协同不再局限于一村一乡一校的范围,尤其是在教育资源提供者中,已经逐渐超越具体的实体学校和教育机构,这使得家校社协同育人业态很复杂。

从长远发展看,家校社协同育人不可能长期排拒市场,也不可能在没有业态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作为整体教育新业态的组成部分,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伴生的业态非常复杂,其深层涉及教育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不当又会成为敏感点或死结,处理得当则家校社均可获其利。但现实中由于三方在其中的利不相同,也未必一致,成为难以协同的源头。所以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建立之初就需要设计好、规范好、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用其利避其害。

同时,需要不断提高三方协同育人机制的专业含量。必须明确并处理好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行政性与专业性关系,形成密切有效的配合。各地调查显示,很多地方把它设定为行政性较强的机制,普遍忽视其专业性,使其运行具有不确定性:有文件要求就开展工作,有热心的领导就能开展工作,被动、依赖性较强。因此,不断提高三方协同育人的专业性成为长期需要。唯有提高专业性,才能持久增强协同育人的主动性、可持续性,才能拓展并准确定位工作内容与主题,才能对育人发挥更加独特、重要的作用,协同育人机制才有其存在价值。

四、在协同基础上不断破解新难题

家校社协同育人是因为要解决从前不协同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产生的。如果在较长时期里,三方协同不能够不断发现新问题,没有准确及时抓住未成年人成长发展中的问题,并尽快有效解决新问题,而只是例行公事,协同最终必然只剩下形式而无内容,从而失去生机,还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其存在的价值就大大降低,还有可能成为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所以在开展协同育人之初,既要看到协同有其优势,能够发挥更为强大的功能;又要破除“只要协同就自然会更好、就能解决各种问题”的主观想象。三方协同育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探索,不断调查,不断发现新问题,不断解决新问题。

正因为此,各学校、不同班级的家校社协同育人不能是千校一面,要有个性,有特色,根据其资源、条件、遇到的问题 and 各方主体的能力特征形成独特组合,发挥独特作用。如面对手机管理问题,不同班级可以依据本班实际进行管理,需要依据孩子的年龄和发展状况,与家庭一道培养孩子合理安排时间、适度使用电子设备的自控力。在课后衔接服务方面,事实上社区可以积极作为的,根据当地的自然、文化资源和特色,联合一些区内机构开展接纳学生参加的课后活动,可大多数社区并不积极,以为那是学校与家庭的事。

从治理角度看,三方协同成员都有表达和参与决策

的权利,这样的协同才会是常新的,才会有动力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比如,有些地方举行家长会,是教师与家长一对一;但在大多数学校,家长会是一位教师召集全班学生家长。表面看只是形式的差别,实际上包含对人的基本假定、对私密性的态度、对三方协同的方式选择和是否能发现真的问题等一系列差别。

此前人们少用“家校社协同”的表述,但事实上,教育从来都是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协同合作的结果。之所以要明确提出家校社协同,是希望将这方面的教育功能更加充分发挥,更好地协调、利用各方面资源提高育人效率,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各司其责、共同面对新挑战。在家校社协同的各个领域、各种问题上都有广阔的新空间,在具体的地域和学校微观层面的个性化探索是无止境的。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来源:人民教育)

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民办教育分会成立

4月23日下午,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民办教育分会正式宣告成立。据介绍,该分会主要任务包括组织开展民办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组织开展民办高等教育教学协作和学术交流活动;组织开展民办高校办学现状调研,反映民办高校发展诉求;组织交流有关民办高等教育的办学经验,编辑出版民办高等教育的学术论文集和信息资料;推动民办高校与其他部门、行业、地区以及海内外民办高等教育学术团体、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组织民办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培训,加强民办高等教育专业化水平;接受有关部门的委托对民办高等教育教学工作进行评估等。

“分会将竭力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群策群力,着力破解影响民办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性、体制性、机制性矛盾和问题,总结推广国内外民办大学办学的先进经验,共同服务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大局。”民办教育分会首任理事长、武昌理工学院校长赵作斌表示,民办教育分会将开展多种形式的论坛和调研等交流活动,实现资源共享,助推各成员高校做大做强。

随后,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民办教育分会首届民办大学发展论坛举行,来自全省40所民办高校的70余人参会。洪艺敏作《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方向与要求》主题讲座,武汉学院党委书记陈祖亮作《民办高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武汉学院探索与实践》主题报告。

据悉,首批民办教育分会会员单位达40家,其中本科高校会员单位31家,专科高校会员单位9个,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湖北是民办高校大省,拥有民办本科、专科高校共44所。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应佳介绍,湖北民办教育迅速崛起、高速发展,阵容强大,各项指标在全国位居前列。其中民办大学数量居全国第四位,其中民办本科高校数量居全国第1位,民办大学在校生数量位居全国第5位,民办本科学生数量位居全国第4位。

(人民网)

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构建策略

□ 高书国

家庭是最小的社会细胞,家庭教育是最原始和悠久的历史形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进行家庭教育知识普及、理论学习、方法指导和资源服务的整体系统,是家校协同育人重要的组织机构和实施载体。实现家校协同育人、共同育人,家庭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是最大短板。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加强对家长的教育指导服务,构建学校和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街道、社会、镇村、家庭协同育人格局,推进共同育人,进一步明确了家庭教育服务指导体系的育人目标。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and 家校协同育人格局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教育发展的战略性任务。

家庭教育具有私密性和公共性的双重特征。随着教育公平水平的提升,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在立德树人、

提高质量和全面发展方面的共识度日渐提升。家长和学生接受公共教育的政策需求、资源需求更加迫切,更具包容性;公共教育资源有能力也有余力进入家庭领域,更具突破性。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总体要求围绕着一个中心:以协同育人为中心,核心是实现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参与、协同育人;构建以治理体系、网络体系、供给体系和人才体系四大支柱为主体的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基本框架。“十四五”期间,初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主体参与、多部门支持、多层次布局的城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立全员、全程、全过程育人体制机制;到2030年左右,形成体制健全、制度完善、资源丰富、协同高效的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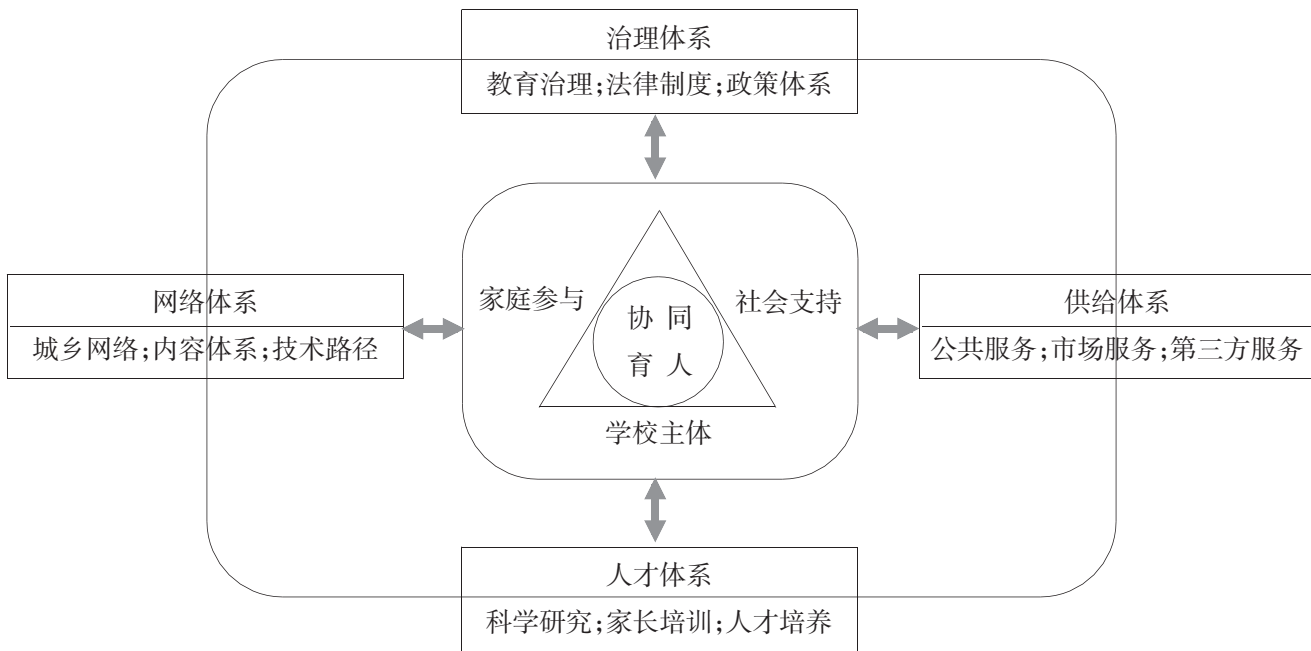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有“四大支柱”。第一,治理体系。以法律制度、规章制度、政策体制和治理能力建设为引领,改革和完善现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领导体制、组织体系和治理模式。构建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评估和资质鉴定制度。第二,网络体系。现代信息网络体系是家庭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特点和技术支撑。建立以组织网络为主体、信息网络建设为基础、服

务升级为手段的现代化城乡家庭教育服务体系。第三,供给体系。以家庭教育供给侧改革为突破口,强化政府对教育的主导责任,扩大和提升公共资源服务家庭教育的范围及水平,提供多样化的家庭教育服务,满足儿童多样化发展的个性需求。第四,人才体系。改变家庭教育人才培养、人才服务不适应的局面,全面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家庭教育科学研究,培养一大批具有现代理念、科学精神、技术方法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队伍。

第一,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治理模式。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是一个逐渐成长成熟的过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家庭扫盲,到改革开放后的家庭教育服务;从《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0-2020年)》,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作用不断完善、功能不断丰富。伴随着中国教育基本实现现代化,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家庭教育特别家校协同育人,成为提高教育质量和育人水平的关键环节,建立健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治理模式迫在眉睫。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教育、妇联等部门要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支持服务家庭教育”。这些观点明确了

办好教育事业的共同责任,指明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发展方向。

构建与中国教育总体现代化需要相适应、与家校协同育人相配合、与家庭教育发展相匹配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要考虑以下几点。一是健全组织。在国家 and 地方层面建立教育、妇联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家庭教育指导(委员会等)组织领导机构,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支持服务家庭教育。建立现代化的组织系统、决策机制、政策体系和协同机制。二是法律支持。加快《家庭教育法》的制定与出台。系统制定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家校协同育人方面的系列配套政策,为协同育人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持。厘清家庭教育中政府的公共责任、学校的主体责任和社会的参与责任,明确各方的任务范围、参与模式和服务边界。三是规划引领。将“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纳入国家“十四五”教育规划,进一步明确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目标、构建主体、构建方式、构建策略和实施步骤。四是增强本领。全面加强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及教师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能力建设,增强学习本领、组织本领、指导本领和服务本领,形成组织决策、规划执行和评估监测相衔接、统筹协调的新时代家庭教育治理服务体系。



第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网络建设。针对当前存在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不平衡、不充分、不健全的问题,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健全“互联网+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网络体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要突出如下四个主要功能。一是系统链接功能。通过健全组织网络和信息网络,将全国各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汇聚起来,形成网络体系。二是资源传输功能。通过实体传输、虚拟传输等形式,向家庭传送优质家庭教育资源。三是需求反馈功能。建立开放的国家、地方与学校为主体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网络平台,及时收集信息,把握需求,完善资源服务体系。四是评估研究功能。加强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的引导与评估,运用大数据加强家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十四五”期间,在总体设计的基础上,重点抓好组织模式、教育资源和网络建设,基本建立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在2025-2030年的“十五五”期间,重点抓好制度构建、水平提升和质量提高,建立比较完善、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现代化体系。在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按照系统论的思想,从地理空间(实体空间)、网络空间(虚拟空间)两个维度,设计建立国家、省级、地市、区县、学校五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教育行政部门特别是家庭教育科研机构研究和确定“覆盖城乡”的内涵、标准、路径和策略,明确责任者、时间表和路线图。鼓励地区、学校、社区开发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实验,建立家庭教育服务实验区。

加强以中小学为主体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社区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为家长提供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这是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校的重要责任与功能。进一步整合发挥妇联等社会组织长期以来建立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与机构的作用,以全国中小学为主体,以乡村学校为重点,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第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资源支撑。进入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家庭教育进入现代化教育发展新时代。家庭教育需求旺盛与资源供给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十分突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资源供给要立足现代化家庭教育发展愿景,整体谋划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城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宏观战略资源、中观政策资源和微观服务资源的供给模式。一是提升家庭教育的战略地位,以中央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将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纳入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确定总体思路、总体目标和总体策略。二是国家研究制定《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的纲要(2021-2030年)》,地方制定配套政策文件,探索建立国家和地方家庭教育经费列支制度,增加家庭教育公共财政资源供给。三是推进家庭教育资源供给侧改革,倡导政府、市场、社区、学校等多主体参与,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准入机制和准入标准,逐步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保障水平。

家庭教育资源供给要关注公平性。坚持教育公平原则,改变过度市场化的供给体制和供给模式,加大政府公共教育资源对居家学习、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支持;高度关注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将教育扶贫精准延伸到贫困群体与贫困家庭的家庭教育,为其提供公共性、公益性、高质量的家庭教育指导与服务。

家庭教育资源供给要关注多样性。紧密结合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家庭教育发展需求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在确定教育公平的前提下,促进家庭教育资源的多样化供给。《决定》明确指出,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因材施教原则,进一步改革家庭教育的供给方式,按照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通过政府、市场和第三方等不同供给主体,努力开发多种形态的家庭教育服务产品,为全社会提供丰富、多元、标准和优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第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人才保障。人才匮乏是中国家庭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

的突出短板。从管理层面来看,家庭教育管理机构与人员大多是“半职半责”;从学术层面来看,家庭教育研究者大多是“半路出家”;从操作层面来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者大多是“半知半解”。家庭教育现代化是国家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家庭教育的现代化就难以实现中国教育整体现代化。但是,目前这样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队伍,难以实现家庭教育管理的现代化;这样的研究队伍与研究水平,难以实现家庭教育思想的现代化;这样的指导队伍及人员更难以实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水平的现代化。突破人才建设瓶颈,是构建现代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关键所在。

要将家庭教育人才培养纳入正规高等教育体系。在全国师范类高等学校,推广东北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设置家庭教育硕士研究生班的经验,有计划、成规模地培养高层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人才,并负责开展对省地市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人员的系统培训。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人才优势,在省级以上教育科学研究机构 and 重点师范大学设立家庭教育研究机构,汇聚家庭教育研究力量。要组织开展家庭教育重大课题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以课题为引领,以提升家庭教育研究指导水平为目的,深入挖掘中国古代优秀家庭教育思想与文化,系统、科学、持续地研究家庭教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家庭

教育理论体系,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提升学术支撑,带动和促进家庭教育人才培养与成长。要发现和培养一大批优秀家长人才,帮助其总结成功经验,提升理论水平,让优秀家长走上讲台,让好家长做教师,教育家长。学校与家庭同样是教育的主要场所。同时,进一步丰富家庭教育资源,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努力办好各级家长学校。高度重视家庭建设,提升家长素质,广泛培养好父亲、好母亲,培育书香家庭,形成良好的亲子关系,促进家庭可持续发展。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以中小学教师为主体,加强对教师有关家庭教育知识、能力与指导方法的培养培训,将家庭教育意识和能力作为新教师准入和在职教师考核的重要内容,努力让中小学教师成为一支具有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双重能力”的优秀教育人才队伍。进一步发挥家长及家长委员会在协同育人中的积极作用,搭建共育桥梁,形成共育机制,创设共育生态。学校、家长、社会要积极实现目标同向、体系同构、资源共享,共建家校协同育人“旋转门”,共同撑起一片协同育人、共同育人的广阔蓝天,努力将下一代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培养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业的时代新人。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研究员;来源:《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

广东规范幼儿园招生:不得考家长和幼儿,不得收赞助费

广东省教育厅近日发文对2021年幼儿园招生工作作出安排,要求不得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等费用;除健康检查外,不得对幼儿和家长进行任何形式的考试或测查。

广东省教育厅指出,幼儿园应当按照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的招生范围、规模和班额,合理编制招生计划,不得设置提前教授小学课程内容的学前班。幼儿园招生实行免试入园,除健康检查外,不得对幼儿和家长进行任何形式的考试或测查。同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本地区已取得办园资格的幼儿园名单向社会公布,在招生期间设立咨询投诉电话。幼儿园的招生简章(广告)内容应实事求是,并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在招生流程上,要求幼儿园要按照便民、高效原则进一步简化招生入学办理手续和证明事项,优化招生工作流程。要遵守国家和省幼儿园收费的相关规定,不得在规定范围外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标准,不得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等费用。

(新京报)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必须抓牢类型特征

□ 马陆亭

我国已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必须与社会经济相适应相融合,教育体系建设具有纲举目张的整体牵动效应。自2014年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多部委联合编制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以类型为特征的体系架构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新建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试点等改革探索活跃。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宗明义指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在教育领域的引领句分别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都落在了教育体系上,说明了体系的重要性。如何抓稳抓牢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健全完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实现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是“十四五”时期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现代职业教育地位空前之高

“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面向完整产

业链条,职业教育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替代,服务和影响着整个社会,因此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

(一)职业教育是与社会直接接口的教育

职业教育是直接面向社会、对接岗位需求的技术技能教育,与高等教育共同构成了年青一代通往工作的“双车道”。即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未来基础教育毕业生不宜再直接进入社会劳动力市场,而必须经过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环节。基础教育的作用顾名思义是“奠基”,不是为直接进入职场服务的。过去的确存在着大量义务教育阶段或普通高中毕业生直接进入工作岗位的现象,但这种情况只能适应粗放型发展阶段,是不符合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的。年轻人经过职业教育或专业教育,有序进入劳动力市场,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但仍有一半左右的人群不能接受高等教育,需要及时就业,这一庞大的人群应该经过良好的职业教育环节。同时还要看到,2020年高职(专科)招生483.61万人,占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的52.9%,^[3]据有半壁江山。此外,还有本科高职及转型高校、独立学院等直接或间接的职业教育成分。巨大的人群、独特的功能、旺盛的需求,决定了职业

教育的不可替代性。

（二）职业教育质量决定着产品质量的高低

职业教育在产品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产品质量的基本保证。成熟的现代产业离不开发达的职业教育。较之于传统产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现代产业更加依赖科学创新和技术进步。现代产业的先导靠创新,新型产业的兴起需要创新并通过技术实现与形成产品达成,这一过程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及科研服务紧密相连。但产业的繁荣过程,最终要靠满足市场需求的众多有质量的产品来形成和体现,优异的产品质量离不开工匠精神,必须依靠大量的技术技能应用型人才。

（三）职业教育是现代社会的民生基础

职业教育传播着生存和劳动的基本技能,涉及社会的各行各业,服务的对象面大量广,是一个基本的民生议题。现代产业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向前发展的,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越来越强并逐步走向智能化。现代科技如“水”和“电”,是社会的基础性环境性要素,现代“文盲”将是信息化智能之盲。因此,现代社会民生的底部在抬高,覆盖领域在增加,覆盖人群在扩展。职业教育过去就是个民生问题,将来更是重要的民生议题,并在新时代教育的民生性作用发挥上更加显现主导地位。职业教育不仅通过产品质量影响人人,而且通过教育教学活动服务人人。

（四）职业教育影响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跨入“十四五”,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各项工作的重点,既需要抓关键也需要补短板。创新和应用不可或缺,创新是心脏动力,应用是血液循环。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既覆盖着教育的庞大群体,更满足着社会的巨大需求,其发展质量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

在经济社会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制造业强国建设是重中之重。制造业是大国国力之基,是国内大循环主体之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以强大的制造业为后盾。相关产品汇聚形成产业,各行各业丰富多彩的产品是社会繁荣、国家强盛的标志,而它们都是由“制造”而成;围绕产品制造还会衍生新的产业,由此环环相扣构成产业链的高中低端。因此,制造决

定未来,我们正在由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强国,而遍布社会、朝气蓬勃、技艺精湛的产业大军,是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职业教育的生命力所在。

职业教育是个人才智的放大器,是产品质量的推进器,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器,是国家实力牢固可靠的定海神针。

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困惑空前之大

在职业教育得到高度重视的同时,困惑依然存在且巨大。重视主要来自社会的旺盛需求和国家的殷切期望,困惑则源于它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高。似乎较之于高等教育创新的“高大上”和基础教育人生理想的“奠基作用”,职业教育的技能显得有点“形而下”。这种落差,有“唯有读书高”的历史传统影响,也有我们对现代职业教育的认识及其办学模式实践的不足。因此,社会上对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充满了期盼,但对如何向上提升建构却充满着彷徨。迷茫点在职业教育发展定位与高等教育的大面积交织上。

（一）职业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

职业教育的早期表现形式其实就是手艺传授,即在手工业行当里教人以谋生的技艺,典型的实施方式就是师傅带徒弟。师傅带徒弟即学徒制,是在工作现实场景中对技能、经验的传授和学习,是言传身教式的。与知识的学习不同,手工技艺传承有些是说不出口道理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即虽不能抽象出原理,但却能在潜移默化中使人达成一种条件反射式的熟练,也就是技术技能的掌握或经验的感知。

随着工业化发展特别是科技不断进步,个体手工艺劳动、小作坊式生产逐步演变为大工厂进而进化出现代化甚至智能化工厂,对熟练操作、技能技术的需求不断增加,要求不断提高。学校的班级授课是最能体现工业化效率的教育制度安排,因此,职业学校广泛产生并逐步成为工业化社会的标配,而不断复杂化的科学技术也使得职业教育的开展需要有一定的知识文化基础。由于职业教育必须在工作场景中训练,二元制等近现代职业教育模式应运而生,学徒制得以延续。它们在欧洲大陆如

德国最早成型,是因为那里有着上千年的手工业与行会治理传统:行会的自治性即约束能力很强,虽然企业是竞争开放的,但行业相对封闭,行业之间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因此,为了整个行业的利益,本行业内的企业就必须承担起部分培养人的义务。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存在——培养能满足行业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是行业、企业自身的事情,因此它们承担的是自己的责任。

在进一步的发展演变中,各国的文化不同、情况各异,但职业教育实施的双主体、达成的熟练性实质未变,培养的人要能直接在工作中顶岗上岗。从更宽的视角来看,企业进入还需要有职前培训,在职人员进一步提升也需要有职后培训。因此,国际上清晰明了定义职业教育一般为职业技术教育及培训。

在我国,情形也大致如此,学徒制古已有之。不同的是,新中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废墟上建起的,早期缺乏大工业化的基础,我们的教育从成人夜校扫盲、儿童读书认字、高校院系调整等起步,在职业教育方面大致经历过中专大专、工人大学、技校、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转型、本科高职等多种形态,同时社会、经济、产业形态也是多样多元。职业教育的概念、内涵、模式、实践尚未成熟定型,发展又非常迅速,导致在层次类型、形式架构上产生了不少困惑。

(二)大学从传统走向现代

世界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 800 多年的历程,经历过教师行会模式的法国巴黎大学、学院制模式的英国牛津大学、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模式的德国柏林大学。至此,大学都是在“象牙塔里”,即大学是大学、社会是社会,而在同一阶段里大学在世界范围中也基本上是一个模式。

随着大学社会服务职能在美国的提出,大学走出了象牙塔,与社会发生紧密联系。大学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进步进一步反哺大学,促进了大学的繁荣和扩展。大学的社会职能越来越丰富,模式在不断扩展,逐步产生了高等学校、高等教育机构、第三级教育、高中后教育等与大学相关但含义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高等教育出现多样化,从培养“绅士”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所以,近现代以来有关大学与社会关系的至理性名言就是“走出象牙塔”。世界高等教育的多样化,缘于社会的推动,源自社会需求的多样化。高等教育既有密集研究型大学,也有职业技术类高校;既有遵循科学本身规律设立的学科专业,也有遵循社会需求、产业发展逻辑设立的学科专业。

(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重叠交叉不断增加

高等教育面向了社会,职业教育需要学习知识理论。原来二者泾渭分明,后来逐渐有了交融。

现代技术是以科学原理为支撑向前发展的。早期,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以身体技术技能熟练为基础的习惯性反应获得,学习过程需要思考的内容并不多。但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技术复杂性的增强,技能操作的背后存在着大量科学原理的支撑。学原理既要有知识文化基础,更要花时间去学习思考。现代职业教育的学习过程已不仅是身体的训练,还是脑力的锻炼,因此需要增加学习年限,而学习年限其实就是学历。现代职业教育已与传统的技能培训有了很大不同,对基础教育有了较高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其高等教育的内涵。

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作为学生通向社会的教育阶段与工作阶段的联结接口,原来其内容、模式、层次相对分明,而现在出现了大面积的交集。职业教育向上延伸发展的部分,到底算职业教育还是算高等教育?例如,高职、应用本科、专业学位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教育?不在学理上弄清楚,职业教育以类型为特征的层次提升必然会充满争议,职业教育的类型发展也很难在共识基础上实现良性循环。

我们的困惑也是世界的困惑,我们在思考世界也在思考。现代技术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国际职业教育也呈现出了许多新的形式和变化。如在内涵上,职业教育对基础知识理论的要求在提高,一些高学历的专业人士也开始广泛接受工作需要的技术技能培训等;再如在制度上,素有制造业强国和职业教育强国之称的德国,于 2018 年底发布了《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提出建立“合格职业技师”“职业学士”“职业硕士”三级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等,引起广泛争论。争议点主要包括:本硕学位冲

击了传统职业教育理念、新学位制度与传统职业称谓相冲突、对学术学位的模仿容易导致忽视职业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特色、破坏职业资格与技能的整体性等,有学者甚至用“学术妄想化”表达了对职业教育希望通过模仿普通教育系统来提高自身地位和合法性前景的担忧。

(四)现代职业教育正在融入人的终身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不仅与高等教育有了交叉,而且还融入人的终身学习和成长之中——年青阶段需要有职业生涯的思考,未来工作中的终身教育其实大多数是技术赋能。

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已使得职业发生了很大变化且仍在不断变化之中,一个人一辈子面向一种职业从事一个岗位工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此,年轻人从小就需要结合个性特点接受一定的职业倾向、职业意识教育和一般性社会技能教育,在高等教育中除提高专业能力外也要注重培养相关的工作通用技能,在工作后更需要结合岗位需求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成长性工作技能。由此可看出,职业教育、技术技能学习已经突破了原来狭隘的概念,将伴随人的一生,即使是高层次人才也需要掌握一些操作性技能以提高自己的工作竞争力。这其实也是职业教育重要性提高的表现。

三、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

当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开始大幅交融后,二者的概念属性就会产生一定的混乱。当然,作为一种内涵本质或约定俗成的教育类型,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依然存在。出于进一步学理分析的需要,本文把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属性抽取出来,与职业教育概念进行对应讨论。

(一)我国高等教育是一种专业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一章总则的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6]高级专门人才当然需要专业教育来培养,说明高等教育总体是一种专业教育。

需要说明的是,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都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理念,长期存在着争论,也各有其适用的环境。不

同教育理念会培养学生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但这并不改变我国高等教育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任务要求,因为高等教育总体是以专业为基础进行的。关于这一议题复杂的内涵,本文不再多述,以避免节外生枝(例如,进一步的探讨还将涉及普通高等学校、高等普通教育、高等专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等更多的概念议题),但这也的确反映了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加入了职业教育因素,高等教育就更加复杂起来。

(二)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对应的内涵差异

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共同点:都是与社会的接口教育,都需要培养学生形成可以显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培养学生形成的能力要素内容是一致的,均为知识、技能和思维力;学生的培养过程均需要系统的理论教学和相应的实践训练。共同点很多,所以容易搅在一起说不清楚。

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不同点更多,主要有:其一,职业教育面向岗位培养技术技能人才,重视技术熟练和动手技能,侧重培养学生形成操作性技术技能;专业教育培养面向专业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重视知识结构和思维层次,重点培养学生形成高阶思维能力。

其二,能力要素相同,但侧重不同。职业教育侧重技能,专业教育侧重思维力。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都需要一定的通用知识和专门知识,前者重视掌握的熟练性,后者倡导相应的灵活性,专业教育还特别需要某些知识用作训练思维力的素材。面对未来的工作需求,接受专业教育的学生毕业后在工作场景中需要“想”即思考的内容要明显多于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

其三,它们都需要理论和实践教学环节,但由于要求、侧重点、实施方式不同,在理论与实践的匹配关系、教学学时比例、主导方向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尽管它们都需要面向实践的教学,但目的目标会有差异,职业教育专注通过实践环节熟练掌握技术技能,专业教育则追求用理论知识参与实践或在实践中综合应用理论知识。

(三)职业教育的特征与模式

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由学生毕业后从事工作的工作内容变化性决定。职业教育毕业生从事的是一种熟练式

技术技能工作,在岗位工作中应对的变化相对较少,无论学习时用脑多少,学成后都要成为一种熟练、甚至是一种条件反射,这种熟练既包括身体反应也包括头脑反应,在工作实际场景中需要考虑的内容是常规性的。

职业教育的层次特征由学习者完成学业要求的学习内容复杂性决定。现代技术以科学原理为支撑,现代职业教育需要在一定的知识理论基础上进行,学习内容的复杂性增强。复杂性上升,受教育年限必然上升,学历层次自然上升。

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需要产学结合,学校、企业“双主体”最为理想。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需要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学校教育与企业实训相结合,联系状态是实现工学合一。

(四)职业教育的体系延伸不能偏离类型特征

职业教育体系的延伸,需要厘清类型特征的不变性,即:其直接面对工作岗位培养人的技术技能,这种技术技能需要通过训练和练习形成所固有的职业属性的不变;职业教育的变化是伴随着技术技能不断复杂化,其背后依托的知识基础和科学原理越来越雄厚和深奥,学习的过程越来越复杂,不仅需要实践训练而且需要更深的理论思考,由此实现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人才培养。

因此,职业教育的体系延伸不能光考虑复杂性上升而忽略其内涵的稳定。只有把类型特征做准做实做牢,不摇摆,才能赢得最大共识和最大支持,才能真正实现和保证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四、职业教育类型上延的体系架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离不开向上的延伸拓展,特别是在“十四五”期间这一议题将更引人关注。但是怎么延伸?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本人认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是解决好与社会、产业、企业的融合问题,向上架构应紧密围绕类型特征进行。既要体现担当、充满自信,解决好社会不可或缺、一大类人群的教育问题,又不可因为体系建设的重要而盲目拔高、失去自我。

(一)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所涉及的向上延伸

自2011年起,教育部在文件起草、调研过程中逐步

提出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议题,并借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东风,于2014年6月联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正式发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

既然是体系建设,必然涉及向上怎么架构的问题。2014年5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7]指出“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统筹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发挥高等职业教育在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建立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形成定位清晰、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层次结构”。

所以,由中职联通到高职,高职联通到职业型本科高校及部分应用型高校,之后再嫁接到研究生专业学位,是合乎情理的。但需要注意各级职业教育面向就业岗位需求的人才培养方向不能变。

(二)发达国家相关的教育体系描述

20世纪60—90年代,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过程中,大致经历了扩大就学机会、关注质量、注重搭建人才成长立交桥等几个不同的政策侧重期。通过大众化发展历程,事实上形成了两个体系的学校模式:一个重视普通教育或学科性人才培养,另一个重视职业教育或应用性人才培养。所不同的是,有的职业教育通道特色鲜明,有的则不那么明显。

美国实施教育的权限在各州,看不出两个体系的明显痕迹,是一个多样化的教育体系,他们重视通识教育,强调创新,这与其移民国家特征相关,它的职业教育在社区学院实现,也有着专门学院的高等教育类别;英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中实行了双元模式,即大学与多技术学院并存的体制,但为了提高多技术学院的地位而在1992年将其升格为大学;日本二战前曾出现过一批专门学校,战后按美国模式被改编为新制大学、废除了专门学校制度,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又重新出现了高级专门学校;法国有大学、以工程师学校为主体的大学校和大学技术学院;德国、瑞士的职业特色非常鲜

明,他们重视工匠精神,追求产品精益求精,制造业强大,这与欧洲大陆千年以上的行会式社会治理模式相关。以上不同国家的学校教育不同特征说明,教育体系、模式深受国家文化传统、管理体制、战略方向影响。当然,它们也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革,如前些年德国的工业 4.0 重点是加强智能化、美国的制造业战略就是要加强硬件,也可以说是缺什么补什么,硬件强的补软件、软件强的补硬件。

在两个体系中,德国大学接收文理中学毕业生,应用科学大学可接收通过 12 年级文理中学的学生和高级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在应用性人才培养中,瑞士 70% 左右的学生初中后选择上职业技术学校,随着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年轻人有了更高的追求,便在职业教育基本联邦证书之上再增设高级联邦证书,并建立和架构起应用科学大学通道。

(三)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存在的“嫁接”通道

对于国家的发展,创新和应用都不可缺,科学、技术、工程、技能人才都非常重要。疏通接受职业教育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升学渠道,既是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人才成长的客观需要和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内容,也符合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和规律。但是,必须解决好以下三大问题。

1. 职业教育属性的不变

2003 年前,职业学校追求升格和学生升学现象严重,甚至还把升学比例高当作成绩宣传,导致职业学校的职业教育属性严重弱化;高层次院校也不希望来自职业学校的生源接受过多的职业教育内容,原因一是学生文化基础薄弱,二是不好安排教学。为了抑制这种情况,教育部提出职业教育应以就业为导向,并确立了职业院校一般不升格的政策思路。时过境迁,当时代发展到今天,职业院校学生进一步提高学历的要求在加大、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要求也在提高。但如何保证职业教育的基本属性不变,不把职业教育办成以升学为导向的普通教育,仍然是需要关注的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住职业教育的模式,需要把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比例关系及培养方式确定下来,以实践教学的主导地位

及职业岗位的针对性来确定职业教育的性质。

2. 各级课程的有效衔接

当职高、高职大批量升学现象发生后,现有的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将面对两大群体生源:一类是普通高中毕业生,另一类是职业教育升上来的学生,教学复杂性增强。教学的组织、内容的衔接都需要提前思考。这需要不断通过试点,打造“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或应用型本科和专业学位研究生”阶段对接或一条龙对接方案,使应用性人才培养系统化。

3. 教育公平性和科学性的体现

升学制度涉及社会公平和科学选才,职业教育升学的制度安排需要特别关注实践能力的成长,需要有一些特殊的考评和选拔办法。这既有自身的公平、科学问题,也有对普通教育升学的冲击,必然影响到整个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这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社会关注度较高,需要认真进行制度设计,尽可能减少矛盾,保证公平公正科学,不偏离符合职业教育的人才成长特征,不引发社会认识上的混乱。

可见,教育成长的通道要有但需有序。可以长出,如职业本科;也可以嫁接,如专业学位。2014 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系统构建从中职、专科、本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体系,满足各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需求,服务一线劳动者的职业成长”。并在教育体系框架示意图中明确显示了“嫁接”通道(图 1),如应用技术本科(目前还应该加上职业本科)的多条出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多个来源。即:有通道即可,不限定唯一或专属,每个阶段、每种类型教育都有多条成长道路,尽力在制度设计上做到人尽其才,尽量以教育的多样性满足社会的多元需求和个人的多元发展;同时,每个阶段、每种类型的教育也都要把自己的内涵属性做好。这才是真正的高质量发展及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建设。(见下图)

该图显示我国教育体系框架基本确定,不同层次和类型教育沟通、衔接的路线非常清晰,具有一定的学制图价值。

(四)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向上架构

近年来,我国的“双一流”建设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并举,两个体系的高等教育逐渐呈现。新兴研究型大学、部分高校向应用性转型发展、职业本科等新型办学形式不断涌现,各省市纷纷构建自己的高教体系和分类框架。虽然,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如何交织的实践路径并没有完全解决,但各自在发展方向上分属不同类型的思想认识正在逐步统一。从现实看,教育体系框架设计和大的政策方向制定任务已经完成,但操作实施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存在着实践路径的明晰可行性问题。需要针对问题,寻找对策。

2017年2月,教育部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将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培养列为第五级教育,也曾经定义5B为职业技术型、5A2为按行业划分的理论型、5A1为按学科划分的理论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笔者也曾经把我国高等学校分为“理论型、实践型和职业型”三类。职业本科毫无疑问是职业技术教育,而应用型转型高校将来有一部分是职业技术教育,还会有一部分

趋向于实践型工程教育。实践型和职业型都需要学习一定的原理理论,但更重视面向实践,前者重视的是综合应用能力培养或者工程教育中的工程能力训练。

所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重点不是把某类研究生教育、某类高水平高校定义为职业教育或职业教育学校,而是完成好疏通和嫁接工作,使职业教育毕业生有合规、秩序、通畅的学历上升通道。具体来说就是,中职毕业生走向高职的通道、高职毕业生走向职业本科和应有型高校的通道、职业本科毕业生接受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通道完整且畅通。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职业教育需有升学通道,甚至通道口子也会越开越大,但各级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向不能变,类型特征只能强化不能削弱,办学模式、升学方式、考试内容等要与普通教育明显不同。

职业院校不断强化自身的类型特点,其他各高等学校力求发展自己的特色优势,上下沟通、左右联通,形成四通八达的人才成长立交桥,这才是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理想的多样化形态;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通过体系建设实现“十四五”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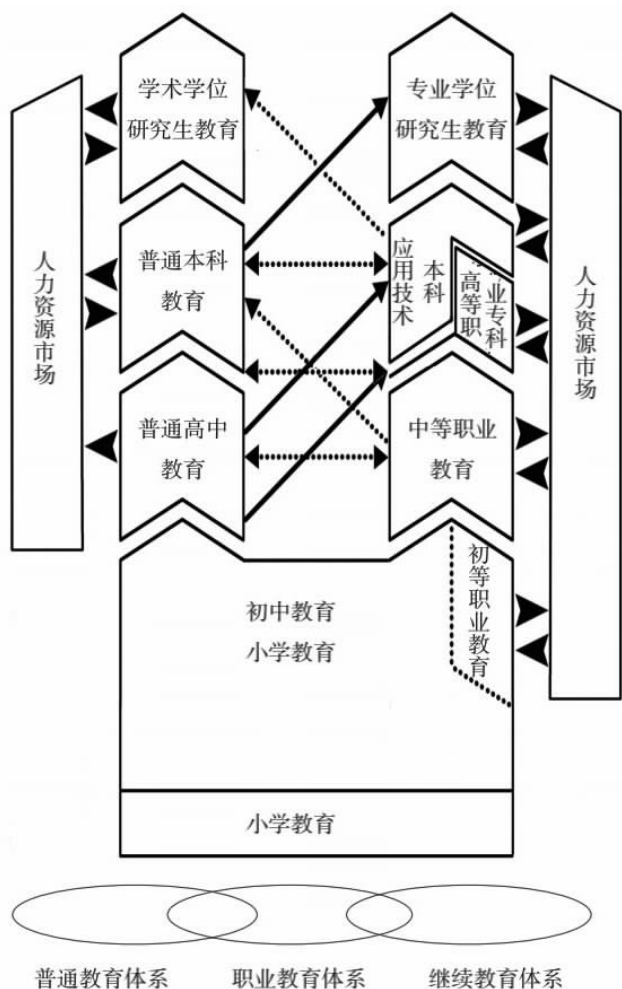


图1 教育体系基本框架

资料来源:引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

职业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是完善国家基本制度

□ 徐国庆

导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对教育现代化做了具体战略部署。作为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到 2035 年也要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建设周期只有十多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此宏大的建设目标，需要对其建设内涵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对其建设过程进行周密的规划。

什么是职业教育基本现代化？到 2035 年职业教育要达到什么样的发展状态？其实，“职业教育现代化”这一概念在十九大之前就已经有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就提出了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2014 年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建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受这一目标驱动，什么是职业教育现代化成为了研究热点。对该问题的回答主要有两种思维路径：（1）要素论，即通过列出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要特别加

强的教育要素来把握现代化的内涵。具体是哪些要素，研究者的表述不一，但内容大致相同，通常包括治理、体系、师资队伍、校企合作、信息化、国际化等（汪燕、李慧玲，2019；高鸿，2019）。有的研究者通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把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划分成了体系、体制、条件、质量、活力五个要素，并深入界定了每个要素的可评测指标（陈向阳，2020）。（2）特征论，即通过描述现代职业教育应当具备的特征来把握现代化的内涵。同样，具体是哪些特征，研究者的表述不一，但内容也大致相同，通常有适合性、优质性、公平性、终身性、国际性、民主性、法治性、科学性、技术性、专业性、自主性等（高文杰，2018；荣长海、高文杰、赵丽敏，2019）。

其实，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概念，学界对其内涵本身并无确切界定。我们可以在各个发展水平上谈论现代化，未来的发展目标对今天来说是现代化，但今天的发展水平相对几十年前来说可能已经完全实现了现代化。我们也可以在各个维度谈论现代化，如制度现代化、技术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教育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居住条件的现代化，等等。甚至可以把当前的所有研究都冠以一个前提：“基于现代化的……研究”。现代化只是我们用来规划未来若干年后发展目标的一个总体概念。与

其花大量精力去回答现代化职业教育的要素或特征,不如深入研究职业教育下一步发展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应该解决到什么状态,达到这一状态的路径方法是什么。“职业教育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阶段,必须深入分析职业教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陈子季,2020a)

一、国家制度建设是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内容

如果从当前职业教育发展最为关键的问题中去寻找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内涵,那么无论是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还是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状态,都不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是国家基本制度不健全。

(一) 国家基本制度不健全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诸多问题的根源

对当前职业教育的发展状态可用成就与问题平分秋色来概括。一方面,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 70 多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40 多年的发展,职业教育已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必须肯定的事实:(1) 从学制层次看,职业教育已经拥有了基本完善的中等职业教育体系,办学实力强大的职业专科教育体系,并已突破了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而在 20 年前,我国职业教育还基本集中在中等教育层次;(2) 从规模上看,全国已拥有了 1.15 万所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全世界最大,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 70% 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教育部,2018),与 1978 年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只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 7.6% 相比(林丹,2004),这一进步是惊人的;(3) 一批职业院校已经具备了非常优良的办学条件,其实训条件甚至超过了本科院校同类专业,且校企合作、课程教学、师资队伍等内涵要素的发展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完全可以满足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需要,这与 20 世纪 90 年代还在大力提倡职业学校要开门办学相比,进步非常明显。

但与此同时,职教界同仁又普遍对目前的发展状况

感到困惑。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三大类型教育中,职业教育界的问题感可能是最强烈的。人们普遍感到最为突出的问题有:(1) 在集中精力进行内涵建设的同时,却普遍要为学校如何继续保持目前的存在状态而担忧。虽然相当一部分职业院校已经拥有了比较理想的招生规模和比较优良的办学条件,但几乎没有几所职业院校不用担心自己的基本生存问题。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只有少数办学水平比较差的学校会担心自己的基本生存问题,而在职业教育中,这种担心是一种“集体忧虑”。这说明职业教育基本体系还处于不够稳定的状态。(2) 职业院校普遍感觉到,在一些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他们的努力很难取得大成效。比如中等职业学校目前普遍弥漫着关于办学定位的迷惘心理,其主要原因在于中职学生升学路径不开阔,就业又年龄过小,在国家没有明确新形势下中职学校办学定位的情况下,他们深感无论如何投入精力进行内涵建设都难有实际收效。(3) 许多问题职业院校做了很大努力去解决,但最终收效甚微。比如人才需求调研与课程开发,通常认为这是职业院校自身的建设内容,职业院校普遍要为此花费大量精力,但极少产生能真正准确把握人才实际需求状况、对专业建设与课程开发具有实质作用的人才需求调研报告,也极少产生真正高质量的课程。(4) 职业教育内部管理不协调,资源没有得到整合,资源利用的整体效益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管理体制上,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其管理的链条很长。它不仅要管人才培养过程,还要管人才培养的依据,即职业分类及其资格标准,还要管毕业生未来的生涯发展空间,如劳动待遇水平、其劳动相对专业人才劳动的价值等值性、生涯发展阶梯的完整性,还要管促使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机制。如果国家规模小,可以把这些职能集中到一个部门进行管理,如英国成立了教育与技能部;大国则需要把这些职能分开,这就会带来部门之间需要协调以保证链条的完整性问题,我国就是如此。目前我国这一矛盾主要存在于教育部门和人社部门之间。这两个部门均掌握着重要的职业教育办学资源,比如教育部门掌握了主要的职业教育办学经费、职

业教育研究机构,人社部门掌握了劳动就业政策和职业资格证书,但目前二者之间的工作没有完全协调起来。(5)针对问题的政策缺乏整体设计,无法使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比如加强师资队伍是办好教育的根本,职教界对此有深刻认识,不仅实施了大量提升职业教育教师能力的项目,而且根据职业教育对教师能力的特殊要求提出了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计划,结果却是项目很多,教师能力似乎没有得到根本性提升,且缺乏持续发挥作用的支撑框架。再比如课程与教学领域,为了提升职业院校教学质量,教育部一直在持续推进专业教学标准与人才培养方案开发,但由于这些标准和方案没有与职教高考衔接起来,且缺乏基于这些标准与方案的对职业院校教学质量的监测体系,使得它们难以真正得到实施,因而没有在提升职业院校课程与教学质量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以上只是列举了当前职业教育界普遍感到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阻碍职业教育体系朝更高水平发展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性障碍。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其根源是什么?根源就在于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尚处于不健全状态。

(二) 构建国家基本制度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内容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相比,我们的差距是什么?如果说 20 年前差距首先体现在职业院校的基本办学条件,那么到了今天,差距主要体现在国家基本制度的完善与否。回顾 20 世纪 80 年代甚至更早时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会发现其主要内容就是完善国家基本制度体系,尤其是以职业教育需求与内容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旨在提升职业教育地位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体系建设和国家资格框架建设,以提升单所职业院校办学实力为主要内容的政策行动并不多。发展路径的不同导致了我国职业教育今天与它们的差距。从国际比较角度看,缩短与部分发达国家在国家制度构建层面的差距,应该是下一阶段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非常成熟,且其进入成熟阶段

的时间比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早。其职业教育最大特色是“双元制”,这一称谓正式使用是在 1948 年德国教育委员会颁布的《对历史和现今的职业培训和职业学校教育的鉴定》中,1969 年德国政府在《职业教育法》中对其作了具体规定,使其进一步规范化和法制化,20 世纪 70 年代“双元制”快速成熟起来(崔岩,2014)。以往研究把德国社会对职业教育高度重视并能实施双元制这样高难度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归因于其法律体系,但是更为本质的原因在于他们通过严格的法律,构建起了完善的职业教育公共制度体系,包括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职业培训内容标准制度、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管理制度和职业学校与企业人才培养过程的协调制度。

英国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推出职业教育改革措施最为频繁的国家。除了新职业主义、现代学徒制等教育内容与人才培养模式层面的改革以外,英国职业教育改革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国家职业资格体系构建、国家资格框架构建,以及教育与技能部的成立。国家职业资格体系构建解决了职业教育课程内容开发的依据问题、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问题以及技术技能人才生涯发展阶梯的搭建问题;国家资格框架构建解决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人才培养结果的社会待遇等值问题;教育与技能部的成立解决了职业教育的统一管理问题。无论实践效果如何,英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思路完全是对的。而其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推出,正是得益于前期这些国家制度的构建,因为实施现代学徒制必然涉及职业资格标准问题,以及教育与劳动的协调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职业教育领域的改革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教育内容上,比如“学校到工作过渡”项目、职业核心素养开发。“学校到工作过渡”项目的核心内容是课程整合,职业核心素养开发的核心内容是构架未来职业教育知识与能力的基本结构。但其教育内容改革不只是在学校层面进行,同时也在州政府层面进行,即开发职业教育教学的内容标准体系,而这也属于制度建设范畴。另外,美国劳工部为职业教育发展做了很多重要工作,它使得美国拥有最为科学的职业分类体系,以及最为及时、系统的就业状况数据报告。前者为开发

职业生涯测评体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基础,使得通过生涯教育科学引导学生根据自身条件合理选择教育类型及其专业成为可能;后者为人们根据就业实际状况合理选择专业与职业提供了重要参考数据,从而使得人们能够更加理性地对待职业和教育。

(三)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重心应从院校建设转向国家基本制度建设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在促进体系发展的同时,也进行了许多国家制度建设行动。这40多年中建立的庞大职业教育体系,就得益于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它规定“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要相当于普通高中招生数”,从而确立起了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半边天”地位,这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得以建立的基本制度前提。对职业教育的这一定位在2019年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国务院,2019)这一政策规定显然属于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范畴。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也包含了许多国家基本制度方面的内容。2012年开始启动的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开发,属于有意识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尽管其内容还需要继续提升到真正的“标准”层面。

但要看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聚焦点主要还是在职业院校建设,对国家制度体系的整体设计及建设投入远远不足。“提升职业院校办学水平”是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政策设计的主要思维模式。如果用关键词来分析这40多年来职业教育主要政策文件的内容,会发现相关文件均指向职业院校建设,国家基本制度设计所占比重相对来说要少得多,内容也不够具体,操作性比较弱,以致实践进展缓慢。即使是要在国家层面系统解决的问题,也把政策方向主要指向了职业院校该如何落实。比如现代学徒制改革,这本来是一项首先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相应制度,职业院校才可能实施的人才培养模式,然而它的试点从一开始便把关注点放在了职业院校层面,以致该项改革在实践中操作极为困难,职业院校已基本失去了实施这一人才培养模

式的兴趣。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我们把发展职业教育的主要精力放在职业院校建设有其合理性。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体系的物质基础,制度则是职业教育体系的上层建筑;没有物质基础,职业教育体系就无从谈起,上层建筑也就成为了空中楼阁。基于这一思路,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职业教育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中等职业学校的恢复和办学水平提升;进入21世纪则开始大力发展职业专科教育,1300多所职业专科院校拔地而起,20年时间内有的就已经发展到世界领先水平;到了2019年,职业教育终于突破了本科限制,职业本科教育作为一种新的职业教育办学层次已经启航。然而到了今天,在职业教育学校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的背景下,下一阶段我国职业教育要迈向更高水平,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世界职业教育发展,需要转变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重心,从以提升职业院校办学水平为中心转向以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中心。世界已进入格局转换的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构建是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使命。

“物质、技术与人类理性的发展,并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充分条件。只有制度的现代化、只有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改善,才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和本质。”(宋智勇、王焱,2004)国家制度建设在职业教育现代化目标实现中的重要意义已越来越为研究者们所认识到(匡瑛、井文,2019;刘莉、张俊生、姜伯成,2018)。“用制度体系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陈子季,2020b),这是对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转型的深刻认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始有了明确的构建职业教育国家制度的意识,在全文七个部分中,第一条便是“完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其中的第一小条则是“健全国家职业教育制度框架”,其第二条“构建职业教育国家标准”其实也属于国家制度体系建设的范畴。可见,国家制度构建已成为核心指导思想。然而遗憾的是,只能说这份文件有了明确的国家制度构建意识,而其思维模式仍然没有能够实现根本转型,因为文件的主体内容和叙述角度,仍然还是如何提升职业院校

办学水平,真正的国家制度建设内容出现并不多,内涵也不是足够清晰。因此,可以把这份文件看作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转型期具有重要承上启下意义的过渡性文件。

二、国家基本制度设计要立足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需求

要建立什么样的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其内容是什么?结构是什么?要富有成效地推进职业教育国家制度建设,需要对制度体系进行结构化分析。有研究者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王晓杰、谭绍华、张俊生,2017)、系统科学(陈雪强、谭绍华、张俊生,2017)等视角对职业教育国家制度内容结构进行了整体分析,这些研究对于更为完整地把握职业教育国家制度的内容,理清不同职业教育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有一定价值,但要更为精准地把握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的内容,还是需要从实践出发,通过深入分析职业教育运行体系的特征来探索其对国家基本制度的需求。

从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看,有些制度具有共通性,如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国家资格框架,因为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面向职业的教育,实现教育与职业的联结关系是其运行必须具备的基本制度支撑,否则职业教育就很难真正按照自身的规律来运行,这些制度自然必须纳入我国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范围。但更多制度是根据各国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建立的,并无固定模式可循。因此,我国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需要在深刻洞察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运行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构建经验,立足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远景目标进行系统设计。图1是本文对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框架结构进行的尝试性设计,它按

照从顶层到基层的运行顺序,把职业教育国家制度需求划分成了六个层面,即协调层、结构层、需求层、内容层、实施层和评价层。这六个层面所涉及的职业教育国家制度,有些在职教界已经展开了大量研究,有些甚至已经开始了建构实践,但多数制度尚处于很不成熟的发展状态。

(一)协调层的国家基本制度需求

构建能够统筹职业教育资源、协调职业教育整个运行过程的跨部门机构,是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首要需求,这是由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政策设计的体系化不够、办学资源的统筹使用不够,导致该问题产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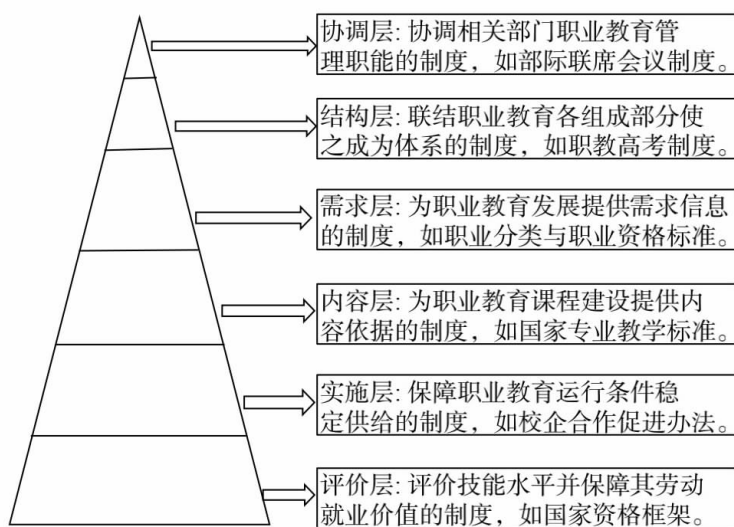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体系的框架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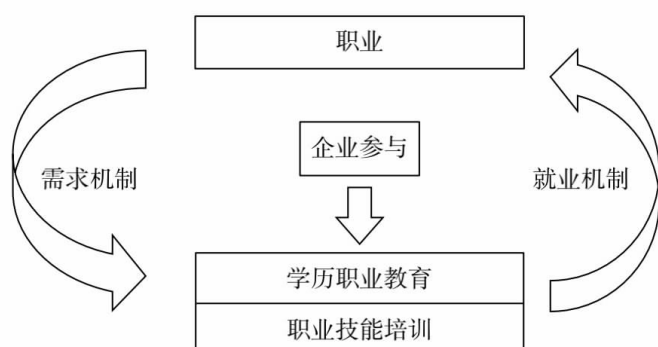


图2 职业教育的基本运行框架

根源在于缺乏能够在更高层面对职业教育相关部门的职能进行协调的机构,而这是各国职业教育体系运行面临的共同问题。

职业教育运行必须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体系。这是它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在运行机制上完全不同的地方(见图2)。首先,从出发点看,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出发点是知识本身,而职业教育的出发点是职业。尽管不同学派对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出发点在观点上有差异,但观点差异的体现主要是知识选择的原则,它并不影响以知识为基本出发点这一本质属性。而职业教育则完全不同,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逻辑不是运用知识去形成能力,而是根据职业的需要选择知识,职业是职业教育运行的逻辑起点。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运行首先必须建立把教育与职业联系起来的需求机制。其次,从教育的结果看,职业教育也要比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复杂得多。基础教育的结果主要是考试和升学,这已是非常完善的教育制度;高等教育的结果虽然涉及就业,但其过程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且制度体系已经很成熟。职业教育的结果却仍然是一个存在诸多复杂问题的领域,比如如何评价技能习得的水平、如何保证劳动者就业的公平等,而这个环节对职业教育整个体系的正常运行具有决定性影响。运行体系的开放性说明,如果从传统教育学观念出发,把职业教育关注点只是聚焦在职业院校内部办学上,是办不好职业教育的;只有把需求机制、院校办学与就业机制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才是完整的职业教育运行所需要的框架,而这就完全超越了传统教育管理职能的范围。

职业教育办学资源并非完全被教育行政部门掌握。首先,职业院校并非完全由教育行政部门举办,除了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职业院校外,还有许多由各行业部门举办的职业院校。为了加强职业院校与行业部门的关系,非常有必要继续保留职业院校的这种归属状态。其次,广义的职业教育不仅仅指学历职业教育,还包括职业技能培训,且从规模上看后者更大,它也是劳动者获取技能的重要途径,而职业技能培训管理职能主要归属人社部门。再次,办好职业教育还必须有企业参与,这是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律的本质要求。从传统管理职能划分来看,企业不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内。目前发改委是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的主要负责部门。不同行政部门掌握的职业教育资源如果不能进行统筹使用,不仅会影响办学资源的使用效果,还会影响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比如,学历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分别由教育行政部门和人社部门管辖,而长期以来二者之间的合作不是很协调,这使得职前职后一体化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长期处于理论探讨状态。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不同国家尝试构建了不同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德国采取了继续由行业协会管理职业教育的模式,并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对职业学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职能分工与合作做出明确界定,以保证复杂的双元制能正常运行。英国在2002年把教育部与就业部合并成教育与技能部,其目的是通过把教育与劳动就业管理职能合并,改变英国社会对职业教育不够重视的状况,同时在机构设置层面解决教育与劳动就业不协调的问题。美国职业教育则仍然采取教育与劳动相互分离的治理模式,且二者之间的联系很少,这一方面与美国的人口规模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美国主要关注职业教育的教育功能有关。与德国相比,那种复杂的以社会为中心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在我国无法建立起来。与英国相比,我国是一个大国,管理职能很复杂,把职业教育所有管理职能合并到一个部门不具有可操作性,且英国成立教育与技能部以后,也带来了教育行政官员处理失业救济、劳动力市场管理等复杂就业问题力不从心的问题。美国的分离式管理则大大削弱了其职业教育促进劳动者就业、为产业发展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功能,也不能为我国所借鉴。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建立“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政、农业农村、国资、税务、扶贫等单位组成,国务院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担任召集人”,其职能是“统筹协调全国职业教育工作,研究协调解决工作中重大问题,听取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等方面的意见建议,部署实施

职业教育改革创新重大事项”。显然,这是当前最为适合我国的职业教育跨部门协调制度,将在解决职业教育协调发展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它只是一个联席会议制度,并非实体性的行政管理机构,而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许多矛盾需要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予以协调。为了使这一制度能更为实质性地发挥跨部门协调功能,有必要:(1)赋予该联席会议必要的行政职能,使其决策能够得到实施;(2)把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作为部际联席会议的学术支撑机构,充分发挥咨询委员会的决策咨询功能和实施辅助功能。

(二)结构层的国家基本制度需求

这里的结构指职业学校体系的结构,即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联结关系。职业学校体系是职业教育体系的物质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职业学校的层级发生了根本变化,由过去单一的中等职业学校,发展到了由中等职业学校、职业专科院校和职业本科院校/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构成的三级职业学校体系。职业学校层级由单一级发展成三个层级,给职业教育治理能力提升提出了全新要求,即如何把这三个层级的职业学校联结起来,使之构成完整的职业学校体系。

从宏观视角看,这一问题的解决比较容易,即绘制一张包含了三级职业学校的职业教育新学制图;从学习者的角度看,它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它需要在三级职业学校之间构建通畅的内部通道,使达到一定条件的学习者能够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从低一级职业学校升入高一级职业学校继续学习。只有当三者之间的联结关系落实到了学习者层面,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解决这一问题所需要的制度就是正在热议的职教高考制度,它是当前急需建立且极为复杂的国家基本制度。

职业教育有高考制度了吗?通常的答案是有,因为现在中职生已经有了许多升入高等学校的机会。基于这一前提,现有研究或者主要关注构建什么样的招生录取途径,如提出应根据职业教育的特殊性设计招生录取途径,实施分类考试、分类招生(刘芳,2019);或者主要关注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如何体现职业教育特色,认为职教高考的内容要突出技能(刘晓、陈乐斌,2019),相应地

在考试方法上要突出现场的真实评价(赵志群、黄方慧,2019)。技能高考一词由此而来。“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是当前获得普遍认可的职教高考内容结构。对于要建立什么样的职教高考制度,研究者们却很少进行深入探讨。然而如果职教高考制度建设的问题主要是考试内容与方式,那么学生为什么很少有自觉选择职业学校的?如果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升学机会上是公平的,那么选择两种教育的学生应该大体相当。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职教高考的主要问题不在考试内容与方式,而是在基本制度的建构上。

当然,职教高考是一项内涵丰富的国家制度,其功能不只是实现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结构性衔接,其更为根本的目的是整合多方面教育资源,形成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从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角度看,衔接中等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纽带是专业教学标准,但专业教学标准的这一功能要发挥出来,使职教高考成为这一体系构建的关键机制,必须依托职教高考激发职业院校实施专业教学标准的积极性,这就需要加强职教高考的两个方面:(1)增强职教高考对学生的吸引力。要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愿意把职教高考作为其升入高等学校的重要途径,形成一定的考试竞争力。现在中职生已经有了许多通过特定考试升入高等学校的渠道,这些渠道为什么没有成为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之间的衔接机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考试没有形成足够竞争力,以致不能通过高考倒逼专业教学标准在职业院校教学中实施。(2)打破对口招生模式。对口招生模式由于采取各招生院校独立命题的方式,从而使得考试内容与专业教学标准脱钩,这会大大削弱中等职业学校实施专业教学标准的动力,使得本应促进职业教育学校体系形成的职教高考制度,反而成了解构这一体系的力量。

无论是提高职教高考的吸引力,还是打破对口招生模式,解决问题的核心策略是要扩大职校生对高等学校及其专业选择的自由度。目前职校生的升学途径并不少,归纳起来主要有普通高考、三校生高考、自主招生、中高中本贯通、五年制学校的内部自然升学。这些途径

中,普通高考对职校生来说意义不大,因为随着普通高考向过程性考试方向改革,已经极少有职校生能够通过这条路径进入高等教育。而其他几条路径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选择性,通过这些路径中职生往往只能进入实施对口招生的单一的高等学校及其专业,并且这些高等学校办学水平一般。他们不能像普通高中学生那样根据考试成绩在相当广泛的高等学校及专业之间选择报考志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职业教育目前只是为职校生搭建了一些升学路径,并没有构建起具有开放性的职教高考制度。这些升学途径似乎给中职生提供了许多升入高等学校的机会,是职业教育的进步,而事实上这些途径是极其狭窄的,它不仅没有对学生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反而使得具有普适性的专业教学标准没有了需求空间。

(三)需求层的国家基本制度需求

职业教育是面向职业的教育,职业需求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逻辑起点。什么是职业需求?如何准确把握职业需求?为了掌握职业需求,目前采取的主要行动模式是组织职业院校自行进行人才需求调查。这类做法效果并不理想,花费了大量调研资源,获得的真正有价值的数据却极少。问题的根源不仅仅在于职业院校人才需求调研能力不足,更在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整体思路存在偏差。

对职业需求的把握是由多个环节构成的过程,不仅仅是人才需求调研这一个环节。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已构建起了非常复杂的职业体系,要准确把握职业需求,首先要有非常完善、科学的职业分类体系。如果不以职业分类为依据进行调研,所获得的数据就无法做到准确、细致、可理解,而这正是目前人才需求调研普遍存在的问题。最为完善的职业分类体系是美国的《美国职业分类词典》,在职业管理领域美国一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我国也投入了大量精力编制适合国情的职业分类体系,最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是2015年颁布的,但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职业分类体系相比,我国职业分类体系在科学性、细化程度方面还需要提升。“相较于美国,我国职业分类大典的分类方法则过

于复杂,并且更偏向于按照职业活动的专门性来进行划分,职业活动中技能等级性则体现得不明显。”(陈慧梅、谢莉花,2019)《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中,职业分类体系包括8个大类:(1)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2)专业技术类人员;(3)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4)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5)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6)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7)军人;(8)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委员会,2015,序)。这是从社会人员类别角度对职业做出的分类,并非从职业本身的逻辑所进行的分类。

其次,要准确把握职业需求,在科学的职业分类体系基础上,还需要开发科学的职业标准体系。这一标准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职业需求信息。美国职业分类体系中对每个职业的描述内容多达十六项,可归纳为:(1)对职业工作内容的描述;(2)对从业者心理条件的描述,如技能、能力、兴趣、工作风格、工作价值等;(3)对该职业的教育要求、职业资格证书要求、工作与就业趋势的描述。这些内容对于职业院校更好地把握职业需求有重要参考价值。有些国家为了降低开发难度,只开发职业标准中最核心的一项内容,即职业能力标准,英国、澳大利亚均是如此。为了促进职业培训与技能水平认证,我国也开发了大量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但其科学性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再次,要准确把握职业需求,还需要掌握各种职业现有从业人员的基本数据,未来各产业的发展变化趋势以及各相关产业中所包含的各种职业从业人员需求的变动趋势。美国劳工部每年都要准确报告各种职业现有从业人员的总数、工资中位数、离开的人数、新进入人数以及接下来几年需要补充的人数等数据。在政府层面对各种职业从业人员需求总体情况数据进行报告在我国台湾省、香港地区也已经进行得比较深入,它们均有专业研究机构从事这类数据研究工作,如台北工业技术研究院设有专门的产业人才研究中心,该中心研究人员为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精准的产业人才需求数据。

职业需求并不是仅仅由职业院校自行调研就能把

握的,它是一种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才能把握的需求。职业分类、职业标准具有全国统一性,必须作为国家基本制度进行建设;考虑到我国疆域辽阔、区域差别大,可以把人才需求数据报告相关制度建设责任下移到省市。这些制度既是职业教育发展所需要的平台,也是现代社会进行科学职业管理所需要的支撑条件。没有这些基本制度的支撑,职业教育不仅难以真正建立起更加科学的体系,而且始终无法走出自我封闭的发展阶段,因而难以真正实现现代化。职业院校人才需求调研只有以这一系列国家基本制度为支撑,才能真正获得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数据。可见,从源头开始的人才需求调研是职业院校所不能胜任的。上述工作属于人社部的职能范围,因此这一层面的国家制度建设需要充分发挥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协调作用。

(四)内容层的国家基本制度需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内容标准开发成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内容。这一改革起源于基础教育,并逐步影响到职业教育。在国际范围内,职业教育内容标准开发主要有两种模式:(1)把职业能力标准直接作为教育内容标准,比如英国、澳大利亚。在它们的体系中,职业能力标准就是教育内容标准,它们在构建国家职业资格框架的同时,就完成了职业教育内容标准的开发。(2)参照职业能力标准开发独立的职业教育内容标准,比如美国。美国的职业教育内容标准包含了职业能力标准,但又高于职业能力标准,它在职业能力标准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教育本身所需要的内容;其开发路径是首先研制核心素养,然后把核心素养的内容叠加到职业能力标准体系中,使其更多地具备了教育属性。两种模式的差异源于不同国家对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不同,采用第一种模式的国家基本上把职业教育定位在职业胜任力训练,采用第二种模式的国家则更多地强调职业教育的育人功能。第二种模式更适合我国。随着改革的推进,内容标准作为教育制度进入了国家的教育体系,这是教育制度内涵在当代的重要发展。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标准就属于国家教育制度,而不仅仅是供学校使用的教学参考资料。

和基础教育一样,职业教育在内容层面也同样存在着国家基本制度需求。在国家层面开发职业教育内容标准,既是为了规范职业教育基本内容,更是为了普遍提升职业教育课程建设水平(徐国庆,2019)。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课程建设基本是在院校层面进行的,教育行政部门层面虽然实施过一些局部的课程建设项目,但这些课程建设涉及的主要范围是课程体系的统一及教学实施的规范,几乎没有深入到内容层面的系统课程建设。这会造成职业院校之间课程的重复建设,也会导致课程开发成果质量不高。在这种课程建设推进格局下,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建设水平长期未能得到根本性提升。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把职业教育内容开发纳入国家基本教育制度建设范围。

上海率先打破这一模式,于2005年启动专业教学标准开发,首次把教育内容作为标准制度来建设。在上海实践基础上,研究者系统论述了把专业教学标准作为国家基本制度进行建设的必要性(徐国庆,2013)。这一建议被教育部采纳,职业教育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建设正式进入了教育部的政策范围,相关工作于2012年启动。然而遗憾的是,目前颁布的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政府层面课程建设工作模式,即其核心内容主要还是规范课程设置,提出专业教学实施的基本政策要求,而没有真正深入到教育内容层面进行制度建设。因此内容层面的国家制度建设还需要继续深化。

(五)实施层的国家基本制度需求

实施层面对国家制度的需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校企合作,二是教师培养。

1.校企合作对国家制度的需求

在目前的校企合作中,职业院校的期待似乎主要是从企业获得资金、设备的支持,对如何真正发挥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探索不是很深入,这与校企合作的初衷有所偏离。通过校企合作获得企业捐赠的资金与设备,可以作为校企合作的成果之一,但它不是校企合作的主要目的,且这一方面的合作无法形成可普遍推广的模式,也往往不可持续。企业把一些已不具有生产能力但具有教学价值的设备捐献给学校,可以让学校节约大

量办学经费,同时也可以大大提升社会资源的使用率,但毕竟企业不是教育投资者,而且随着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设备短缺情况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缓解。

职业教育最希望通过校企合作从企业那里获得的,是企业对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过程的参与。德国双元制之所以被视为国际职业教育典范,就是因为它成功地实现了企业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的参与,并构建了企业与学校有序合作的机制。在双元制的人才培养方案中,企业要承担主要的人才培养任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所以需要企业参与,是因为它是一种与职业紧密结合的教育,职业的内容存在于企业而不是文献中。如果没有企业的实质性参与,职业教育就没法获得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其人才培养过程最终就会演化成与普通教育没有差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校企合作应该定位在人才培养模式,而不是办学模式,吸引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则完全属于另一个领域的问题。校企合作的政策导向,应当把职业院校的关注点完全聚焦到人才培养上来。相应地,关于如何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积极性的研究,也应该把问题进一步聚焦到如何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积极性。

然而,参与人才培养是企业最有能力做,却又感觉难度最大、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其原因主要在于:(1)设备捐赠是一次性的,而人才培养是持续性的,它需要企业为之持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2)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意味着校企合作的执行场所要放在企业内部,几十甚至上百学生进入企业,需要企业对场地和员工工作做出全新安排,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3)人才培养并非企业的主营业务,即使企业能够从校企合作中获得一些实际的经济收益(冉云芳,2017),如付给学徒比正式员工低得多的工资、从职业院校获取一些培训费用等,但当人才培养干扰到了企业正常生产与服务时,它们会认为这项业务得不偿失;(4)人才培养是企业并不熟悉的业务,许多企业不愿意为了熟悉人才培养而对自己做出什么改变。这些都是校企合作国家制度设计从企业维度需要解决的问题。

校企合作国家制度设计不能忽视对职业院校校企

合作行为的约束。目前校企合作政策制约的主要对象是企业,即如何激发企业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愿望,而职业院校作为校企合作的需求方,通常认为其行为不存在需要约束的地方,其实不然。至少要对职业院校的以下行为进行约束:(1)选择不具有人才培养能力,甚至主营业务与其专业内容关联度不高的企业进行合作;(2)与企业合作的主要内容没有聚焦到人才培养;(3)以校企合作为名向企业输送廉价劳动力;(4)不对企业的人才培养过程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不了解企业对人才培养的实际执行情况;(5)不对学生在企业学习期间的行为进行管理,不了解学生在企业的实际学习状况。

校企合作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建立国家制度。2018年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向校企合作国家制度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以上讨论的内容多数已纳入了该文件。该文件在总则中明确规定,“开展校企合作应当坚持育人为本”。进一步的制度建设有两个抓手:(1)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对进入目录的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急需明确其认证标准,并采取措施保障企业真正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以国家投入为主,国家与企业联合在企业内部建立具有独立教学功能的企业培训中心或许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有效方案。(2)1+X证书制度建设。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还提出“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教育部序列的技能等级证书已进入系统开发阶段,获得批准的技能等级证书已推广到职业院校使用,这让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能取得多项技能等级证书。从实践的角度看,“1”和“X”的磨合还需要较长时间,且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予以支持,但从推动校企合作来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能等级证书开发,借助证书把企业核心技术知识注入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中,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找到了一条新途径。

2. 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对国家制度的需求

职业教育教师培养也到了需要建立国家制度的时

候。教师素质是教育质量的根本保障,为了提升职业教育教师素质,教育部采取了系列行动:(1)创办职业技术师范院校;(2)建立全国重点建设师资培养基地,并从2006年开始依托基地实施了系列教师素质提高计划;(3)设立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的硕士学位,随着学位制度改革,目前这一学位已转变为教育硕士(职业技术教育领域);(4)实施教师下企业锻炼计划,并于2019年公布了首批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名单。在这些措施中,系统的学历教育发挥的作用比较小,短期培训是当前职业教育教师获得教育教学技能的主要途径。

这些政策行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职业院校教师的素质,但也存在彼此之间联系的系统性不够、促进教师能力发展的持续性不够等缺陷:(1)以短期培训为主要方法的培养模式只能解决职业教育教师局部能力的培养问题,无法解决教师整体能力培养及其持续发展问题;(2)不同项目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清晰,容易出现交叉重复现象,这不但会浪费教师培养资源和教师的时间,还会严重影响教师能力的持续性发展;(3)由于缺乏体系化设计,没有形成制度,还造成了教师培养与教师聘用相割裂的现象,教师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取与教师培养不相关,严重影响了教师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削弱了培训效果。

职业教育教师培养现代化,需要走出过去项目化的发展思路,着力于完整、系统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国家制度建设(徐国庆,2014)。要深刻意识到:(1)师范教育已不是职业院校教师来源的主体,在开放式就业模式下普通教育教师已经如此,更何况结构极为复杂的职业院校教师。比如职业院校对教师的实践能力有要求,这决定了相当一部分教师必须直接从企业招聘,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无法培养这部分教师。另外,职业教育中有不少专业并不适合在本科院校开设,这也使得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无法为他们培养这部分教师。事实上,来自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在职业院校教师中只占极小比例。

(2)第一条决定了未来职业教育教师培养的主阵地应当从职前师范教育转向职后教师教育,这就要求把目前项目化的培训改造成系统的教师教育体系,并把培训

与教师的聘用直接挂钩。这是职业教育教师培养体系构建思路的根本转变。

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国家制度建设的目标是:(1)让每一所学校都清晰地知道,他们能够从哪里获得所需要的教师,新教师进入学校后,应该如何按照制度要求安排对他们的培养任务。(2)让每一位新教师在进入职业院校的第一天起就清晰地知道什么时候要完成哪些教师教育课程,达到什么要求,完成学习后能取得什么成果。在这一方面,国外已经很成熟的体系供我们参考,如美国职业教育教师培养体系,我们需要做的是尽可能地借鉴这些体系,并尽早着手建设。

(六)评价层的国家基本制度需求

对技能习得所达到的水平进行认证,以及在认证结果与社会待遇之间建立对等关系,也需要进行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具体内容包括:(1)具有社会公信力的技能评价体系建设;(2)保障技术技能人才拥有同等社会地位的国家资格框架建设;(3)保障职校生享有公平就业与生涯发展机会的制度建设。评价层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不仅涉及教育质量保障问题,还涉及技术技能人才技能学习积极性的保护问题,这两个方面均会传导到职业教育入口,深刻影响人们对职业教育的选择。

1.技能的社会评价体系建设

我国实施的是以外部劳动力市场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模式,这种模式中劳动者的就业流动性比较大,为了让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在就业时能获得公正评价,需要具有很强社会公信力的技能评价体系做支撑(李德富、廖益,2017),同时这一评价体系也有助于激发社会成员学习技能的愿望。这在英国、德国等国家称为国家职业资格制度,它不同于判断个体是否具有某一行业执业资格的行业准入资格制度,其功能只是评价个体胜任某个工作岗位的能力水平。只有在以内部劳动力市场为主体的国家,如日本,才不需要完善的社会技能评价体系做支撑。日本以往的职业资格证书都是企业自己颁发的,其使用价值基本也只能局限于企业内部,但随着终身雇佣制度的逐渐解体,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开放,日本政府也正在努力把企业的职业资格证书上升为国家职业资

格证书。以职业资格证书的拥有与否来判断个体是否具备从事某一职业的准入资格,是把职业资格证书与行业准入资格证书混淆了,这是对职业资格证书功能的误用,不能以此为依据否定整个职业资格证书体系。近年来,由于职业资格证书在实践应用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其应有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反而成了阻碍劳动者就业的因素,以致大多数职业资格证书已经被取消。目前正在开发的技能等级证书是不具备职业资格证书功能的,要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建立真正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仍然是未来职业教育国家制度发展必不可少的内容。

2. 国家资格框架建设

由于技术技能人才在就业中总是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往往需要一种制度,能够在技术技能人才的技能水平与专业型人才、学术型人才的能力水平之间建立等值关系,以使他们在就业时能获得公平的社会待遇(谢晶,2018)。这是各国建立国家资格框架的初衷。目前的国家资格框架构建似乎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学分银行建设,而不是不同类型人才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在社会待遇获得中的等值关系,这有违国家资格框架构建的初衷。至于有些观点把技能等级水平与学历等级水平对等起来,并要求确认达到某某等级技能水平的个体就相当于拥有了什么学历,则完全是对这一制度的误解。这一制度要解决的问题只是劳动者的社会待遇不对等问题,而不是职业知识与专业知识、学术知识之间的教育等值关系问题。事实上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的学历等级与普通教育的学历等级之间的等值关系是学制已经赋予了的内涵,不需要再通过国家资格框架的构建来证明,真正需要构建的是职业资格证书等级、技能水平证书等级与专业职称证书等级之间的等值关系。

3. 公平的就业与生涯发展机会保障制度建设

构建这一制度的出发点是技术技能人才在就业与生涯发展中总是容易处于被歧视地位。美国有一个职业教育理论流派,即批判理论,其主张之一是要求学校教授未来劳动者自我保护能力,这一流派的立足点正在于此。事实上,技术技能人才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不仅与专业人才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具有同等应用价值,而且他们

在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其就业与生涯发展机会应当获得同样的保障。然而目前我国各种人事制度中,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排斥性规定很常见,为他们提供的生涯发展空间也往往很小。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劳动就业制度的现代化做支撑。

三、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建设需要科学设计与长远规划

上述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有的已经建设了多年,但效果并不显著,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有的经过多年建设甚至还处于理论探讨阶段,没有展开实质性的行动。这是因为这些制度中,除了少部分制度的建设主要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决心,如协调层的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评价层的国家资格框架和公平的就业与生涯发展机会保障制度,其余大多数是需要非常强的专业研究做支撑的制度,其建设难度大、周期长,因此在建设策略上要特别注意科学设计与长远规划。

(一) 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建设需要充分依靠科学研究

不少人认为职业教育没有太多理论需要研究,这种认识导致许多大学对职业教育学科建设不够重视,也导致职业教育政策制定及执行过程对理论的运用不够。然而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职业教育的国家制度多数专业性极强,需要非常深厚的理论研究做支撑。比如职业分类,其主要研究问题有:按照什么标准进行分类?按照什么样的细化程度进行分类?如何掌握一个国家职业的所有类别?当产业形态更新时如何对职业分类做出相应调整?这些研究的开展需要投入大量研究力量。再比如职业标准体系建设,其描述的内容均需要来自职业情境,因此这个环节的建设需要从职业情境中获得工作任务、职业能力等职业知识的开发技术,而要为每个职业完成标准描述更是需要大量投入。再比如技能的社会评价体系建设,其中涉及评价标准开发(与国家职业资格中的能力标准一致)、考试模式研究与开发以及相关管理制度的研究与开发,这些也都是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如果这些制度建设缺乏科学研究支撑,其建设就难以达到预

期结果,其实践效果也无法取得。

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职业教育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在发展思路与方法上实现现代化,即真正依赖科学研究来促进发展,真正发挥理论研究者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中的智力支撑作用。这是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转型。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展开的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均有强大的理论研究团队做支撑,它们这个时期出版的大量论著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国家层面的实践需要也推进了这些国家职业教育的学科建设,比如德国许多著名大学都拥有实力雄厚的职业教育学科点。而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研究与开发团队总体还比较薄弱,不能很好地满足国家制度建设的需要:(1)理论研究力量总体上还比较薄弱。国家制度建设首先需要强大的理论研究做支撑,而理论研究力量主要存在于高校,但我国职业教育的学科建设总体上还比较薄弱。尽管与20年前相比,全国高校中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数量、研究人员数量、研究成果数量均有了大幅度提升,但在有实践价值的理论研究方面还需要加强。(2)开发研究力量总体上也比较薄弱。国家制度建设需要强大的开发研究做支撑,这个环节的工作通常需要依赖各行业的技术专家来完成,但目前娴熟地掌握了职业教育相关开发理论与方法的行业专家比较少。(3)教育行政部门、理论专家、行业技术专家之间的合作还不够深入。理论专家对职业教育实践介入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使得三者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模式没有完全建构起来。因此,要在制度建设中充分发挥科学研究的作用,当务之急是要继续加强高校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建设,并为其研究人员参与职业教育国家制度建设搭建更多平台。

(二) 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建设需要做好长远规划

职业教育国家制度建设涉及大量开发工作,这些工作很难在短期内完成,职业分类体系建设、职教高考制度建设、职业标准建设、劳动就业数据报告制度建设、职业资格框架制度建设、专业教学内容标准建设、教师教育制度体系建设等均是如此。而且制度在实践中的应用比开发制度文本又要复杂得多,其需要花费的时间也要

长得多,但完整的制度建设是要以实践结果的取得为最终目标的。在进行职业教育国际比较时,我们往往会惊叹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制度的成熟水平,然而要看到,这些国家成熟的职业教育制度的形成均经历了很长时间,有的甚至经历了200多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所进行的职业教育基本制度建设,只是其制度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即以教育内容为核心的制度建设阶段,而其他领域的制度建设,如校企合作,则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

因此,对职业教育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难度与长远性我们要有充分估计。党的十九大提出的2035年实现现代化目标,在措辞上非常谨慎地使用了“基本”两字。这两个字对职业教育来说尤其重要。以上所设计的那些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有些可以在短期内完成并取得成效,如协调层面的国家基本制度、评价层面的部分国家基本制度,但对大多数国家基本制度而言,短短15年时间,即使是在精密规划、有序组织的前提下,也可能只能基本完成其建设任务,比如形成了基本完善的制度文本,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大范围的初步应用。要完成如此多庞大社会工程的建设,需要做好长远规划,并保证建设工作的连续性、系统性、稳定性,这是最终实现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目标的制度保障。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发展取得的最大成就是职业院校建设,而面临的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国家基本制度不健全,这是我国职业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主要体现,是阻碍我国职业教育朝更高水平发展的关键因素。2035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职业教育发展重心需要从院校建设转向国家基本制度形成。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要特别突出公共制度领域建设。这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思路的重要转型。实现这一建设目标需要强大的科学研究力量做支撑,并做好长远规划。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2期)

【编者按】本期新增“校长访谈”栏目。栏目旨在通过与民办学校校长对话的形式,聚焦一些问题,梳理若干思考,呈现闪光观点,展示深度思想。本期由本刊记者与上海新纪元双语学校校长李海林就“民办学校校长如何走向职业化”进行对话。详细内容如下。

民办学校校长如何走向职业化

——上海新纪元双语学校校长李海林访谈录

□ 本刊记者 刘耀明

◇《民办教育新观察》杂志记者

◆李海林:上海新纪元双语学校校长

近年来,校长职业化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情形下民办学校校长如何走向职业化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此,本刊记者与上海新纪元双语学校李海林校长进行了一番交流。交流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一、何谓职业校长? 职业校长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职业校长的专业化体现在哪里? 如何理解职业校长的独立性?

◇最近大家对“职业校长”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你觉得何谓“职业校长”?

◆就字面意思来说,“两个概念本来是没有本质不同的,“校长”是一个职业,所以“校长”本来就有“职业校长”的意思。但在“校长”这个概念之外,再提出“职

业校长”这个概念,肯定是针对“校长”在当下的某些特定含义而言的。是这样吧。

◇是这样的。

◆那我们来看看校长这个职位在当下的一些特点,就可以反推出“职业校长”到底指的是什么。在当下中国,校长这个职位有如下一些特点,你看看我概括得如何。

首先,中国的校长最大的特点,他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一个执行者。所有中小学的校长,其实都是不同层级的教育局的职员,他们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各个层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指令。这种情形,自然有它的优势,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

由这一个特点所决定,中国的校长人们最看重的,其实是他对上级的政策、文件和指示的理解和执行力。校长要处理的主要关系,其实是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关系。我个人的体会,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也需要非常小心和非常智慧才能处理好。但这是一种宽适应性的智

慧,在一些理论著作中,被称之为“一般知识和技能”,或者叫作“普通知识和技能”。当然,也不是说校长完全不需要专业知识,但在实际中,你能不能当上校长,这些并不是必须的,有些校长,专业性谈不上,但校长当得也不错。原因很简单,其实校长,有的时候关键是要理解和执行上级指令。这是很多地方校长最重要的能力。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中国校长作为管理人员,他其实只不过是学校管理架构中的一个环节。校长在办学校,但办学涉及方方面面,其中相当一部分,其实并不由他来管,他只管其中一部分。例如,办学首先需要建房子,需要添置设施设备,实际上,这些事情,几乎全部是教育局在办,校长几乎不用操心。即使是教育教学,看上去好像应该全部是校长的事了,但其实大部分也还是由教育局在管。课程就不说了,教学其实也是由教育局在管。教育局的业务科室,其实管的就是这样的事,各级教研机构,也是管学校的教学事务的。教师?有人事处在管着?科研?有科研处或研究院在管着。招生?有招生办在管着。财务?有计财处在管着。校长在管什么呢?校长其实只是一个项目经理,把这些事综合起来协调处理。有校长自嘲说自己是包工头,其实说得是蛮准的。

第四,中国的校长对职业来源有高依附性。这是比较文雅的说法,直接地说,教育局任命你为校长,你就是校长,没有任命你为校长,你就不是校长。这个跟很多职业是不一样的。例如我是医生,这个职业不是卫生局任命的,你任命不任命我都是医生,我现在是不是在医生岗位上,只要我还没有做其他职业的工作,我都可以说自己的职业是医生。例如导演,我从导演专业毕业,只要曾做过导演工作,以后再没有人聘我为导演,我还是导演。但如果没有人再任命你为校长,你就只能说我曾担任过某某学校的校长,你再说我的职业就是校长,恐怕会被人当作一个笑话来说。所以大学里面设置有导演专业,但没有校长专业,原因即在于此矣。在人们的心目中,校长是一个职务,并不是一个职业。

如果以上的概括大致不离谱的话,我想,所谓职业校长,主要是强调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职业校长应该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职业校长,当然不可能摆脱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但他主要是依据自己对教育教学的理解和经验,依据教育教学规律来决定自己的办学方向和策略。职业校长,直接面对人们的教育需求,研究人们的教育需求,围绕如何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来办学。这正如职业经理人,他们当然要研究国家经济政策,甚至要研究各级经济管理部门甚至行业管理部门的最新动向,但他们并不直接执行这些部门下达的指令,最终决定他们做什么、怎么做的,是人们的消费需求。这就是“职业经理人”的“职业性”之所在。这里所说的“办学自主权”不是说校长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而是说,最终决定校长办学策略、办学行为的,是教育本身的对象,而不是教育管理机构。

第二,“职业校长”之“职业”,就是“专业”,就是“专门性”的意思。“职业校长”,就是指具有管理学校发展学校的专门知识专门技能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职业校长”,就是“专门校长”。反过来说,现在许多校长,可能是专业的,也可能是不够专业的。你所谓的“职业校长”是不是就是强调校长的不可替代性?强调校长这个职业的专门化程度?

◇有这个意思。

◆“职业校长”最直接的含义,就是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校长。没有这些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算不得是职业校长。职业校长是不可替代的,不是随便找一个什么人,例如行政干部,很有行政经验,或者普通老师,书教得好,就可以当职业校长。不是这样的。

第三,职业校长,更有独立性。我们来比较一下。一个学校,在校长到任之前,它其实已经有一套管理体系,在校长之上,有教育局及附属机构的管理体系存在,在校长之下,也有学校内部的管理体系存在。任何校长到任的后的第一件事,其实就是摸清这一套管理体系,顺应这套管理体系。如果要改革,那也必须以这一套管理体系为基础,逐步调整。绝对没有推倒重来的。这个校长走了之后,原有的这一套管理体系并不会随着校长的离职而停止运作,它们仍然在发挥作用。这就是我说的,校长之不过是学校管理体系中的一环。但是职业校长不是

这样,职业校长是一个完整的管理框架。职业校长到一所新学校,第一件事,就是建构自己的管理框架。职业校长之所以被学校主办者聘请,第一个原因,就是让他来建构这个管理框架的。如果这个管理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校长的作用至少减少了一半。这就是现在有些民办学校的校长被称之为“执行校长”“分校校长”的原因。学校的管理框架已经被其他人建立起来了,这个校长被聘请来接这个盘子,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校管理框架范围内“照看”着这所学校,这样的校长就叫“执行校长”。“执行”什么?执行已经建立好的管理框架。

第四,职业校长,凭什么做校长?如果教育局没有任命你担任一个学校的校长,或者学校主办者没有聘请你担任这个学校的校长,你还有没有一个身份认同,我的职业是校长?如果是体制内的校长,没有再被任命担任一所学校的校长,恐怕你就不好意思说自己的职业是校长,你也没有这个身份认同。但是,职业校长即使不再担任某一所学校的校长了,他就在寻找或等待下一个校长岗位,他对自己有这个身份认同,我的职业就是校长,我的职业是不是校长,不是由自己之外的另一个人,或另一个组织决定的,而是我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努力决定的。正如一个医生是不是选择医生为职业,是由自己决定的,主要是看自己是否具有医生所要求的特殊知识和技能。

总之,我理解你提出的“职业校长”这个概念,有四大特点:具有高度的办学自主权;具有学校管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相对独立地建构学校管理体系;有明确的校长的角色认知和身份认同。符合这四个特点的校长,即我们所说的职业校长。这个概念之所以有价值,是针对目前中国的绝大部分校长的一些职业缺陷而言的。

◇按照你的这个分析,是否可以说,我们所说的“职业校长”,其实特指民办学校校长,或者说,是民办学校校长中的优秀分子。

◆可以这么说。所以我觉得,“职业校长”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民办学校校长的一种身份自觉。照我看来,一大批职业校长的诞生,是中国民办教育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民办教育的福音。不管是政府有关部门,还

是民办教育投资人,都应该大力促进这一职业人士的发展和壮大。

◇民办教育已经发展到需要一批职业校长的阶段,但民办学校校长和民办学校投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是的。现在民办学校投资人,也知道找校长很重要,但其视野,主要还是体制内的这些校长,或者退休的校长。其实并不是体制内的校长就一定适合当民办学校校长,体制内学校的校长所需要素质,民办学校校长都需要,但民办学校校长所需要的素质,体制内学校校长并不一定具备。

◇那民办学校校长应该具有哪些方面的素养?

◆民办学校的校长应该有区域教育发展宏观分析视野和能力。体制内学校校长,这个视野和能力有很好,没有不影响你的办学。因为有一个教育局替你在把控这个方向。民办学校特别强调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看现在发展得好的民办学校,都是在一个地区教育发展到一个特定的阶段,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抓住了机遇,趁势而上,抢占了制高点,抢占了发展的主动权。这是民办学校发展的特殊性之所在。那么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都需要民办学校的校长敏锐地观察到、把握到。这就是我说民办学校校长要有独立的宏观分析能力的原因之所在。具体说,就是那种区域教育发展状态、发展阶段的观察力、判断力和预测力。

第二,对教育,对学校,要有自己系统的思考和判断。照我看来,作为职业校长,他所做的事情,首先是分析一个特定区域内教育发展的现状和未来,然后从教育体系、办学体系中,拎出与区域教育发展高度适应的诸般要素,集中力量,全力突破,获得相对优势,从而带动学校的全面发展。这个能力,体制内学校校长也要有,但没有不至于影响他能不能当好这个校长,但民办学校校长,如果缺乏这个能力,则几乎寸步难行。职业校长之所以很“职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往往很容易被人忽视的方面。

第三,民办学校的校长,要有明确的学校运营的意识 and 能力。这句话,我也听很多业内人说。但仔细理解他

们说这句话,说的主要是学会如何赚钱。我觉得问题远比赚钱复杂。具体说,一要有成本意识,要算成本。二是有品牌意识,要花大力气营造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三是有风险意识,民办学校要有一套风险防控措施。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可以称之为学校运营意识和能力。

第四,民办学校校长,作为一个职业校长,要高度重视与学校投资人的关系的维护与调适。这正如一个职业经理人,高度重视与董事长的关系的维护与调适。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在一些民办学校的校长,对民办学校投资人主要是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一味地奉迎董事长的意志,以董事长是否高兴为办学的最高原则,这是不对的,不是对学校投资人的真正的维护,这不是职业校长应有的态度。另一种态度是疏离和背弃,如果董事长不高兴自己的所作所为,就以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态度“冷处理”。这也不是对的,这是对学校投资人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对自己的事业的轻视与随意。

◇我觉得你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正是我想跟你探讨的问题:作为一个职业校长,应该如何处理好与董事长的关系?

◆应该说,到现在为止,这都是这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但我认为,这又是一个圈内每一个人都需面对的一个话题。与其隐约而暗底下独自纠结,不如公开而相互坦率研讨。我想要强调一下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管是校长还是董事长,都应该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甚至认为,这是校长首先要处理的一对关系。目前,从校长的角度来说,首先,应该深入地了解、把握董事长的核心利益之所在。这个核心利益不是董事长高兴不高兴,而是他的事业发展顺利不顺利。在这个问题上,校长与董事长的主观认识不一定是一致的。因为他们关注的点可能是不一样的。董事长可能更多的是从规模、品牌等外在因素来考虑的,校长可能更多是从课程、师资等内在因素来考虑的。实际上是必须先有课程、师资等的优化,然后才有规模和品牌等的提升。如果没有课程、师资等因素的优化,规模、品牌的提升可能会落空。当出现这类分歧的时候,校长要坚守自己的专业立场,

不能一味逢迎董事长当下的要求。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是对董事长核心利益的真正的负责。办学投资人之所以不惜重金聘来职业校长,就是要你从专业立场上来替他把好这个关,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的。在董事长周围,直接听命于他的指令,为他办事的有很多,不需要多校长一个。校长真正的价值,对董事长来说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你从专业角度为他提供的全面的高质量的服务。坚守专业立场,这是职业校长安身立命之本。我甚至觉得,这是区别一个人是不是职业校长的关键。

第二,与董事长处理好关系的根本,是把学校办好。把学校办好了,就从根本上得到董事长的信任,把学校办好了,也才能具备职业校长的资格与董事长对话。把学校办好了,所有的做法都可能成为经验,所有的问题都可能被包容;学校没办好,所有的理由都可能成为借口,所有的经验都可能受到质疑。民办学校校长作为职业校长,是拿结果说话的。这一点,任何想成为职业校长的人,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我想特别强调民办学校校长的工作态度。具体说就是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其实大多数学校投资人,也都是能体谅民办学校校长的艰难的。据我的观察到,如果董事长对校长的工作投入是认可的,就有了继续合作的基础。民办学校的校长,对办学中遇到的困难,不应该一味抱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确可以把我们在办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相当部分归结于投资方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投资者聘请我们来,不是要我们向投资人指出他的问题的,而是来解决他的问题的。我们应该是以问题解决者的姿态面对这些问题的。有没有这个姿态,主要看工作投入程度。对学校遇到的困难,要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去克服,要勇往直前,不要畏缩,不要徘徊,不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要怜惜自己的力气。这就是我所说的投入程度。

第四,民办学校的校长,要比公办学校的校长更廉洁。我加入民办教育这个圈子三年多,我从没有听见任何人、在任何场合下说过民办学校校长的廉洁问题,好像这个问题只有公办学校才有。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我曾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过,民办学校的校长,要比公

办学校的校长更重视个人的廉洁问题。民办学校的校长,也有个人利益问题,但个人利益问题都要在就任校长之前与学校投资方的谈判中彻底解决,并在合同明确加以固定。一旦就任民办学校校长,就不能有任何个人利益的考量,更不能有任何私念。我个人的做法是,民办学校的校长,在本校内,不得领取任何补贴,开支任何私人经费,不获取任何物质福利。在学校钱财的管理上,坚持有权者不用钱,用钱者不给权。廉洁,这是公办学校校长的立身之本,也是民办学校校长的立身之本。一旦在这个方面丧失学校投资人对你的信任,则俱往矣。

第五,一般来说,被民办学校聘请为校长,往往是有了一定资历,有一定影响的教育界人士。民办学校办学之初,需要借助校长既有之名望,扩大学校的知名度,打开学校工作的局面。这是学校投资人最希望看到的。民办学校校长应该有这个意识,应该善于利用已经在业界积淀下来的身望,将个人身望资源转移到学校上去。

以上是从校长这个角度说的。处理好校长和董事长的关系,是两个方面的事,董事长也有要做到的基本要求,否则,这个关系是难以处理好的。有的时候,对董事长这方面的一些要求,对处理好关系更为重要。我们另找一个时间,专门谈这个问题。

二、职业校长从哪里来?为什么当下处在半职业化状态的民办学校校长成长很慢,尚未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职业校长转型之难,到底难在哪里?

◇你好像很强调民办学校校长的独立性。我想问具体如何理解职业校长的独立性?

◆这句话听上去还像有点民办学校校长要闹独立,要权的意思。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所说的民办学校校长的独立性是一个学术概念。它主要是指以下几点。第一,民办学校校长的职业来源不是外赋的,而是内定的。民办学校校长的权力是由学校投资方赋予的,是由于投资人聘请你担任一所学校的校长,你才有支配学校人财物的权力。但是,民办学校校长这个职业,却不是由投资人或任何其他他人赋予的,而是由校长本人自己确定的,

是由于你具有民办学校管理的全面知识和技能以及个人意愿,所以你拥有校长职业。这一点虽然只是一个名义,但对职业校长的独立性却至关重要。换一句话说,是不是在校长这个职位上,他都是一个职业校长,这就是独立的校长。

第二,民办学校校长要独立掌握学校管理的所有方面,从创立学校的环境分析及立校之策的确定,到学校基础建设的设计、实施,到搭建学校治理框架,到组建队伍,到课程建设,到教学管理,到制度、文化、品牌、奖惩等等,以及学校外部关系的维护与调适等等,一句话,民办学校校长要有不依赖于他人独立管理一所学校的全过程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有了就是独立的校长,就是职业校长,没有就不是。

第三,民办学校校长对教育,对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对学校管理的基本准则,对自己的基本评价,都有比较稳定的看法和态度,不以他人的看法和态度的改变而改变,也不以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听上去这样的校长好像很“固执”。是的,职业校长常常给人固执的印象。一方面,职业校长是“职业”的,他最了解这个职业的规律,他对这个职业的一些看法和作法,带有强烈的探索性,我们应该允许这部分人对自己职业有新认识,有不同于他人的认识。换一句话说,允许他们固执一番。另一方面,如何办教育,没有唯一,没有最好,只有更适合。适合不适合,不在其位不可能最了解,最清楚。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对一个专业人士,可以选择,但不要试图去改变他。改变一个专业人士,不管是对社会,还是对他本人,都不是好事。

◇是的,职业校长有自己的特殊性。民办教育发展到今天,迫切需要职业校长的崛起,遗憾的是,今天的职业校长还没有真正成长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刚才我说,职业校长的崛起,是民办教育的福音。我这是就职业校长的角色定位而言,而不是说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支职业校长队伍。不是这样。这正是我想强调的,民办教育的发展,热切呼唤职业校长的诞生,但现实不如人意,职业校长队伍尚未形成。我觉得原因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在大多数民办学校的校长还没有意

识到“我要成为职业校长”,这是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还没有意识到职业校长要具备什么特质;他们还只是从一般校长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他们还只是按一般校长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另一方面,整个学校投资人群体还没有意识到职业校长的重要价值,没有意识到职业校长是民办教育发展到新阶段呼之欲出的群体;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所谓职业校长,与一般校长是不同的,职业校长需要一般校长所没有的特殊历练和素养。一句话,职业校长是需要培养的,他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民办学校校长和民办学校投资人两个方面都要努力。

◇我想换一个角度来问你,在你看来,什么样的校长不适合做职业校长?

◆哈哈,这个问题不好讲。容易得罪人哦。

◇我看你对这个问题好像有思考。你是学者,你就从学者的角度来谈谈你的研究成果好了。

◆看来我不讲还不行。大致上我觉得,职业校长首先要真正面对市场。那些借着民办学校外衣的“假民办”的校长很难成为职业校长。因为这样的学校没有生存在真实的市场环境里,他有太多可以凭借的资源 and 政策优势。这样的校长,换到真正的民办学校里去,要么他要彻底改变自己,要么就玩不转。

其次,职业校长要有专业胆识,职业校长要有魄力,有独立决策的能力,学会自己作主,自主决策,这就是专业胆识。如果一位校长凡事总是去请示董事会,让董事会替自己做决策,总是在寻求别人对自己的管理,显然是有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执行校长”,所谓“分校校长”,是很难成为职业校长的。

第三,将民办学校当作自己退休生活补充或公办学校校长待遇延续的校长,很难称之为“职业校长”。职业校长之所以是职业校长,重在创业。有创业激情和创业能力的校长,才称得上是职业校长。不知道我这样说会不会有点过。

◇那我们在校长们如何才能顺利地实现从校长向职业校长的转型?

◆我想你实际上是指从公办学校出来的校长们如

何实现向民办学校校长的转型,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题目。但如果只是从职业校长的角度来谈,我觉得倒比较简单。第一件事就是对学校投资人要有一个全面的研究和了解。如果这是一个教育集团的话,则对集团的文化、集团的办事规则和流程要有一个具体的把握。第二件事要全面梳理一所学校的办学环节,找出哪些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哪些是不熟悉的,对自己的经验迅速查漏补缺。这两步,是你尽快进入职业校长这个角色的前提,也是关键。其他方面,则可以实践中逐步成长。

◇职业校长的成长是需要土壤、需要环境的。当下,职业校长的生存环境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

◆前面说过了,不管是校长本人还是学校投资人,都没有认识到职业校长的崛起迫在眉睫,都没有意识到校长职业化对民办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现在确实没有看到一大批数量足够、年龄正值事业高峰、未来发展可清晰期望的职业校长队伍。全国来看,民办教育界零星有一些名校长,但他们的名望,基本上都来自于他们过去在体制内学校的成就,现在的名望,基本上是体制内的名望的余响,我看也“余响”得差不多了。民办教育界内部都还没有建立校长职业化的理念,社会就更没有考虑如何为校长职业化提供土壤。那还差得远呢。

如果单从理论上来设计,我觉得校长职业化,从社会这方面来说,有待于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第一,要形成民办教育大发展的局面。职业校长的发展,是建立在民办教育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民办教育发展的规模、空间、质量、社会影响力,乃至其财力物力等,决定着职业校长的数量、待遇、事业空间和前途。一个空间狭小、政策摇摆不定、声名不佳的民办教育,不可能需要、也不可能产生所谓职业校长。

第二,现在国家有了民办教育促进法,这个法其实是规范国家、政府与民办教育的关系的。但民办教育还有另一个领域迫切需要法律规范,那就是民办教育内部治理关系,核心是学校管理者与学校投资者的关系。要对民办学校校长的权力边界作出明确的界定,同时也要对民办学校校长的责任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民办学校

的校长要摆脱现在一事一议、一人一议的聘任方式,要有法可依,有法可究,这个职业才真正叫做职业化。这件事情,不管是对学校管理者,还是对学校投资者,都是一种法律的保护。

第三,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学校教师的地位,有了明确的规定,民办学校教职工在业务培训、职务聘任、教龄和工龄计算、表彰奖励、社会活动等方面依法享有与公办学校教职工同等权利,但对校长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却缺乏表述。教育行政部门,在校长这个职业的公权力方面,应该公办民办一视同仁。现在在国家层面的教育工作者表彰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民办教育者的身影,但在基层,民办学校校长基本游离于这套系统之外。这显然是不利于民办学校校长的职业发展的。

当然,以上都是从社会土壤的角度来说的,民办学校校长的职业发展,关键还是看自己,是否努力,是否争气。

◇最近两年来,有不少公办学校的名校长纷纷加盟民办教育,比如,四川成都的蓝继红、山东潍坊的赵桂霞,上海有程红兵,当然还有您。还有一些是一从公办退休就被民办教育集团邀请加盟的。比如杭州的叶翠微,苏州的柳袁照。这是否意味着民办教育正在成为教育人才的高地?

◆哈哈,远不是这么回事。第一,相对于民办学校校长这个大群体而言,像蓝校长、赵校长、程校长、叶校长、柳校长这样的名校长太少。人才高地,是由一大批人构成的,不是像这样的零星几位有名望的校长来点缀的。第二,这些名校长之名,不是在管理民办学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是在公办学校形成的,这些教育人才,他的才能与民办教育缺乏血肉联系,有一些还有待于转型之后才可以为民办教育所用的。第三,现在民办学校校长队伍,尚没有形成团队,基本上是散兵游勇,既没有基本的稳定的来源,也没有统一的、明确的任职标准,也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和一致的目标追求,我觉得整体来看,尚没有职业自觉。这就谈不上人才高地。

有几位名校长加盟,就有人才高地的感觉,绝对是自我感觉良好,是很危险的。我的感觉恰好相反,民办学

校校长这个群体,不管是事业气魄、还是专业视野,还是管理水平,还是心理成熟,都没有办法与公办学校校长群体比。这个结论,首先是对我自己反思的结果。我从公办学校校长转到民办学校校长,整个心理状态就变了,变得焦躁了,变得急功近利了。我需要锤炼自己,才能重新获得平静。

至于公办学校校长退休后重新被民办学校聘用,对当前民办教育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相当部分的民办学校也就是采用这个办法解决了管理人才缺乏的问题。但这是救急之法,这不是解决民办学校管理人才的长远之计。这一点似乎尚未被民办学校投资人意识到。

民办学校的管理人才,要靠自己的培养。他要长期在民办教育里摸爬滚打,逐步从民办学校基层成长起来,直至校长的位置。这样的人才,才是真正的职业校长。像我这样中途进入民办教育,然后直接进入民办学校管理高层,这终究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底蕴不厚,走不长远。我自己有清醒的认识。

◇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不同,民办学校有自己的创始人。对于学校来说,创始人精神,也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和文化源头。你怎么看?

◆职业校长应该从创校开始。这正如大多数职业经理人都会有一个创业过程。没有经历过创业过程的职业经理没有含金量。我们过去一直认为,学校文化是专家设计出来的,或者是校长在办公室苦思出来的,或者是在会议室研讨出来的。我个人的体会,都不是。学校文化是创校团队干出来的。在创校过程中,学校创始团队会遇到许多困难,会经历许多痛苦和磨难。在这样的痛苦和磨难中,作为校长,会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提炼出一种精神力量去战胜这些困难,和大家一起去经受这些考验,然后终于走出困境,克服这些困难。最重要的是,解除了大家共同感受的痛苦。这些精神力量就沉浸在创始人团队中,形成创始人血液里的东西,对这些东西,创始人及其团队会特别在意,特别看重,对这一部分人也特别有效,有的时候甚至从反面形成某些行为禁忌。这样的东西,就是学校文化,我在一篇文章中称之为学校

DNA。

这样的东西,没有亲身经历过创校过程的人理解不了,感受不了那么真切。这就需要创始团队在学校管理实践中传承和示范。一个校长,要顺利实现职业化转型,完整地走完一个学校的创校历程,不可或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校的磨难,是一个职业校长的孵化过程,职业化,是创校磨难的职业回报。

三、职业校长如何自我评估?如何自律、自我约束?如何看待某些地方的民办学校一票难求的现象?如何解读当前民办教育的生态?

◇民办基础教育领域有这样一个现象,在不少地方的民办初中都是当地领跑学校、热点学校,每到招生季可谓一票难求。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民办教育在推进教育改革层面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民办教育真的在领跑公办吗?

◆我加入民办教育时间太短,似乎还要再继续观察一段时间才能谈论这样的具体的问题。但总的感觉是,民办教育圈内人自我感觉太好。自我感觉好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感觉好的依据是什么?这种感觉好竟然来源于你所说的“一票难求”。我觉得这种感觉良好蕴育着危机。

◇愿闻其详。

◆民办教育在中国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一句话概括,它是公办教育的补充。我觉得这一句话把民办教育的性质说到底了。民办教育的价值,存在必要性,发展空间,未来前景,都在这句话中了。虽然在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其表述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但大家都知道就是“补充”。在中国,民办教育不可能成为与公办教育并行的第二个教育系统。这一点,我们搞民办教育的人要有清醒的认识。

国家对民办教育的这一个定位,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民办教育要选择与公办教育不一样的办学策略。理由很简单,公办教育有强大的政府支持,有永不涸竭的社会资源。如果我们试图与公办学校展开竞争,而不是错位发展,不管是从哪种意义上都是不明智的。公办教

育担负有国家战略,包括它所承担的社会公平、社会稳定、意识形态、民生以及社会风尚等方面的政府责任等。如果民办教育在与公办教育的竞争中,冲击了公办学校正常履行这些方面的责任,则必将受到限制。最近有些地方,开始紧缩民办教育的管理和政策,就是因为前几年,一些民办学校在某些方面“引领”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甚至扰乱了一个区域内的教育秩序。

至于你所说的“领跑学校”、“热点学校”,你大概是指那些升学率高的学校吧。我不否定这些升学率高的学校有一些确实是好学校,我也不认为升学率高本身有什么不好。但是,一方面,说应试搞得好、升学率高就等于好学校这个至少是片面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这个应试搞得好、升学率高是怎么来的?如果是科学规划,系统安排,为每一个学生量身打造复习计划,提高每一堂课、每一次作业的典型性和思维含金量,这诚然是可贵的,也是好学校的一个方面的表现。但是你看看现在大部分“领跑学校”“热点学校”,他们最大的“领跑”、最“热”的是什么?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生源。

这是现在行内都知晓的公开的“秘密”,一个学校,要想成为“领跑学校”“热点学校”,最有效的招数就是抢生源。李镇西曾提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我称之为“李镇西之问”,为什么好的医院就是把最“差”的病人治好,而所谓最厉害的学校往往要抢好的生源?如果一个医院只抢感冒病人来治,然后统计自己的治愈率是100%,估计立马就会关门。而一所学校抢来一个地区所有最好的生源然后吹自己教学质量高,则无人质疑。最恶劣的招数,就是拿钱去买好生源。这里有一个我们业内都知道但从来不公开说的“良性循环”:学校拿钱买好生源;学校的钱从哪里来?用经过包装的升学率吸引大量生源,以及不断提高或明或暗的收费。生源越多,收费可以越高;收费越高,学校越是有钱;学校越是有钱,越是可以买来更多更好的学生;更多更好的学生,越是可以提高升学率……。这就是一些热点名校的“良性循环”。个别学校买生源的范围,可以包揽全省辐射全国。用来买生源的金额,也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当然,公办学校也可以这样。但公办学校整体上被

教育行政部门管着,这样操作的时候有诸多制度上的制约,另外,公办学校还必须顾及到其他同类学校的监督和意见,所以整体上不如民办学校在哪些方面肆无忌惮。这就是近年有一些民办学校成为当地“领跑学校”“热点学校”的最主要原因。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抓质量、抓升学率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手段必须正当,其中抢生源肯定不属于正当范畴。

◆第一,质量不等于升学率。升学率高不一定就等于有质量,升学率不高不等于就是没有质量。上海近年推出的新优质学校,升学率就不是最高的。这个道理太简单,就不费口舌说了。第二,正当的手段是什么?就是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关心每一个学生,发展学生的每一个方面。不是只关心能提升学校升学率的学生,不是只关心与考试有关的方面。就这么简单。如果坚持了这个正当手段,同时也关心考试之外的教育内容和教育目标,那升学率高才是有价值的。必须强调一下,我并不反对抓升学率,我本人在办学的过程中,也花很多力气在抓升学率。但是,一方面要考虑手段的正当性,要考虑升学率之外的基本教育内容和教育目标,另一方面,抓升学率是过程,是策略,它不是我的目标。我作为一个新学校,我先要抓好升学率,以此建立广大学生和家长的信任,从而获得学校的立足之本,从而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然后有力量来把学校办得更好,有力量把升学率之外的内容和目标逐步达成。总之,升学率是我的策略,是一个过程,我不会把它最后变成学校的办学目标。

◇你这一段话我觉得把升学率与教育目标的关系说清楚了。

◆说到底,追求升学率是过程,是策略,不是教育的目标。另外,追求升学率手段要正当。民办学校追求升学率,如果手段不正当,在升学率之外别无其他教育内容和教育目标,就称不上是好的教育,好的学校。而在这方面,我必须公正的说,民办学校比公办学校,做的其实更差。虽然公办学校做得其实也并不好。正是出于这样的分析和判断,我觉得,你所谓某些地方的“领跑学校”“热

点学校”,其中有相当部分,终究是走不远的。我的感觉,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任由民办学校毫无顾忌地推行应试教育,已经开始冲击公办教育的正常秩序,并从而影响公办学校所承担的社会公平、社会稳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使命。这一点,我觉得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甚至一些三线城市的政府官员,开始有反思了。

◇这么说来,当前,民办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又何在呢?

◆先回到你那句话,民办学校在领跑公办学校吗?我的回答很简单,没有,完全没有。我们从事民办教育的同志,发现我们一些学校的升学率比一般公办学校要高,生源更广,甚至在一些地区成为家长们趋之若鹜的学校,然后就认为我们领跑公办学校,我们就是领先于所有公办学校的好学校。这种认识,一方面太短视,太小气,太没有大志向,太没有大胸怀,也太没水平,另一方面,也太没有危机意识,太麻木不仁。我感觉到,这种情况不会长期存在。因为这和国家发展民办教育的原旨不符。

那么,民办教育的发展前景、发展方向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现在在抓应试,抓升学率方面,有些民办学校做得比公办要更好?原因其实在于,公办学校一方面要适应家长的需求,另一方面还要受教育行政部门(其实就是国家)的制约。民办学校呢,教育行政部门对它的制约相对薄弱,所以民办学校有一个机制,就是对家长的需求最敏感,反应也最快。现在家长们对学校的最大需求是什么?就是升学。这就是现在一些地方的民办学校能成为“领跑学校”“热点学校”的社会原因。

现在的问题的,家长的教育需求,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现行的教育模式不满。这部分人,各阶层都有,但尤以知识阶层、企业主阶层和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人为主。这部分人新的教育需求,在公办学校其实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公办学校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更重要的是,公办学校其实并没

有响应家长需求的机制,他更多的是响应政府的需求,响应教育行政部门的指令的机制。这个空缺,就历史地留给民办学校。

为了生存,民办学校天然地具有一种关注家长的需求,响应家长的需求的动力,由于他的分散性质,也由于他的单层管理模式(董事长-校长),他天生具有及时响应家长需求的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又对民办学校的未来,充满信心。说得更透彻一点,民办学校的价值和意义,希望并不在民办学校本身,而在家长的教育需求的变化上。家长的教育需要正在发生变化,当这种变化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民办学校就会启动它对家长需求的响应机制。那个时候,民办学校才有可能真正领跑公办学校,才是民办学校实现自己真正价值的时刻。

只是,我们从事民办教育工作的同志,可能现在并不一定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但等不及,或者不愿等,不愿做那么长远的考虑。

◇如果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审视今天的民办教育行业,你会怎么解读今天的民办教育生态?

◆今天怎么都提这样敏感的问题?今天我所有谬论都是被你逼出来的。

◇今天就是一对话,启发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我们自己的未来的话题。谈不上敏感吧。

◆如果你指定只能从批判的眼光来审视的话,那我可以这么说几点。第一点,是民办教育想当下的时间比较多,想未来的时间比较少。我不知道我这样表达清晰吧,适合吧。我当然知道这也有必然性,因为民办教育遇到的紧迫问题还是生存问题,而生存问题都是当下的,生存的问题都不能解决,想未来的问题也没有意义。但是这是对某一个人、某一所学校而言是这样。对于整个民办教育界,一定要有一部分在研究民办教育的未来。更何况,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未来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定数,我们考虑当下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失去了准星,就没有方向,终究也没有持久的动力。民办教育整体呈现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势,这是民办教育留给我这个新兵的第一个印象。

第二点,公办学校之间也存在竞争,但民办学校之

间的相互竞争更为激烈。本来学校之间的竞争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成熟的竞争,是各个办学主体的定位清晰而充分后,在同类学校之间的比拼。民办学校现在还处在定位不清晰状态下,大部分民办学校其实还处在模仿公办学校的阶段,因此,民办学校的竞争是双重的,既有民办学校内部相互之间的竞争,又有与公办学校的竞争。所以民办学校面临的,是非常残酷的竞争环境。一方面,对教育来说,合作比竞争更重要,另一方面,竞争也过于激烈。这种竞争使民办学校失去与其他办学主体协调发展的意识,也使得自己的办学行为没有可持续性。这不是一个好的生态。

第三点,民办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哪里?在家长那里。民办学校的投资人和管理者,现在都意识到这一点,都非常重视与家长的沟通与交流。但是,在当前这种历史条件下,家长大部分都是盲目的。现在择校热到这个程度,但你去问问家长,你择校的时候,是依据什么?是因为什么原因你一定要奔这所学校而去?你对这个学校的理念了解多少?对这个学校课程了解多少?大部分情况下,回答是模糊的。实际上的理由就是:大家都想去,肯定是好学校,所以我也让我的孩子去。这样的家长,算不上明白家长,算不上成熟家长。但是我们好多民办学校,就是被这样的家长群体在包围,享受着这样的家长的追捧,被这样的家长群体牵着走。我觉得这是不可持续的。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一旦家长群体分化,民办学校赖以生存的家长群体散了,学校就会逐渐陷入困境。民办学校的优势在各各不一样,它终究是以办学个性见长。相对应的,它的服务对象是特定的家长群体。只有这样,民办学校的家长群体才是稳定的。这一点,只要看看国外的民办教育发展历程就很清楚了。

◇我要提的问题都提完了。我个人的感受很深,拓宽了我对民办教育的认识视野。如果让你说最后一句话,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们国家的民办教育,放在历史长河中来看,才刚刚起步。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都是在为后人打基础。但愿我们的后人有一个比我们更好的未来。谢谢。

2018年12月

本科立校 特色发展

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 南昌工学院

近年来,南昌工学院确立“育人为本,追求卓越”办学理念,弘扬“忠信笃行,自强不息”大学精神,围绕“学科引领、本科立校、文化兴校、人才强校、特色发展”办学思路,以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线,以学科专业建设为龙头,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突破口,坚持立德树人、特色发展,推进“三全育人”“五育并举”,不断向“有特色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办学目标奋进。

一、学校基本情况

南昌工学院创建于1988年,是一所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民族教育特点突出的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学校前身是中共七大代表、江西省委原书记傅雨田等一批老同志创办于1988年的民办赣江大学。1998年学校更名为赣江专修学院,2003年学校更名为江西赣江职业技术学院,同年被教育部选定为“全国高校民族预科教育基地”。2011年4月,经教育部和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江西赣江职业技术学院的基础上设立南昌工学院,成为普通本科院校。

学校设有新能源车辆学院、商务贸易学院、财富管理学院、人工智能学院、人居环境学院、传媒设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体育学院、教育学院等9个二级学院,

开设有55个本科专业和33个专科专业,涵盖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法学、艺术学和教育学等7个学科。现有在校生2.5万余人,教职员工1500余人。

学校现有江西省汽车零部件数字化制造工程实验室、江西省智能楼宇网络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省级众创空间、南昌市DME光电工程应用研究重点实验室等19个创新平台,拥有省级重点学科1个,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3个。2014年学校被江西省列为首批“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试点院校”。

二、学校办学特色

学校秉承“忠信笃行、自强不息”的校训,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又红又专的应用型人才,逐步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一)党建思政工作有特色,被选定为全国、全省民办学校党建学习基地

南昌工学院把党建作为学校的立身之本,在全省民办高校中第一个成立党组织,第一个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为学校发展立“根”,强化思想政治工作为学校发展铸“魂”,

突出“强根基、提质效、创特色、树品牌”,积极探索民办高校加强党建和思政工作的特色之路。董事长王斌强调:无论公办民办都是党办,无论营利非营利都是公益。

1.抓基层,稳根基。优化了党组织机构设置,以教研室、创新团队、年级专业等为单位,制定了《二级党委设置方案》和《基层党组织设置调整方案》,在党员人数100人以上的学院成立二级党委,目前已设11个二级党委(总支)、70个党支部,实现了党的三级组织全覆盖。配备了组织员等党务、思政工作队伍,设立了党支部书记岗位津贴。开展了“支部建设年”活动,举办了《党支部工作条例》专题培训班;以“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主题党日等党支部日常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切入点,提升基层党组织活动水平,增强党支部的向心力。机关党员活动中心被评为省级标准化党员活动室,商务贸易学院学生第一支部被评为教育部首批全国党建工作示范样板支部。

2.抓基础,强队伍。注重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开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坚定四个自信,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党史学习教育等主题学习教育活动,有效促进了理论武装。注重强化党员意识,从根本上纠正体制内、体制外党员要求不一样的错误思想,牢固树立全体党员必须无条件遵守党章、《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等制度规章。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教育教学、学生管理、办学评估等学校重要活动中,广大党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加强业务学习,带头服务师生,带头弘扬正气,立足自身岗位创先争优。

3.抓规范,明规矩。规范党建工作流程,组织编写了近10万字的《南昌工学院党支部工作实用手册》,就发展党员、搞好民主评议党员、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等10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形成规范,增强了党建工作的程序和规矩意识;印制400余册《手册》发至全校党务工作者,选定若干个基层党组织进行试点,并在校党委工作会议上进行演示交流。出台了督查量化细则,对全校二级党组织工作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查,制定了校领导挂

点指导制度。建立了党建检查交流制度,每学年通过“听、问、看、查”等方式,对各二级党组织党建工作进行评比交流,提高了规范化的整体水平。

4.抓创新,促创优。积极探索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校园文化建设等,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连续7年组织40多个民族1000名学生赴井冈山和赣南苏区开展爱国主义实践教学活动,在校园内外产生良好反响,受到新华社、光明日报等40多家主流媒体关注,被教育部简报刊发;以此为题材制作的微电影,分别获教育部2017年、2018年我心中的思政课微电影三等奖和优秀奖。充分利用江西红色资源,把红色基因传承贯穿党员发展始终,通过“选种、育苗、结籽”三步曲精准施策重点培养,确保少数民族党员“根正苗红”,总结形成了“红石榴”培育工程,十九大以来培养发展少数民族党员900余名,把各民族学生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该项目获评江西省第二届党务技能大赛二等奖。此外,积极参加、承办全国、全省民办教育协会各类活动,先后在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战略发展大会、全省高校党建工作会上作经验交流,被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评为“党建学习基地”“党建特色建设项目”。

(二)应用型人才培养有特色,被列为江西省首批“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试点院校”

学校2010年升本后,定位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实用的应用型人才,服务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校毕业生以爱岗敬业、基础扎实和技能突出获得社会和用人单位肯定。2015年以来,学生参加各类竞赛获省级以上奖项1500余项。学校连续荣获江西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优秀等级学校和江西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1.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大力打造双师型的师资队伍,在教师引进方面,强调不仅要有高学历、高学位,同时还要有一定的实践技能。在教师职称评聘和评先评优方面,也注重实践能力和技能证书的作用。同时我们立足自身,加强师资队伍实践能力培养,把现有的老师,送到相关企业单位去实习、去学习、去跟班,利用寒暑假或者脱产实习实践,了解掌握生产线整个工作流

程。

2.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加强教学设计和教学组织,设计引入更多实践型的教学环节,加大实践教学比重,使学生理论到位、实践较优。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做到“六个对接”,即校长和总经理对接,二级学院院长与部门经理对接;专业与就业对接,课程与流程对接,教室与车间对接,教师与工程师对接。着眼社会、地方所需要的行业对人才需求,更多地实践中教学生怎么做,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3.加强实习实践基地建设。加强校企合作,建立了江铃汽车、途虎养车、西海基石等一批校外实习实训基地,让学生通过实训、实习,实现毕业即就业,做到无缝对接。实施推广“订单班”培养模式,专门为企业定制培养人才,从学生进入学校的第一天开始,就以企业来命名班级,企业给学生提供奖学金、岗位培训、师资设备等一系列学习条件,真心做到“校企合作”。

(三)民族团结教育有特色,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2003年以来,学校开始承担民族教育任务,十余年来年来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各民族人才10万余人,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校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被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国家民委授予“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创建示范学校”。

一是严。严就是严格管理,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家校携手、民汉联手,切实把握民族学生思想动态,有的放矢做好思政工作,使民族学生团结在共和国的旗帜下,遵守共和国的法律。同时,加强警示教育和政策规定学习,对个别违反规定的民族学生依规处理,使“五个认同”、“三个离不开”以及民族一家亲思想深入人心。

二是细。少数民族学生都是来自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学校对他细心细致进行教育培养,建立导师育人制度,将若干个学生分配到每一位老师,进行“思想引导、学业辅导、生活指导、心理疏导”,对学困、贫困、心困及有重大疾病史的学生,实施“一对一”帮扶。同时,根据其基础特点,制定个性化教育方案,使他们通过一

年的预科学习阶段能够更好地对接好本科院校。

三是爱。对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努力为其解决经济上的后顾之忧,认真落实“奖、贷、助、补、免”一体化资助体系,优先推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到勤工助学岗位。在培养入党积极分子、“专升本”、就业等方面优先考虑民族学生。

(四)校园文化建设有特色,学校博物馆被文旅部选定为“非遗”人群研究传承基地

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南昌工学院实施文化兴校战略,把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作为培根铸魂的重要载体,以美育德、以美怡情、以美促善,用活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江西红色文化、民族文化“三张牌”,营造向真、向善、向美的校园文化氛围,培养知美、爱美、懂美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1.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一言一行总关情,一草一木皆有心。所有的教育教学活动都是文化活动,一草一木都具有美育功能。为发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校园所有道路、桥梁、楼栋均从国学经典中择词命名,彰显责任与担当。建设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博物馆、校史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平台,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增强师生文化自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博物馆为国家二级博物馆,占地一万八千平米,是我国迄今唯一一座为532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专门建造的特色博物馆,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精品展示基地、绝技传授基地、学术交流基地和教学观摩基地,对培养学生极致专注的工匠精神、学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学校也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入选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学校博物馆被选定为“非遗”人群研究传承基地。

2.用红色文化感染。学校扎根红土地办学,自觉承担起弘扬红色文化的重任。学校每年在入学教育中设立红色文化教育专题,邀请红军后代讲述先辈们的革命故事,邀请战斗英模进校园交流互动,让学生走进革命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感受先烈先辈们不屈不挠、为信念抛头颅洒热血的红色精神和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

胜利的英雄气概。成立江西红色文化教育研究实践中心,开设《红色文化教育》课程,连续7年组织了50个民族近千名学生赴井冈山、赣南苏区开展爱国主义实践教学,引导学生走进红色历史,领悟红色精神,践行红色使命,延续红色血脉,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打造红色文化经典课堂,探索江西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之路,形成了红色文化育人的长效机制。

3.用民族文化凝聚。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让师生把各民族优秀的、经典的、具有传承价值的文化带进校园,以“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开展校园文化艺术节、美育成果展、民族运动会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覆盖面广、吸引力强的第二课堂活动,促进多民族文化交流,积极开展民族文化育人,使各民族学生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展现新时代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三、办学声誉与日俱增

近年来,学校广泛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行“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形成了“学科引领、本科立校、文化兴校、人才强校、特色发展”的办学思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整体实力显著增强。学校现为教育部首批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教育部本专科应用型人才培养试点单位、国家3A级旅游景区院校、江西省首批“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试点院校”,连续九年被评为江西省就业工作优秀等级学校和先进单位,连续十二年获“江西省综治工作(平安建设)先进单位”,入选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先后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学校”“全国民办学校党建学习基地”“江西省民办学校党建学习基地”。

华东八校共建长三角可持续发展大学联盟成立

近日,由同济大学提议,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东八校”共同发起组建的“长三角可持续发展大学联盟”(简称“大学联盟”)成立。联盟将发挥长三角高校优质资源的优势,服务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当天,联盟发布《促进碳达峰碳中和高校行动倡议》。

来自长三角地区的华东八所高校共同成立长三角可持续发展大学联盟,对于助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次参加长三角可持续发展大学联盟的高校都是全国顶尖高校,具有一流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联盟高校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持续深化交流合作,聚焦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聚焦服务区域协同发展,聚焦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引领带动长三角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将为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作出更大贡献。

八所高校领导共同签署《长三角可持续发展大学联盟章程》。根据章程,联盟将围绕可持续发展领域,充分发挥长三角高校学科优势,通过资源共享、课题共担、学分互认和人员互聘等新机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咨政建言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为示范引领长三角地区、全国乃至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当天,联盟发布《促进碳达峰碳中和高校行动倡议》。《倡议》指出,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中,高校承担着责任重大,义不容辞。联盟面向全体高校发出如下倡议:一是号召师生学习零碳知识,树立绿色低碳新理念,加深师生对碳达峰、碳中和的了解;二是呼吁师生从身边做起,开展绿色低碳活动实践,鼓励大学生投身绿色校园建设;三是充分利用专业优势,解决绿色低碳领域“卡脖子”问题,推动绿色低碳领域颠覆性技术创新;四是强化产学研合作,促进低碳技术推广应用,实现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五是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融入全球绿色低碳创新网络,深度参与和支持全球绿色低碳创新合作。

(上海市教委)

打造特色课程群 让童心精彩绽放

□ 北京中科启元学校

一、学校基本情况

北京市中科启元学校创建于2014年,是一所依托中国科学院文化科技优势办学育人的新生命学校。北京市中科启元学校的创建完善了中国科学院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到本、硕、博高等教育的完整育人体系,重点解决科学院在京40多家科研院所中的科研人员子女对高品质教育的需求,同时全方位地面向社会服务,使科学院的优秀教育传统和优势科教资源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学校坐落在中关村腹地,四周高校林立,被中科院各大科研院所环抱。浓郁的科研氛围,深厚的文化底蕴,决定了这座中国科学院里的童心花园的高起点、高站位。近年来,学校办学成绩突出,2018年荣获京城百所特色校“引领京城教育品牌小学”称号,成为一方充满生命力的蓬勃发展的育人沃土。

学校拥有强有力的教育教学、教科研团队,现有教职员工80余人,其中一线骨干教师四十多名均来自北京市、海淀区名校以及知名高校的研究生、博士生。高级、一级教师占全校教师59%,二十多人拥有北京市紫禁杯班主任、市区级学科带头、骨干教师、班主任的荣誉称号。优秀的教师团队为启元课程的设计与研发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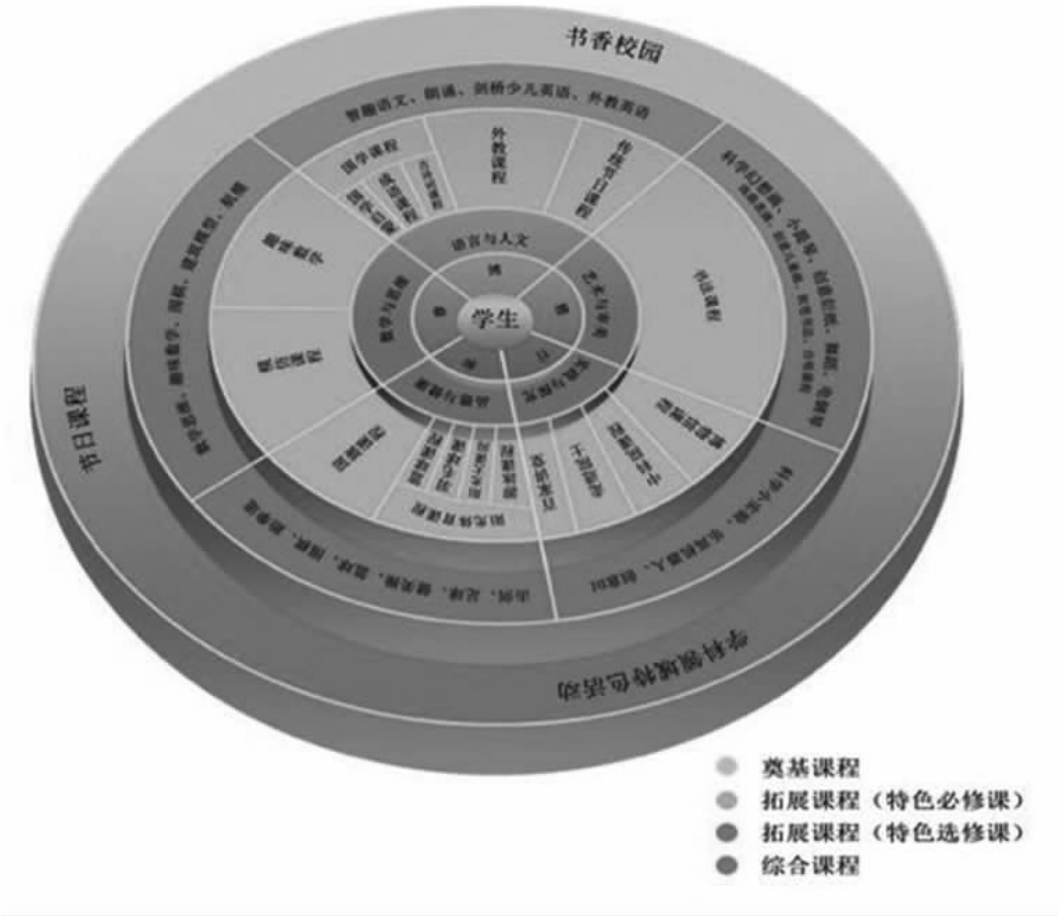
可能。

二、学校办学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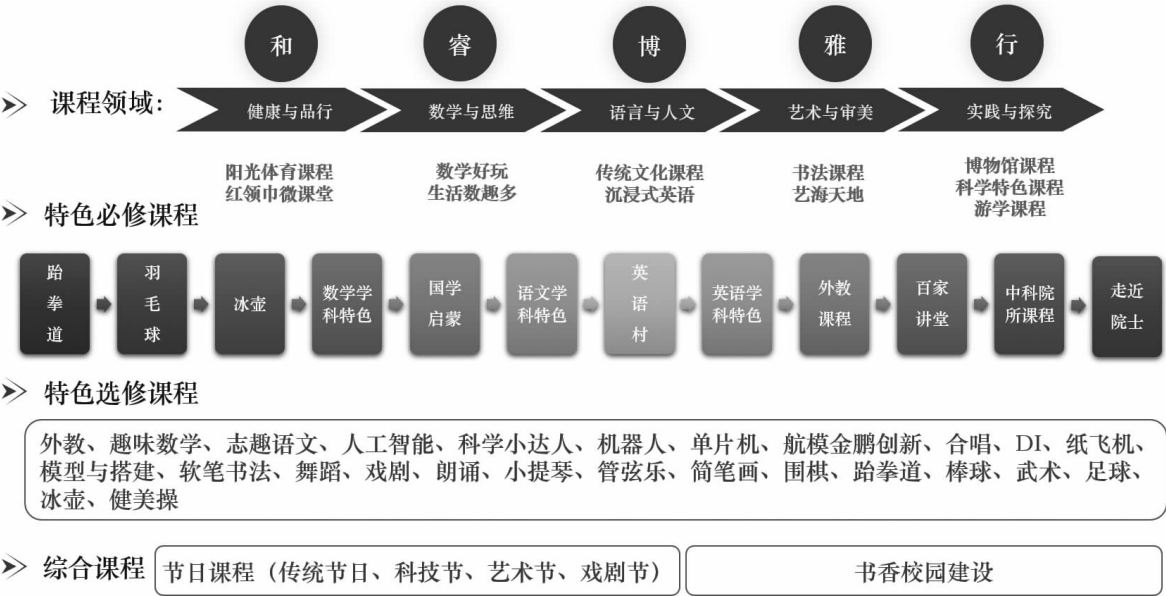
从2014年7月建校至今,6年来学校的定位和样态逐渐清晰。北京市中科启元学校始终秉持“厚德 敏学 求真 创新”的校训,坚守“一项科技特长成就孩子一生,一项体育技能强健孩子一生,一项艺术爱好陪伴孩子一生”的教育理念,坚定“精致教育,特色育人”的办学目标,落实培养具有“和、睿、博、雅、行”素养及品质的启元学子的育人目标。

基于办学理念,通过探索和研究,学校搭建了同心圆式的课程框架系统,围绕学生发展的五大素养“和、睿、博、雅、行”设置科学见长、人文凸显特色的精致课程体系,满足以科研人员子女为主体的学生群体个性发展需求。同心圆课程体系涵盖奠基课程、拓展课程(包括特色必修课程和特色选修课程)和综合课程(包括节日课程、书香校园建设以及学科领域特色活动)。三大课程层面下的多元的课程目录,为学生落实基础、兴趣发展、深度探究提供可选择的机会。

中科院乃是国家科研与科技创新重地,作为中科院子弟学校,北京市中科启元学校的使命即启迪科技创



北京市中科启元学校



新、培元固本、奠基未来。为此,我校课程体系的设置落实培养具有“和、睿、博、雅、行”品质素养的启元学子,依托多彩启元课程的构建为每一个学生插上遨游世界的有力翅膀,托举起孩子们的素养高度,让每一个孩子成长为身心健康、气质儒雅、全面发展、独具创新潜力的启元学子。

为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和多元化选择,学校积极探索科学性、系统化、成序列的特色课程群落建设。通过课程整合,目前形成了三大品牌特色课程群落,即科学实践特色课程群、传统文化特色课程群、阳光体育特色课程群。通过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培养具备适应未来社会生存和发展必备品格、关键能力的完整人。

三、基于核心素养的学校科学特色课程群的构建

科学实践特色课程群是学校的亮点课程,设置了三个梯度,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中科院大大小小的研究所及博物馆、科技馆和实践基地,都是启元学子的“流动”课堂,让每一位学子都能找到心仪的课程。

(一)全校普及课程群

1.博物馆课程

我们坚持给予孩子一个博物馆里的童年,一个遍布祖国山河大地的童年……在启元,每隔一周,孩子们都能走进身边的各大博物馆进行实地研学。走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下属的中国古动物馆,了解脊椎动物的演化历程;走进依托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国家动物博物馆,学习动物学知识,加强环境保护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意识。走进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园,从研究的角度揭秘植物的故事……孩子们走进这样的研究基地,发生深度学习,助益于核心素养的提升。

不仅如此,博物馆课程从最初一次次独立的活动,简单的参观学习,到不断寻找课程的生长点和发展根基,如今的博物馆课程打通课内外关联,以学科联动推进项目学习,将课堂上的学习和鲜活温暖的世界连接。从课堂上的学习《圆明园的毁灭》我们带领孩子走进这

座昔日的皇家园林,进行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宣讲;从学生语言实践运用出发,孩子们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走进颐和园,完成中英文小导游的挑战;在使用部编版新教材的过程中,我们以中华民族园为课堂,语言、艺术、体育多学科融合,让二年级学生在大课堂中感受、体验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每一次的博物馆课程都在课程内生点上求厚度、成系统、讲实效。

2.科研院所课程

学校充分利用中科院科学资源为孩子们开启探索世界、了解前沿科技发展的大门:走进自动化所体验人机大战,感受3D打印技术;走进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在专业讲解下探秘互联网发源地;在基因组研究所进行草莓基因的提取……目前孩子们已经走进50多家科学院所。在课程不断地推进中,为满足孩子们学习探究的欲望,学校帮助孩子们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一起组建了自己的研究团队,以小科研课题带动科学探究。

3.游学课程

游学的意义不言而喻:在行走中将所遇与所思结合,把整个世界赋予孩子是每一个启元人的追求。一年一次、几乎全员参与的游学课程,让启元将“心怀梦想启航”的小红旗插到了祖国十三省市十八家中科院的研究院,最北我们到了鸡西的兴凯湖的湿地生态研究站,最南到三亚的深海研究所,在贵州,孩子们走近中国的“天眼”——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在海南,孩子们领略了我国自主研发的万米遥控潜水器——“海角”和“天涯”的风采。在游学中,孩子们不仅丰富的是见识和学问,还切身感受了科学精神的样态,以及共处中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也是课程设计最初秉持的理念——塑造全面发展的人。

(二)特色拓展活动课程群

1.走近院士

梅贻琦校长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建校以来,中科启元的孩子们先后与36位中科院、工程院的院士们“亲密接触”,这其中包括三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倾听是学习的一种方式,但启元的孩子们想要的不止于此!于是课程的内容、形式发

生了改变:孩子们与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德国科学家埃尔文·内尔博士见面时,用无人机、单片机、机器人、科学实验等各种科技小成果表达对科学家的欢迎,还邀请诺主一起玩华容道、转魔方,在互动中感受科学精神的真正意义。

2. 启元百家讲堂

科学是有温度的。学校邀请各科学领域的拔尖人才、学术之师走进启元百家讲堂,做孩子们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还邀请在中科院工作的爸爸妈妈们走进学校,为孩子们带来开放性的课堂。家长们认可学校的发展理念,自觉自愿地投入到课程开发的行列,他们在多领域都有建树、突出贡献,就结合各自的工作领域,在每周一次两课时的实践课中,带领孩子们一起触摸科学,感受创意,一起在科学教育中快乐温暖地成长。成为课程开发者、实施者。

3. 开学第一课

学校自诞生起就带着中科院唯实求真、科学民主的文化基因,开学典礼上也显现着这种基因的印记。每学期开学的第一课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者中国科学院博士家长开讲。在今年9月1日,我们邀请了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周琪院士,他我国是“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器官重建与制造”的首席科学家,他在对祖国发展历史与新时代科技成就的娓娓道来中,对孩子们给予厚望;也邀请“深海勇士”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副总设计师杨波,为孩子们带来了开学第一课,他带学生纵观载人潜水器的历史,横观国内外深海载人潜水器的发展现状,并邀请启元学子做中国正在研发的万米潜水器的第一批体验者。这样的引领性课程不仅对学生精神世界大有裨益,也打开了孩子们更广阔的探索空间。

(三) 兴趣特长社团

学校创造条件为孩子们提供自主性、选择性的兴趣班,为发展特长提供选择点和生长点,兴趣班老师及社团负责人不仅有校内骨干教师、优质社会资源,家长们还亲自开设兴趣社团,以每周一次的固定课程满足学生的个性发展——目前学校已与中科院植物所家长合作

创办科学画社;学校与中科院自动化所家长合作创办机器人社团,打造专业科技特色团队,实现“由专业人士带专业团队”。家长和学校结为教育共同体,力发挥育人价值,共同引领孩子就本领,完善人格。这也成为中科启元课程建设上一大特色。

在众多的兴趣班及社团中,DI 社团最为出色。在新教育理念的指导下,DI 兴趣班的孩子们在市赛、国赛中屡获大奖,今年还荣获全球亚军,这是启元学校以科技特色立校,注重涵养启元学子科学素质的成果,中科启元学校历届科技节的活动,每次走进中科院研究所,无不为孩子们积淀科学的精神与创新的思维。学校历经五年多的发展,办学成绩突出,连续四年荣获京城百所特色校,2018 年获得“引领京城教育品牌小学”称号。

四、基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学校传统文化特色课程群的构建

为了让学生能够成长为身心健康、气质儒雅,具有中国印记、科学特色的世界公民,学校重视顶层设计,积极探索特色课程建设,打造品牌课程群。其中,传统文化特色课程群的构建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开发、实施。培养和美、博学、儒雅的启元学子,打造学校的文化内涵。

(一) 奠基课程

学科内融合。课堂是传统文化推广的主阵地,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必须确保一定的课堂教学时间。为此,我们根据鼓励学科间的融合,在完成国家课程的基础上,合理规划,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老师们在各学科教学中,积极找准契合点进行有机整合,渗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如语文课深挖传统文化教育主题,灵活教育形式,实施传统文化教育,学校青年教师徐鑫所作的《古对今》比赛课,获得了北京市“启航杯”新教师大赛的一等奖;音乐教学中积极渗透江南丝竹的欣赏,美术教学中渗透传统中国画派的欣赏,体育学科中渗透成语操的教学实践,品德教学中渗透传统美德的教育等。通过学科渗透,丰富学生学习内容,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感受和鉴赏能力,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和文化艺术修养,激发学生热爱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和志向。

(二)特色必修课程

1.国学课程

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利用厚重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思想熏陶,进行塑魂植根教育,以此培育举止优雅、健康高尚的儒雅学子。学校开设了专门的国学课,依据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把控课程的梯度:一年级的“国学启蒙”课程,老师们编写了国学教材,请博古通今的资深老师在课堂上具体实施。以“国学”的儒家之德、之学、之教为血肉筑魂。二、三年级设置了“成语课程”,利用晨读和国学课,带领孩子们熟悉校本教材中的《说唱背成语》内容。用一年的时间熟读成诵、知晓内涵,采撷其中精髓,这也是为“成语大赛”做着充分的准备。四到六年级的启元学子携手走进“古诗词课程”,在古诗词中品读各色人生,含英咀华,修身养性。

2.书法课程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校结合母语教育,从诵读和写字两方面入手,力图在文化和审美方面给孩子恒久的熏陶。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李中华教授和舒同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振先生主编的《经典诵读与书写》走进我们的课堂,舒同文化艺术研究院的王冬梅老师亲自执教我们的书法课堂,从汉字的审美角度展开教学。低年级以部编版同步书写教材为依托学习硬笔,中高年级学习软笔。从字的占格、笔画特点及搭配、结构安排等方面提出如“字如其人,首先中正”“格有十分,字写七分”等审美理念。为了进一步实现“书法育人”的愿景,我们一直用多种方式启发学生。书法家庞中华老师给孩子们上了一节生动的书法课——顶天立地学做人。他细致地讲解“人”字的演变以及一撇一捺的含义,期望启元学子“做堂堂正正中国人,写漂漂亮亮中国字”。

3.阅读课程

每周设置阅读课,由老师带领开展经典文化阅读,学生根据不同学段开展四大名著的整本书研读活动。特色活动让学生在书香气氛、科学气息、体验参与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体验传统文化之美,突破语文课

上阅读学习的界限,建立起“大语文”的学习环境,提高学生观察、分析、口语交际等多方面能力,大大有利于增强学生文化底蕴,提升学生语文素养。同时还利用早读时间实施“亲近古诗文”经典工程,虽然所涉及的仅仅是一小部分文学经典,还远远不是经典文化的全部,但培育了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增加了学生在传统经典文化方面的积累和精神积淀。实验验收阶段,进行活动竞赛,甚至走出学校,走进海淀区参与各项比赛。

(三)特色选修课程

各类课程在课堂普及教学、活动参与和学科渗透的基础上,对学有余力,有兴趣爱好的同学,通过参加社团进行提高。我们以个性发展、特长培养为目标,采取自主选修的方式,成立各类社团,对学生进行传统技艺课程的拔尖培养。喜爱经典诵读的同学,参加吟诵社团,学习吟诵方法;喜欢书法的同学参加书法社团,进行书法的鉴赏和学习等,通过具有选择性的课程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传承这些传统文化技艺,养根修性,提高学生审美水平。

(四)综合课程

重视体验和实践,引导中小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内化。重视实践或体验活动的设计,以便引导学生在此基础上形成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同。我们将学生的体验和实践也视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实施原则之一。学生只有通过现实生活中的情境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的要害及内涵,才可能对其形成认同,乃至将之内化为自己的知识系统的一部分,只有达到这一认知层次,才能说传统文化教育是成功的。具体课程设计如下:

1.节日课程

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集中表现,节日能让人们认识、记忆、强化某些对人和来说重要的文化和理念,有重要的文化和教育价值。传统节日文化内容丰富,包括有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戏剧文化等等,这些都通过节日活动表现出来,鼓励小学生积极参与这些活动,享受节日文化的熏陶。学校以五大传统节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

和重阳节)为重点,根据不同的节日,采取不同的形式来庆祝传统节日,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特色活动。学校提供场所和机会,小学生还根据自己的优势进行戏剧表演、手工艺制,比如中秋节时学生通过海报宣传,吸引大家参与中秋文化戏剧表演的舞台,通过点赞的方式为传统剧目进行投票,爱好手工制作的小学生可以参加做月饼等特色美食的操作活动;再比如元宵节的猜灯谜是一种文字游戏,它既能提高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增长智力,又能丰富人的知识。这些健康有趣的庆祝活动既能开阔儿童的眼界,使人积累知识,又能从中吸收大量文化艺术,充实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2.游学课程

文化主题研学课程落实学生“雅”的品质。本课程为增加学生对祖国风土人情的认识,积淀传统文化底蕴,理解传统文化精髓,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积极主动地承担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以培养学生审美“雅趣”为最终目标。学校推倒“围墙”,将整个世界赋予孩子是启元学校的执着追求,让孩子走出去,用小脚丫丈量祖国的壮美山河,亲身体验文化的厚重。游学的场地有博

物馆、特色古典园林、建筑名胜、古村落、传统工艺作坊等。走进这些地方对其设计细节与相应理念进行深入、细微的观赏和体会,形成一种切身的认知和认同,激发起心中的热爱,成为伴随一生发展的“雅趣”这远远超过书面材料阅读的粗浅感知。“少年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学生只有通过现实生活的情境中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的要素及内涵,才可能将之内化为自己的志趣系统的一部分,并最终外化为一以贯之的高雅行动力。

游学的场地有博物馆、特色古典园林、建筑名胜、古村落、传统工艺作坊等。学生通过现实生活的情境中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的要素及内涵,对其形成认同,乃至将之内化为自己的知识系统的一部分,只有达到这一认知层次,才能说传统文化教育是成功的。传统文化研学分为京内和京外两条路线。

(1)京内传统文化研学

在每两周一次的博物馆课程中,京内传统文化研学课程是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开发十个站点(见表1),通过体验式学习,引导学生在名胜古迹和历史文物中感受广博的中华文化,及早播下民族文化的种子。

表1 中科启元学校京内传统文化研学旅行线路及内容设计

序号	课程板块	课程内容
1	走进颐和园	体验式学习,担当小导游,游览亭台楼阁,讲解风景名胜,做皇家园林的文化传播者。
2	走进圆明园	体验式学习,担当小导游,了解并介绍皇家园林的历史、文物和建筑。召开中队会,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强国奋进。
3	中国国家博物馆	带着对历史文化的尊重感走进博物馆,与古老的陈列、人物、故事邂逅,将对美与文明的热爱播种在心底最深处。
4	首都博物馆	通过馆藏文物了解首都的历史文化,了解古代京津冀人们的生活状态。
5	中华民族博物院	了解、体验中华民族文化;担当小小讲解员,做民族文化的传播者;
6	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	了解瑰丽的民族文化,感受“各民族,情谊浓,齐奋发,共繁荣”的多彩神州文化。
7	神玉博物馆	置身神玉艺术馆欣赏了令人目不暇接的藏品,精美绝伦的美玉,还感受到历史沧桑和厚重的中华玉文化。
8	清华艺术博物馆	欣赏艺术博物馆现书画、织绣、陶瓷、建筑、青铜器等藏品,博众家之长,传中华文化,在艺术的殿堂里,求索创新。
9	藏族博物馆	了解藏族传统建筑特点,了解藏族历史、文化艺术、民俗文化。

(2)京外传统文化研学

一年一次、1-6 年级全员参与的研学课程少不了传统文化路线,自第一次开展研学旅行活动至今,已推出 11 条传统文化研学路线,学生可以游苏州线品江南文化,探长沙线体潇湘文化,寻安徽线悟徽州文化,踪西安线访汉唐文化,走山西线探晋商文化……传统文化研学课程让学生背起行囊走出校门,亲近祖国风景名胜古迹,体会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例如:一、走进陕西西安,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感受灿烂辉煌的大唐风采。二、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院,了解大秦帝国强大的军事文化,感受我国雕塑艺术的辉煌及秦一统天下的骁勇;走进兵马俑复制工厂,体验兵马俑彩绘,并将成品带走留作纪念。三、参观我国古代书法艺术宝库碑林博物馆,了解汉至清朝的各种书法字体及当时朝代的社会历史;向专业书法老师学习书法的演变以及 5 种笔体,现场书写。四、打卡西安知名大雁塔,与伙伴们 PK 诵读唐诗《飞花令》。五、参观中国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城墙——西安明城墙,了解古代城防体系,俯瞰千年皇城

的辉煌历史;现场学习最早的吹奏乐器——陶埙,体验“一曲陶埙,回荡古城”。

3.文化活动

活动是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为发挥活动育人的功能,我校精心策划,组织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推进传统文化校本课程实施。针对国学课程,学校组织了新年诵诗会吟诵表演、古诗擂台赛等活动,展示经典诵读学习成果。针对学科融合,开展了“汉字大赛”、“成语操大赛”“课本剧表演大赛”等系列主题活动等,让学生在活动中主动践行,将学到的知识外化于行为习惯之中。与此同时还组织了传统技艺大比拼活动,开展各类主题征联活动、新年送福活动、书法等各类比赛,以赛促练,以赛促提高。通过各类活动,引导学生将学到的各类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了学生对传统文化校本课程的学习、消化和吸收。

在特色课程群落的具体实施中,多维度、浸润式、可持续地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是北京市中科启元学校课程育人的最终目标。在特色课程群落的搭建与实践过程中,学校实现了可持续、更新更好地发展。

北京市教委:学校不得利用晨检开展学科教学

教育部日前发布“睡眠令”,要求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市教委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要求:学校不得利用晨检时间开展学科教学。

市教委表示,各区教委要按照教育部要求制定合理作息时间表,特别要兼顾寄宿制学校、义务教育九年制学校以及基础教育十二年制学校的实际情况,根据实际在本学年内落实好有关规定。学校不得利用晨检时间开展学科教学,不得要求学生提前到校参加统一的教育教学活动。对于个别因家庭特殊情况提前到校的学生,学校应提前开门、妥善安置。学校要加快建立作业统筹管理机制,做到各学科作业公开,师生人人可见,总量控制;不得布置机械重复、惩罚性作业。同时统筹做好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确保小学生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中学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

市教委要求家校协同保障学生睡眠。区教委要通过家长学校、家长会等途径普及科学睡眠知识,宣传充足睡眠对于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性。各校要通过增强校内教育供给消除家长的焦虑和顾虑,形成家校合力,共同保证每天小学生 10 小时、初中生 9 小时、高中生 8 小时的睡眠时间。此外,市教委还明确各区要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和监管,线上线下培训时间不得与当地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突。线上直播类培训活动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 时,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 时 30 分,均不得以课前预习、课后巩固、作业练习、微信群打卡等任何形式布置作业,严禁组织举办中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竞赛及进行排名。

(北京日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增强教育投资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报告《教育和培训:尚未成为国家财政支持优先项》,倡导扩大对教育和培训的拨款。因为投资于学习就是投资于一个强大、可持续的未来。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教育造成了巨大影响,扰乱了世界各地从学前教育到大学的学习。尽管教育在经济复苏和转型方面具有明显作用,从师生到家长的学校生态系统对社区和整个社会的也举足轻重,但是,教育和培训部门在政府应对危机的财政措施中却很少受到重视。根据各国政府(2021年2月和3月)的调查答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全球新冠疫情刺激方案资金中只有2%用于教育。相当多的受调查国家(41%)在其财政应对措施中没有向教育划拨任何资金。在这些国家中,大多数是高收入经济体。教育投资总额的93%(2800亿美元中的2640亿美元)发生在这些富裕国家,这些国家从其一揽子计划中为每个学生分配的教育资金要多得多。

这种筹资方面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各国之间现有的教育不平等。因此,低收入国家的教育系统更有可能对其子女和青年的教育产生更广泛和更深的影

响,而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人口红利的产生,并最终产生支持经济早期复苏和可持续转型所需的人力资本。

一些国家可以利用刺激资金的支出,创新更高层次的教育,使混合教育等学习平台和模式多样化。其他资源有限以及存在竞争性优先事项的国家,则可以只专注于基本的应对措施,如学校卫生和初等教育。例如,韩国部署了额外资金,以进一步改善数字基础设施,开发KMOOC或韩国开放在线课程,并为每个学生提供远程学习补贴。科特迪瓦将其支出用于通过电视实施远程学习方案,并向最弱势的学生提供家庭成套用品,如水电账单和女孩卫生用品包。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社会和经济将发生重大变革,教育和培训部门将再次被要求应对这些新的现实。教育必须成为新冠疫情恢复规划和筹资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以便切实促进形成具有复原力、响应能力和包容性的社会和经济。

(编译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 2021-4-16;
编译者: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王冠男)

经合组织呼吁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建设

经合组织指出,自动化、数字化、绿色转型和人口老龄化等趋势正在给全球劳动力市场带来结构性变化,这

些变化影响着技能需求和供给。职业教育和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在使年轻人为工作

做好准备、发展技能以及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VET的教师和领导者可以对学习者的技能、就业能力和职业发展产生直接而积极的影响,但有关吸引、培训和留住VET教师和领导人的有效政策和做法的信息有限。因此,经合组织近日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教师和领导》(Teachers and Leader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中填补了职业教育与培训教师和领导者的知识空白,评估职业教育教师和领导在技能需求变化时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机遇,并提供国际良好实践范例和政策指南,以确保教师和领导能够提供高质量的职业教育。

教师和领导是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核心。教师是“双重职业”,他们既需要教育和行业知识,又需要为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领导在VET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培养和支持教师,到参与多方利益相关者,通过资源配置和提供教学指导来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然而,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VET教师短缺现象严重。英格兰(英国)一半的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美国一半的州校长以及丹麦、葡萄牙和土耳其三分之一的职业教

育考试校长报告了教师短缺。据估计,VET教师的供应量占德国需求量的80%,韩国为70%,瑞典为44%。此外,由于缺乏支持或激励,职业教育教师在接受培训时常常面临障碍,并且与他们的工作安排相冲突。同样,VET领导面临的复杂责任并不总是与其获得的支持机会相匹配。

面对这些挑战,经合组织针对加强VET的教师和领导提出了四条主要建议。第一,确保VET师资充足。增加VET教学的吸引力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业。第二,有效培养和发展VET师资。初级教师教育和培训方案应发展未来职业教育和培训教师的教学技能,同时发展他们的基本技能、数字技能和软技能,以及劳动力市场所需的职业技能和知识。第三,促进VET教学方法的创新。为鼓励有效利用创新的教学方法,各国还应向职业教育培训教师提供战略指导和体制支持。第四,加强VET领导。VET机构必须了解职业教育部门和劳动力市场,同时具备改进教学所需的组织和教学领导技能。

(编译自:经合组织网站,2021-03-31;编译者: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王梦洁)

日本职业教育多层次多类型注重产学结合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日本已建成较为成熟完善、法规健全的现代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系统化、产学互动融合等鲜明特色,社会对职业教育认可度和接受度高。

据统计,日本只有不到一半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报名参加“高考”。2020年的报考率只有约43%,其中报考率最高的是东京,为55.2%;最低的是冲绳,为29.1%。

如此众多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参加“高考”,并非

因考大学这条路难走,实际情况是在日本上大学很容易,而且少子化还造成很多大学面临生源减少的严峻问题。因此,不参加高考是部分日本高中生的主动选择,他们选择高中毕业后接受职业教育或者直接就业。

日本现代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主要包括两大基本系统和三大基本部分。两大基本系统是指学校系统内部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学校系统外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三大基本部分是指学校内的职业技术教育、企业内教育与培训

以及公共职业训练。其中学校系统内的职业技术教育归属文部科学省管理,企业内职业技术教育以及公共职业训练由厚生劳动省管理。

日本的职业教育学校类型主要包括专业高中(日语称“专门高校”)、专修培训学校、职业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短期大学、专门职大学院等,学制一般2至5年不等。专门职大学院可以颁发专业职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义务教育阶段之后,专修学校、短期大学等职业教育机构绝大多数为企业公司办学,面向市场需求和劳动者就业需求,灵活机动,目标精专。以东京的专修学校为例,主要类型有保育、护理、法律、会计、外语、商务、齿科、美术、美容、制果(糕点制作)等。除了少数教育集团有多项教育内容外,大部分专修学校都是单一类型。

由于日本服务业较为发达,因此绝大部分专修学校的教学内容都是上述第三产业,培训实业人才的专修学校并不太多。为了培养企业人才,一些企业开展企业内的职业技术教育,作为日本学校系统职业技术教育之外最有益的补充,也是日本实体经济发展的才保证之一。

日本是一个各行各业都需要资格认证的国家,很多行业都需要从业者持相应的资格证书,例如安装厨房设备需要考取厨房设备士的资格等,因此选择职业教育获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对于就业是相对有利的。

在日本,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和就业需求衔接较好,职业教育的课程根据社会需求每年都进行调整,而且一些一线岗位的职员也到职业教育机构兼职教学,教授的知识技能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来源:新华网)

印度建立“高等教育委员会”凝聚发展合力

印度内阁于2020年7月批准了《国家教育政策2020》(NEP,以下简称《政策》),提出2021年将对印度现有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2021年设立新的印度“高等教育委员会”(HECI,以下简称“高教委员会”),作为印度政府之外的普通高等教育统筹协调机构。

新机构改革的背景

印度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较为复杂,主要体现为政府与非政府机构之间的协同管理。

印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由中央政府和邦一级政府构成。印度高等教育的中央管理机构是教育部(原人力资源发展部,1985-2020)的高等教育司,负责全印普通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和统筹规划。除中央政府外,

各邦政府负责邦内的高等教育相关事务,并专设管理机构,一般通过建立学校、拨款或立法等形式进行管理。

在印度高等教育非政府治理体系中,于1956年成立的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UGC)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主要具有拨款职能外,还承担着拨款资格审查、校际沟通协调、办学标准研制等职能。印度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规划、指导与管理,主要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具体实施。

然而,印度高等教育领域各类组织机构众多,难以形成合力。印度政府意识到,只有进行彻底的改革,终止管理分散的现状,加强教育政策的执行力,才能保证高等教育发展。原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2018年宣布,将通过废除法的形式撤销大学拨款委员会,建议成立高教

委员会。《政策》也进一步明确建议将高教委员会作为普通高等教育的总体负责机构。去年12月,据一位印度政府高级官员证实,高教委员会将在“下个学年”成立,从而取代大学拨款委员会和全印技术教育委员会等自治机构。

新机构的组成与职责

印度教育部部长波赫里亚尔曾表示,设立新的高教委员会,“目标是包容各方,为所有人提供机会,并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环境中促进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全面增长”。根据《印度高等教育委员会法案草案(2018)》,高教委员会将由14名成员组成,除主席和副主席外,12名委员中有3名来自中央政府教育相关部门的官员,而所有委员的推荐是由包括内阁秘书长在内的5人遴选委员会进行推荐,最终由联邦内阁任命。同时,将新设一个“咨询委员会”,由教育部部长(原人力资源发展部部长)担任咨询委员会主席,负责向高教委员会提供关于协调各级政府和制定教育标准等意见,高教委员会负责落实。总的来说,高教委员会的成员组成体现了政府干预力的增强。

在职能方面,新委员会除须确保和维持高等教育的学术水平、落实高等院校自主权外,还进一步增加并细化了部分职能,比如明确学生必须取得的学习成果、制定教学及研究评估标准、对高等院校进行年度评估及资格认证、开办首次学术活动的审批权、撤销违规高校的办学许可等。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草案仅明确了新委员会的学术

管理职能,未提及新委员会是否具有拨款职能。

充满争议的改革之路

可以想见,以一个新机构取代运行达65年、举足轻重的全国性自治机构,必然会引起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在法案草案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中,印度学界和部分教师、学生组织表达了较为强烈的反对意见。

大学拨款委员会前主席索拉特认为:“法律草案虽承认自治的重要性,但这里自治应指高校自治,而非委员会自治。”德里大学教师协会(DUTA)表示,高教委员会的设立将导致政府直接干预的加强。该协会主席拉伊指出,对高校的年度评估会导致过度监管,如果允许高教委员会进行过度细致的微观管理,就很难实现草案中促进高校自主权的宗旨。全印度学生协会(AISA)则指出,拨款权没有明确授予高教委员会,若将来政府完全控制发放资金的权力,则会导致对高校政治控制的加强。有印度学者提出,若经费投入不足,会导致私立院校通过随意增设课程并提高学费的方式筹集资金,来自落后地区、贫困家庭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学生将更难接受到高等教育。

从以上可以看出,印度学界和部分学生、教师组织质疑的核心,是对高等教育机构丧失自主权的担忧。未来的高教委员会如何应对和解决这一问题,是其成立后面临的首要挑战。

(作者杨瑞系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印地语教师;来源:《中国教育报》2021年04月01日第9版)

俄罗斯加强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

高校和企业之间的良好合作对于整合研究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对

高等教育机构的创新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将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确定为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径。今年启动的“学术领导者计划”着重强调,“要加强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企业特别是高科技公司的合作,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和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近日,俄罗斯召开了“全俄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会议。此次会议由俄罗斯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高级创新研究中心主办,莫斯科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承办,俄罗斯国内 60 多所顶尖高校和 150 多家科技企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莫斯科创新企业集群、时代军事创新技术城、茹科夫斯基科学城、托木斯克创新发展中心、斯科尔科沃技术园、托木斯克国立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中心等成功的校企合作性组织的代表分别介绍了近年来取得的成果和创新发展的经验。除此之外,与会

代表们还就技术转让、专利许可、高校支持小型创新企业以及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

俄罗斯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高级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瓦迪姆·梅德韦杰夫(Вадим Медведев)表示:“这场疫情已经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面临的现实挑战,我们未来的任务就是要加强知识共享,打造创新生态,使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编译自:俄罗斯科学与高等教育部网站,2021-3-12;编译者: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范永胜)

印尼职业教育受公众欢迎

近日,印尼教育和文化部与 MarkPlus 公司合作开展有关“职业教育公共利益调查”的研究,结果反应印尼公众对职业教育兴趣很高。

此项调查初衷是为了解准学生与家长对于职业高中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的兴趣,涉及受访者 890 人,其中包括 390 名调查内容为职业高中教育的受访者和 500 名职业高等教育的受访者。这些来自中小学的学生与家长表达对于职业高中教育的看法,而来自职业高中的学生与家长则表达他们对与职业高等教育的看法。

根据调查显示,多达 82.05% 的印尼受访者表现出对继续接受职业高中教育兴趣盎然,有 78.6% 受访者表示对继续接受职业高等教育感兴趣。受访者表示对职业高中感兴趣的原因是其良好的工作前景和广泛的专业选择。同时,对职业高等教育感兴趣的原因除了良好的

工作前景外,还有学习时间短以及毕业后能立即工作的影响。

印尼教育和文化部官员表示,此研究呈现出非常有趣的结果,而这一结果正是教育和文化部,特别是职业教育总局,继续推进印尼职业教育的动力来源。学校校长、教师以及教育主管部门都应该关注并思考。

近年来,印尼的教育一直致力于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职业高中和高等职业教育是公众继续接受教育的选择。这项调查有望成为教育界,特别是职业高等教育界的催化剂,以继续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扩大职业教育影响。

(编译自:印尼教育和文化部网站,2021-4-12;编译者: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张亦弛)

教育部:免试就近入学等规定同样适用于民办学校

本刊讯 新华网北京4月28日消息 近日,教育部在回应网友咨询《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相关问题时表示,该指导意见中的“幼小”包括民办小学和幼儿园。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

育质量的意见》(中发〔2019〕26号),强调“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等作为招生依据,不得以面试、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这些要求适用于公办和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领导调研校外培训机构

本刊讯 中民协消息 近期,国家对校外培训教育治理进行了一系列部署,一些地方围绕校外培训机构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措施。为深入了解有关措施的具体进展、实际执行情况,以及对校外培训机构所产生的各方面影响,探讨校外培训机构未来发展之路,在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总目标下,治理乱象,规范办学,依法维权,以更好地推动校外培训教育行业健康发展,促进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组成调研组先后前往好未来、爱学习、新东方教育集团开展调研。

在调研过程中,调研组与培训机构的主要创始人、管理运营者等进行了深入交流,一方面对校外培训教育治理的必要性形成共识,另一方面也对当前部分地区的一些治理措施提出建议。培训机构希望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能够制定更为明确、清晰的治理规范与治理标准,让校外培训机构对政策环境变化有一个相对稳定的

预期与把握,从而为机构和行业发展营造更为健康的法治环境,避免有些政策“一刀切”或不清晰而引发其他一系列问题。

通过此次调研,调研组对校外培训机构在发展过程中遵循个性化育人理念不断改革、创新,在教育教学产品研发、教育教学方法探索等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有了更好的体验,对一些培训机构如何利用科技与资源优势,通过在线教育、双师课堂等方式将优质教育教学资源辐射到中西部地区甚至免费输送到资源相对落后地区的实践有了更多的了解。

调研组认为,要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定位进行科学、理性思考,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价值和贡献要客观判断,尤其要对校外培训机构满足个性化教育需求、推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要予以认可。形成校外培训乱象的原因,既有考试招生、商业逐利的驱动,也

有教学督导、市场监管的缺位。在加强治理规范的同时,如何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与校内学校教育协同发展,发挥校外培训机构对推动公办学校教育改革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在发展终身学习的优势和作用,是今后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此前,协会已经通过座谈、走访等形式听取了部分线上新型机构、中小培训机构等校外培训机构意见、建议。下一步,协会将在继续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调研基础上,扩大调研范围,广泛听取家长、学生、中小学教师、专家学者、社会人士等意见,形成有关校外培训机构治

理的咨询报告,以充分发挥协会桥梁纽带作用、行业发展引导作用、自律监督作用,为切实减轻中小學生及家庭负担、促进校外培训业健康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据了解,此次调研,由全国人大原常委、副秘书长、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总顾问李连宁带队,全国人大教科文卫教育室原主任、国家督学、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委会理事长叶齐炼、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秘书长贾伟和副秘书长丁秀棠、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委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王文博等同志参加相关调研活动。

上海打造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学前教育基本格局

本刊讯 解放日报消息 上海民心工程之一“学龄前儿童善育工程”,正不断加速升级,打造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基本格局。本市率先发布的《上海市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明确,三年内,全市至少新增150个普惠性托育点,到2022年,全市街镇普惠性托育点覆盖率不低于85%,托幼一体园所在公民办幼儿园总量中占比不低于50%,为有需求的婴幼儿家庭服务。

每个幼儿建个性化档案

走进静安区延长路东部幼儿园,仿佛置身于一个草坪动物园。起伏的草坪,熊猫、树袋熊等各种动物玩偶“徜徉”;树桩下设有小梯子,托班宝宝可以攀爬,还能拿起放大镜,探究植物的根系和树根边的蚂蚁,孩子们在户外也可以玩“过家家”游戏……草坪一边有风车、小桥、流水,宝宝们感受着春天的气息。蹦床区上,“小不点”玩起弹跳游戏;涂鸦区里,墙上、桌子上,哪怕地面上,都可以让“小画家”创意无限;体育场里还有一条可以攀爬的“长龙”,从小锻炼孩子们的胆量。

托班课程不是幼儿园小中大班的翻版。延长路东部幼儿园是一所公办一级幼儿园,静安区早期教育指导研究中心也设在园内。从每个托班宝宝入园起,就有一份不一样的观察表。面对初入园的分离焦虑,幼儿园开展“渐进式陪伴课程”,从初入园第一次哭声的背后展开研究。从幼儿入园、在园活动,到吃点心、用餐、运动,托班宝宝初入园两周里,幼儿园向家长打开大门,家长可以入园参与陪伴幼儿每天半日活动,在全开放全透明的过程中,家长不仅是陪伴者,也是观察者,让幼儿与家长、教师之间建立一种持续、温暖的情感依恋,营造具有安全感的心理环境。托班幼儿年龄越小,个体差异越大,针对这一特点,托班老师为每个幼儿建立一份个性化的成长档案,跟踪孩子的每个关键期。

“双证”上岗基本功扎实

换尿不湿、冲奶粉……这些基本功,是延长路东部幼儿园每一位托班教师都必须掌握的。“托班幼儿年龄越小,对教师的要求越高。”延长路东部幼儿园园长林丽说,幼儿园要求教师持教师资格证和育婴师资格证“双

证”上岗,新入职的教师均从托班带起,由一位经验型教师带教,积累了托班带班经验后,有助于更好地胜任其他年龄段的带班。幼儿园还安排教师在托、小、中、大四个年龄段均有执教经验,四年为一周期。

“旋转木马餐厅”搬进幼儿园,拍拍“互动音乐墙”,好听的音乐洋溢着,在“宝贝统感活动区”,不仅有感应灯光,走楼梯时灯也会发光,在乐高创意活动室,孩子们更是创意无限……这是黄浦区荷花池幼儿园创设的“小荷之家”,为托班幼儿营造了舒适、安静和快乐的氛围,凸显“家”的温馨和亲切。

荷花池幼儿园为每一位托班孩子建立了“宝贝成长档案”,制作“宝宝日记”,对托班婴幼儿进行一日活动各个环节的观察、记录与分析,托班以亲为先,以情为主,满足婴幼儿的成长需求,关注每一位孩子。荷花池幼儿园特级园长宋青说,幼儿园针对托班幼儿的年龄特点,配备“三教一保”,即3名带班教师、1名保育员。每班4名保教工作人员,教师均具备学前教育本科及以上学历,保育员具有中级及以上保育员资格证书和育婴师证书,这些专业人员为托班的保教实践提供了高质量的保障。

成熟活动案例辐射周边社区

上海建立起“1+16+N”的婴幼儿早期教养指导服

务体系,16个区900多个早教指导站覆盖所有街镇,为婴幼儿家庭提供免费、就近、实用的科学育儿指导,“育儿加油站”“亲子嘉年华”“育儿周周看”和“育之有道”App等公益免费的指导服务,提供高质量的个性化家庭育儿指导。

静安区早期教育指导研究中心承载着服务于全区0-3岁散居婴幼儿家庭的科学育儿指导功能。通过每年6次的科学育儿指导,教家长学会读懂幼儿的行为。中心还下设36个早教点,开设了“小静专线”在线解答,以视频、直播、案例故事、专家讲座等指导家长科学育儿。

“托班成熟的活动案例还辐射周边社区,每年至少6次的免费科学育儿指导活动以线下和线上的方式向社区散居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开放,开展家庭育儿指导、早期阅读指导、婴幼儿亲子游戏指导等诸多活动。幼儿园微信公众号上设有亲子游戏、育儿宝典、视频展示等专栏,将科学育儿指导点优质资源辐射到社区,为更多家长服务。”在浦东新区高行镇天虹幼儿园园长茅琴美看来,2-3岁的幼儿大部分散居在家庭中,以家庭养育为主,需要家长给予更多的呵护陪伴与情感依恋。幼儿园通过科学育儿指导活动同步辐射区域内更多0-3岁散居婴幼儿家庭的科学育儿需求。

陕西四部门规范幼儿园收费

本刊讯 中国教育报消息 日前,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幼儿园收费管理细则,规范全省各类幼儿园及小学附设学前班、幼儿班的收费行为。

通知提出,学前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幼儿园可向入园幼儿收取保育教育费、住宿费,住宿费是指幼儿园

向在园过夜住宿的幼儿提供住宿服务(不含午休)而收取的费用。幼儿园收费实行属地分类管理。公办园收取的保教费、住宿费实行政府定价;民办园的保教费、住宿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实行等级管理的公办园,不同等级的保教费标准可有所不同,但在同一县(市、区)域内相同等级的幼儿园保教费标准应统一。

通知明确,幼儿园为在园幼儿教育、生活提供方便可收取的服务性收费为伙食费(含餐点)一项;可收取的代收费包括体检费、保险费两项。服务性收费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伙食费(含餐点)专款专用,标准由幼儿园按照保本原则核定。代收费不得加收任何服务费用。除以上收费

外,幼儿园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

通知要求,公办园在寒、暑假期间向幼儿开放的,保教费、住宿费可在规定标准基础上上浮,上浮幅度最高不超过 30%。幼儿园不得跨学期预收保教费,未开学不得提前收取保教费。

重庆市集中整治校外培训机构

本刊讯 新京报消息 4月26日,记者从重庆市教委获悉,《重庆市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集中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已于日前印发。

根据《方案》,重庆将对现有的中小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严格复核和集中年检。坚决查处无证无照、超许可事项违法违规开展教育培训、未按照市场监管部门核定的登记事项从事经营活动等行为。同时,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举办中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竞赛及排名,坚决查处将参加校外培训以及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

在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方面,《方案》称,重庆将推广中小学生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规范校外培训

机构合同行为,化解校外培训合同纠纷。同时,加强教育培训广告宣传监管,查处虚假广告、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

另外,《方案》明确了对违法违规的培训机构、学校、教师惩治措施。对违法违规开展教育培训的机构依法严肃处理直至取缔关停;对与中小学校勾连组织招生入学、聘用在职教师开展培训的培训机构一律依法吊销办学许可证;对与校外培训机构勾连组织招生入学的学校将严肃处分学校及学校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人;对在职教师举办培训机构或者参与校外培训行为,一经查实,给予撤销教师资格直至解除聘用合同、开除公职处理,对负有重大失察责任的学校领导干部追责。

浙江金华课后托管成“最受欢迎的教育民生实事”

本刊讯 中国教育报消息 2019年起,浙江金华全面推行小学放学后校内托管服务改革,正式实施学生开

心、家长放心、教师用心的“三心”工程。截至目前,金华市 392 所小学全部开展托管服务,惠及学生 31.6 万余

名。参与托管服务教职工 1.9 万名,占总数的 91.3%。金华小学放学后校内托管服务被群众称赞为“最受欢迎的教育民生实事”。

合唱团、趣味课……

课后托管有社团

“注意你们的气息,情绪要饱满……”在金华市金东区曙光小学,音乐教师宋甜每天下午都会带着施光南少儿合唱团 60 多个孩子,排练参赛节目,训练合唱技巧。目前这支合唱曲目《飞向蓝天》已经练了近半年,不久将参加金华市少儿合唱比赛。

课后托管教什么?此前多数学校提供集中看管照顾和单一的作业辅导。“课后托管不能只是做作业、补课,还得给学生更多的学习和实践空间。”金华市教育局长楼伟民说。

金华各校探索“1+X”托管服务模式,即除了作业辅导外,还会开设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课程,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跨年级、跨班级自主申请。

曙光小学开出了球类、武术、婺剧等 56 个课外托管项目,由学生自由选择、走班上课,托管学生参与率达 98%。90 分钟托管有一节课是作业时间,其余则是学生兴趣爱好的培养。校长张根兵表示,现在学生基本不带书面作业回家,晚上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

红湖路小学每周一为无作业日,学生们在课后托管参加“一班一品”多样化课程,每周二到周五可以交叉选择兴趣类托管课。去年疫情期间的超长寒假,老师们还为 7 名没有大人照看的学生提供线上托管服务,深受学生欢迎。

截至目前,金华全市共开设趣味性课程 320 余门。除了这些常规配置,该市还结合各类主题教育进行个性化的托管“定制”。比如按照“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创建工作要求,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运动菜单”,在托管时间段让学生走出教室,引导孩子科学用眼、科学学习、科学运动。结合劳动教育整体部署,开设了“种一赏一收一品”系列校本劳动课程,邀请行业专家进校园兼任指导老师。

解拥堵、惠大众……

托管服务重民生

开展托管服务主要为解决家长“接送难”的问题,如何做得让家长更放心?

金华市鼓励学校在托管时间不早于当地机关、企事业单位下班时间的前提下,实行弹性离校制度,分批设定托管服务时间,缓解校园周边交通拥堵问题。例如,婺城区红湖路小学针对家长因特殊原因未能准时接送学生的情况,将托管时间延长至下午 6 点等。

在校内托管服务收费方面,金华市坚持成本补偿和非营利性,确定全市生均收费标准为 500-600 元/学期,困难家庭学生免交托管费用。2020 年以来,自愿报名参加托管的学生人数大幅增长,人数占比由 2019 年的 53.6% 提升至 2020 年的 83.4%,全市从校外辅导机构“回流”学生近 12 万名。

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还在管理端下足了功夫,同步搭建网上报名平台,开设托管服务报名专栏,各校托管项目实现在线查询、在线申报、在线分班,变“家长跑”为“数据跑”,所有信息向社会公示。

此外,出台“七个严禁”,即严禁强制学生参加,严禁拒绝有困难学生参加,严禁开展学科集中教学,严禁收取成本分担以外费用,严禁校外培训机构参与等。仅去年一年,金华就开展专项督查 42 次,发现并整改问题 21 个。

“党建+”“微心愿”……

托管师资有保障

在保障课后托管师资方面,金华教育部门和学校建立党员示范引领、待遇提升保障、特色多元参与等三大机制,引导教师从“要求干”到“主动干”转变。如孝顺小学,44 名党员教师全员参与课后托管服务。先由党员教师申报特长,依据各自优势开设相应的特色项目,足球、排球、健美操、声乐、国画等特色班纷纷开设。

目前,金华已将放学后托管服务纳入中小学“党建+”特色服务项目,成立特色服务工作室,组织党员骨干教师参与托管服务,2020 年累计开展特色服务活动 2100 余场次,有力保障了课后托管服务工作的开展。

婺城区虹路小学面向托管教师开展“微心愿”活动,

老师有什么困难或心愿,可以向学校提出来。体育教师陈斌参加托管结束,还要晚上加班赶材料,校长施彦文随即帮他点了外卖。叶淑妃老师托管结束,副校长钱剑飞已经帮她线上订好了蔬菜鱼肉,免去了下班赶菜场的烦恼。东市街小学参加托管的老师每月可以凭“暖心卡”休息半天,红湖路小学参加托管的老师每学期可以享受两天的“无理由休息日”……

为解决特色课程师资不足的问题,金华市部分学校外聘专业教练、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和家长志愿者等参与托管服务。国家级非遗婺州窑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吕永明,是北苑小学的学生家长,前段时间受邀到学校教孩子们体验制陶、榫卯木工、木版年画等非遗技艺,此外他还在仙源湖实验学校、育才小学等校授过课。

据悉,2020年,金华共有1300余名校外志愿者参与托管服务,累计服务3700余次。

【局长说】

擦亮校内托管民生示范工程品牌

金华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楼伟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小学“放学早、接送难”问题,紧盯改革“最后一公里”,2018年在部分学校开展了试点,2019年全面推行小学放学后校内托管服务改革。

近年来,金华持续创新举措,不断健全机制,着力打造教师用心、学生开心、家长舒心的“三心”工程。全市392所小学全部开展托管服务,惠及学生31.6万余名,小学生每天多留学校一两个小时,安心做作业、运动锻炼、琴棋书画、科创制作……几乎与家长下班同步,受到家长欢迎与社会好评。

校内托管是实实在在的民生服务,要让家庭得实惠,关键是要把服务做实做精。今后,我们将深化小学课后托管服务探索与改革,将这项百姓叫好的民生示范工程做得更好,做成极富金华辨识度的教育品牌。

广东珠海网警对“校讯通”泄露数据行为开展调查

本刊讯 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珠海市公安局获悉,该局查处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团伙,该团伙非法获取中小學生个人信息10万余条。

“是某某同学的家长吗?我是某老师,我们推出了最新课程……”许多家长经常会接到这样的电话。珠海网警注意到,一家教育培训中心在推广课程时,能精准说出学生的个人信息。

针对这一情况,珠海市公安局展开调查。警方查明,这个所谓教育培训中心的董事长石某某(男,47岁),经中间人林某某介绍,认识了一家负责维护“校讯通”系统

的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员工徐某某,通过徐某某获得“校讯通”系统中的数据,用于推广公司的培训课程。

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某(女,41岁)、徐某某(女,34岁)均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警正在对“校讯通”系统维护公司泄露数据的行为开展深入调查。

珠海警方发出警示,违反国家法律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培训机构应依法经营,切勿为了开拓市场铤而走险。

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师范生 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

一、师德践行能力

1.1 遵守师德规范

1.1.1【理想信念】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内容,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能够在教书育人实践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树立职业理想,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1.1.2【立德树人】

●理解立德树人的内涵,形成立德树人的理念,掌握立德树人途径与方法,能够在教育实践中按照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求,依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开展教育教学,积累培育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经验。

1.1.3【师德准则】

●具有依法执教意识,遵守宪法、民法典、教育法、

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在教育实践中能履行应尽义务,自觉维护学生与自身的合法权益。

●理解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内涵与要求,在教育实践中遵守《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能分析解决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相关道德规范问题。

1.2 涵养教育情怀

1.2.1【职业认同】

●具有家国情怀,乐于从教,热爱教育事业。认同教师工作的价值在于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了解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职业特征,理解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与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创造条件帮助学生自主发展。

●领会职业教育对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认同促进学生德技双修而有个性发展的理念。

1.2.2【关爱学生】

●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公正平等地对待每一名学生,关注学生成长,保护学生安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尊重学生的人格和学习发展的权利,将知识学

习、技能训练与品德养成相结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强自立,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职业习惯。树立人人成才的观念,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1.2.3【用心从教】

●树立爱岗敬业精神,在教育实践中能够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与班主任工作职责,树立“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做中学、做中教”的理念,钻研技术、研究教育,富有爱心、责任心,工作细心、耐心。

1.2.4【自身修养】

●具有健全的人格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有较强的情绪调节与自控能力,能积极应变,比较合理地处理问题。

●掌握一定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人文底蕴、科学精神、职业素养和审美能力。

●仪表整洁,语言规范健康,举止文明礼貌,符合教师礼仪要求、教育教学场景和职场规范要求。

1.3 弘扬工匠精神

●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树立质量意识、服务意识、竞争意识、责任意识,在专业实践和教育实践中,秉承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等职业精神。

二、专业教学能力

2.1 掌握专业知识

2.1.1【教育基础】

●掌握职业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能够遵循职业教育规律,结合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认知发展特点,运用职业教育原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

2.1.2【专业素养】

●系统掌握本专业必需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的基本技能和常用的专业教学方法。了解本专业相关的职业标准,了解行业发展趋势、技术前沿,掌握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基本方法;了解本专业相关的职业背景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

能力。

2.1.3【信息素养】

●了解信息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掌握信息化教学设备、软件、平台及其他新技术的常用操作,了解其对教育教学的支持作用。具有安全、合法与负责任地使用信息与技术,主动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积极有效开展教育教学的意识。

2.1.4【知识整合】

●认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特点,具有跨学科、跨领域整合知识的意识,了解学习科学相关知识,能够整合理论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专业知识与教育知识,掌握理实一体化课程、专业教学知识与策略,指导专业教学与实践活动。

●了解融合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掌握随班就读的基本知识及相关政策,基本具备指导随班就读的教育教学能力。

2.2 开展专业实践

2.2.1【操作能力】

●掌握技术技能形成规律,具备熟练的专业操作技能,有企业实践、技能大赛等经历,或参与学生职业技能考核评价初步体验。

2.2.2【获取证书】

●关注国家资历框架发展要求,熟悉“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考取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

2.3 学会教学设计

2.3.1【熟悉标准】

●熟悉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掌握拟任教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人才培养方案和教材,理解所教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逻辑和体系结构,具有依据标准进行教学的意识和习惯。

2.3.2【掌握技能】

●具备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与普通话等教学基本功,通过微格训练和实训基地训练,系统掌握导入、讲解、提问、演示、操作、板书、结束等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基本技能操作要领与应用策略。初步掌握职业教育模块

化教学技能。

2.3.3【分析学情】

●了解分析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习需求的基本方法,能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学习特点和经验,分析教学内容与学生已有知识和技能的联系,预判学生学习的疑难处。

2.3.4【设计教案】

●准确把握教学内容,理解本课(模块)在教材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课(模块)的关系,能够根据课程标准要求和学情分析确定恰当的学习目标和学习重点,合理设计理实一体的学习活动,选择适当的学习资源和专业教学方法,合理安排教学过程和实践环节,能够会同企业制订实习教学方案,科学设计评价内容与方式,形成教案与学案。

2.4 实施课程教学

2.4.1【情境创设】

●能够基于职业岗位工作创设安全、真实或仿真的职业情境与和谐的学习情境,基于职业岗位工作过程设计教学过程,培养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力,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和技能训练活动。

2.4.2【教学组织】

●基本掌握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组织与课堂管理的形式和策略,尝试使用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融媒体教材,结合专业特点,以学生为主体,采取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情境教学、模块化教学等教学方式,科学准确地呈现和表达教学内容,控制教学时间和教学节奏,合理设置提问与讨论,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参与技术技能训练,达成学习目标。

2.4.3【学习指导】

●能够依据专业特点、技术技能形成规律、学生认知特征和个体差异,指导学生开展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注重差异化教学和个别化指导,促进学生初步掌握技术技能。

●知道不同类型的信息技术资源在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和学习体验方面的作用,合理选择与整合信息技术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机会和个性化学习体

验。

●掌握课堂教学或实训教学总结的方法,能够引导学生对学习或技能训练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合理布置作业或训练项目。

2.4.4【教学评价】

●树立促进学生评价理念,理解教育评价原理,掌握职业教育教学评价的方法与策略,能够在教学实践中实施过程评价,初步运用增值评价,合理选取和运用评价工具,运用表现性评价等方法,评价学习活动、学习成果和技能水平。

●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工具收集学生学习和企业实践反馈,跟踪、分析教学与学生学习过程、技能形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形成基于学生学习情况诊断和改进教学的意识。

三、综合育人能力

3.1 开展班级指导

3.1.1【育德意识】

●树立德育为先理念,了解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原理与方法,以及学生思想道德发展的规律和个性特征,能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开展德育工作。

3.1.2【班级管理】

●基本掌握班集体建设、班级教育活动组织的方法。熟悉教育教学、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成长生活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规定,能够合理分析解决教学与管理实践相关问题。

●基本掌握学生发展指导、综合职业素质评价的方法,能够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收集学生成长过程的关键信息,建立学生成长电子档案。能够初步运用信息技术辅助开展班级指导活动。

●熟悉校园安全、应急管理相关规定,了解学生日常卫生保健、传染病预防、实习安全管理和意外伤害事故处理的相关知识,掌握面临特殊事件发生时保护学生的基本方法。

3.1.3【心理辅导】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了解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身

体、情感发展的特性和差异性,基本掌握心理辅导方法,能够参与心理健康教育等活动。

3.1.4【家校沟通】

●掌握人际沟通的基本方法,能够运用信息技术拓宽师生、家校、校企沟通交流的渠道和途径,积极主动与学生、家长、企业、社区等进行有效交流。

3.1.5【职业指导】

●了解国家就业形势和政策,掌握职业指导、创新创业的基本知识、途径和方法,有参与学业辅导、生涯规划、创新创业活动的初步体验。

3.2 实施专业育人

3.2.1【育人理念】

●具有教书育人意识。理解拟任教专业课程独特的育人功能,注重课程教学的思想性,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培养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3.2.2【育人实践】

●理解职业核心素养,掌握课程育人方法和策略。能够在教育实践中,结合课程特点,挖掘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知识学习、能力发展与职业道德养成相结合,合理设计育人目标、主题和内容,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有机开展养成教育,进行综合素质评价,体现教书与育人的统一。

3.3 组织活动育人

3.3.1【课外活动】

●了解课外活动的组织和管理知识,掌握相关技能与方法,结合职业教育特色,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3.3.2【主题教育】

●了解中等职业学校文化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方法,学会组织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对学生进行教

育和引导。

四、自主发展能力

4.1 注重专业成长

4.1.1【发展规划】

●了解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具有终身学习与自主发展和定期到企业实践的意识。根据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动态和发展情况,制定教师职业生涯规划。

4.1.2【反思改进】

●具有反思意识和批判性思维素养,初步掌握职业教育教学反思的基本方法和策略,能够结合行业企业需求,对教育教学实践活动进行有效的自我诊断,提出改进思路。

4.1.3【学会研究】

●初步掌握职业教育教学科研的基本方法,能用以分析、研究教育教学实践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具有撰写教育教学研究论文的基本能力。

●掌握专业发展所需的信息技术手段和方法,能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开展自主学习。

4.2 主动交流合作

4.2.1【沟通技能】

●具有阅读理解能力、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交流沟通能力、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

●掌握基本沟通合作技能与方法,能够在教育实践、企业实践、社会实践中与同事、同行、行业企业人员、专家等进行有效沟通交流。

4.2.2【共同学习】

●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掌握团队协作的基本策略,了解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的团队协作类型和方法,熟悉行动导向教学法的小组学习,具有小组互助、合作学习能力。